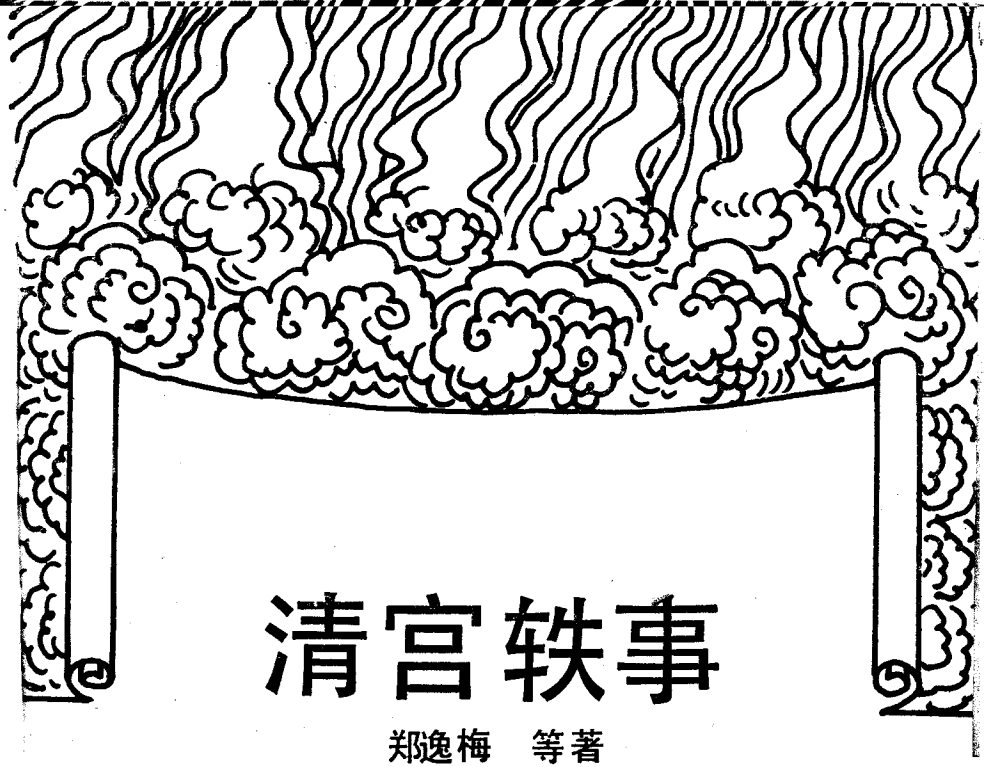
清宮轶事

郑逸梅等



清宮軼事

郑逸梅　等著

紫禁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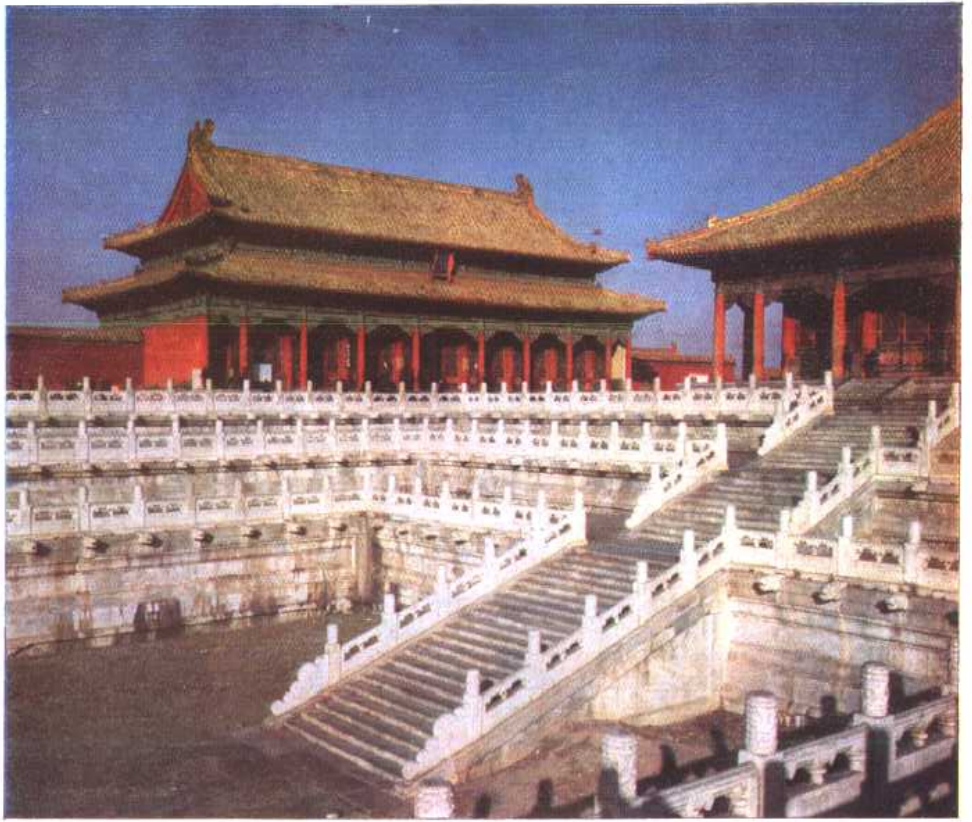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汪莱茵
装帧设计：方振宁

紫禁城丛书
清宫轶事
郑逸梅等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56千字 插页：4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1314·023 定价：1.60元

[illegible]

順治帝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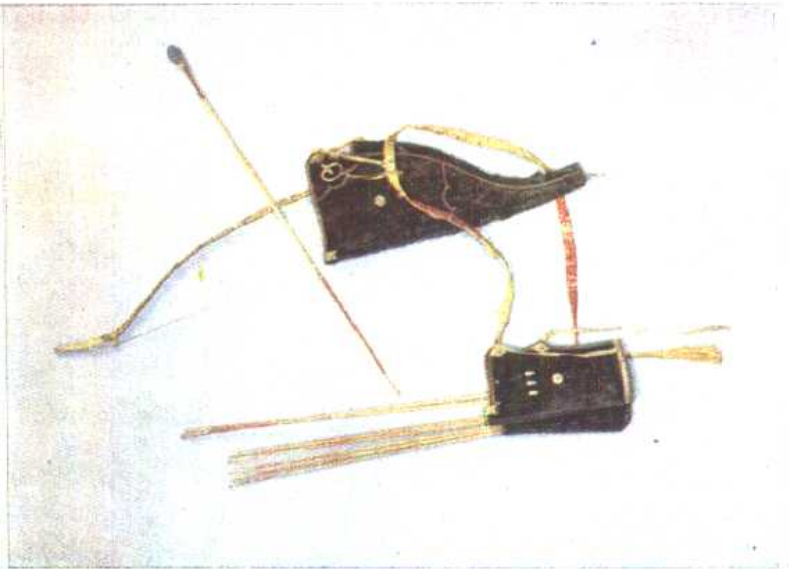
養心殿内景



保和殿外景（西侧）

保和殿外景(东侧)

珍妃井



弓、箭、撒

马　鞍

前　言

汪荣茵

清朝从一六四四年定鼎北京，到辛亥革命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先后有十个皇帝在紫禁城坐龙廷，统治全中国。封建皇帝的一举一动，紧密地联系着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这些皇帝怎样主宰朝政？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帝后妃嫔的宫闱生活又是怎样的？过去碍于宫禁森严，规制重重，清宫所存档案、史料，鲜为外人知晓，而不少野史小说妄加杜撰歪曲，以讹传讹，致使后人难于了解九重宫闱的真实情况。

本书所辑文章，撰写人都是我国对清代宫廷历史有研究的权威、专家和专业工作者。这些文章都是从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和史籍（包括满文档案）以及宫宦、大臣、文人笔记中，去粗取精，撷取精髓，经过缜密细致的考证后才撰写出来的，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史料价值，从不同角度写出了较为准确、翔实的清代宫廷史实的一些侧面。

这些文章篇幅均较短小，内容翔实，文笔生动。例如《康熙宫廷生活一瞥》一文，写的虽是康熙帝的日常生活和癖好，却不难从中看出：他是一位勤奋好学，崇尚科学，励精图治的大有作为的君王。《康熙帝与患病大学士》一文，记述了康熙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亲自指导大学士医治疾病的史实，引人入胜。一向被史学界评为勤政的雍正皇帝，在位仅仅十三年，从《倡导种粮植树的雍正帝》及《雍正喜好之物》二文可以看出，他积极提倡种粮植树，对宫廷内泼灰工人的健康也很关心，居然下令制作玻璃鼓泡眼罩，用以保护他们的眼睛。《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一文，反映了乾隆帝教育后代锻炼身体，熟习武艺，防止满洲贵族子弟腐化堕落的一片苦心。

关于后妃、公主们的生活，传说轶闻更多，而往往缺少史料根据。这本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则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时身居宫廷的后妃、公主们的日常生活。她们一方面是皇帝的眷属，同时也是可怜的寄生者，生杀予夺之权操于皇帝之手，毫无个人人身自由可言；另方面她们又往往凭仗皇帝的恩宠和威风，横行霸道，任意凌人。例如《粉侯辱御史》一文，生动地记述了荣寿固伦公主的骄横跋扈，仗势侮辱御史的经过。《珍妃之死》一文，则记述了一个炙手可热的皇帝宠妃，朝夕间如何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抛入深井淹死的悲剧。这些文章，对清代宫廷腐败黑暗内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

清廷内部演出过一幕幕勾心斗角的丑剧，也发生过不

少轰动朝野的大大小小案件。多少风流人物已成历史过客，他们的功罪有的已有定论，有的还有争议。书中有关文章，既可以使你增加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又可以帮助你了解身为朝廷大员的荣辱兴衰，常常是和皇帝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看到封建朝廷政治黑暗丑恶的一斑。

这些文章，大部分在紫禁城杂志社编辑的《紫禁城》双月刊上发表过，一小部分是从《故宫博物院院刊》上选辑的。所据史料都较真实可靠，不失为正史的补充，有助于读者对清代宫闱的内幕与斗争及封建朝廷政治的黑暗与丑恶加深了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汪莱茵（1）
顺治之死……刘　潞（1）
康熙宫廷生活一瞥……商鸿逵（6）
康熙教子……阎崇年（10）
康熙与患病大学士……徐艺圃（14）
康熙打猎……闻性真（19）
康熙指挥救火……闻性真（23）
康熙游秦淮……一　丁（25）
雍正喜好之物……杨乃济（28）
雍正重视“祥瑞”……冯尔康（37）
倡导种粮植树的雍正帝……冯佐哲（41）
雍正轶事三则……闻性真（45）
乾隆皇帝詠玻璃……茹竞华（49）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若　青（57）
乾隆朝西餐具的制作……杨乃济（60）
咸丰与恭亲王……王树卿（63）

弘德殿中的顽童学子……杨乃济（68）
光绪的心病……周　熙（72）
光绪的“密诏”……周　熙（74）
光绪在瀛台……周　熙（76）

孝庄文皇后轶事……刘　潞（78）
太后下嫁在《红楼梦》中的反映……许宝骙（82）
顺治皇帝的三位皇后……商鸿逵　岑大利（86）
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孟　森遗稿（93）
附：赘言……商鸿逵（101）
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于善浦（105）
珍妃之死……周　熙（117）
清朝汉族公主——孔四贞……刘　潞（120）
和孝公主——乾隆帝的掌上明珠……汪莱茵（124）
和孝公主轶事点滴……冯佐哲（129）
和孝公主的妆奁……万　依（133）
粉侯辱御史……汪莱茵（140）
清代第一次选秀女……刘　潞（144）
候选秀女违制抗上……羊　司（148）

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唐国耀（151）
两员外郎险遭正法……古　林（157）
大内更鼓敲错之后……古　林（159）
乾隆时《永乐大典》被盗案……吕　坚（161）
乾隆丧葬期间的一桩缮写讹错案……冯佐哲（166）
石匠丧事引出的朝廷风波……陈东林（172）

乾隆朝筒子河浮尸案……杨乃济（176）
一身貂褂罚俸半年……杨乃济（179）
嘉庆庚辰兵部失印案……古　林（182）
銮驾内库失金案……朱先华（188）
蔡寿祺疏劾恭亲王……杨乃济（191）
清代最大的戊午科场案……唐国耀（201）
几遭杀身之祸的太医李德立……郑逸梅（204）
太监苏德掘银案……赵蕙荟（208）

乾隆朝左副都御史窦光鼐……唐国耀（211）
大学士瑞麟升官之道……赵蕙荟（214）
旗人状元崇绮的荣辱兴衰……唐国耀（218）
王寿彭侥幸中状元……林树惠（221）
大阿哥的下场……周　熙（224）

满文本《三国演义》的流传……文爱清（226）
太液池边的小铁路……杨乃济（229）
乾隆朝的宫廷西洋乐队……杨乃济（236）

官至二品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刘　潞（241）
供职清廷的外国画家……聂崇正（245）
清廷西洋画师的膳食……杨乃济（258）

顺治之死

刘潞

顺治十八年（1661年）年初，紫禁城里第一位清朝皇帝顺治福临，患天花死在养心殿。

福临是一位多情善感，身体羸弱的皇帝。他平时“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他常常自哀自叹“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北游集》）。患天花病前他精神上已受过两次重创：顺治十五年他最宠爱的董鄂妃之子夭亡，顺治十七年董鄂妃本人之死。心爱者的死亡，使福临一度产生遁入空门的念头，认为“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罣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北游集》）他终日郁郁寡欢，身体愈来愈弱。在董鄂妃死后半年，福临染上了天花。

天花病在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皇帝得了天花，就会

影响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特别是福临，当时年仅二十四岁，膝下无成年之子，幼子嗣位，朝中更容易出现动乱。因此，福临患天花的消息在宫内外引起了震动。

当时正值顺治十七年年底。为庆贺即将来临的元旦大节，紫禁城中早已张灯结彩，宫女太监们也忙成一片。但皇帝患病，把节日气氛一扫而光，宫中先撤去了才挂上的全部门神、对联、彩灯、彩带，接着，礼部奉旨宣布免去一年一度的元旦大朝庆贺礼。已做好进宫参加元旦大宴准备的诸臣，听到这个消息，都忐忑不安，预感要发生重大不幸。正月初四，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接着又传喻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平圃杂记》），并下令除十恶死罪外释放所有在牢囚犯，以祈祝皇帝康复。

此时福临也知道自己命在旦夕，后事的安排已刻不容缓，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适当的继承人。当时清王朝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建储制度，将皇位传儿子还是传兄弟，福临躺在养心殿病榻上，辗转反侧，拿不定主意。可能是因为福临没有同母兄弟的缘故吧，皇太后坚决主张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嫡孙，福临最后同意了母后立子为嗣的意见。福临先后有过八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四个小的或牙牙学语，或在襁褓之中，只有二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年龄较大，择谁为太子呢？福全为宁妃所生，玄烨为佟妃所生，两儿都是庶出，福临对他们也都无所偏爱，于是他派人征询了他与太后都尊重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

望的意见。

尽管汤若望是个外国人，在清廷中职位也不算高，却与皇帝和太后的个人关系密切，使他成为宫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常常直言纳谏，福临对他也几乎言听计从。在这择子立嗣的关键时刻，汤若望认为应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其理由为玄烨虽比福全略小，但已出过天花，有了免疫能力，而福全则有可能发生眼下同样的悲剧。福临鉴于自己的病状，采纳了汤若望的意见，决定立玄烨为嗣。汤若望的这一举动，事后赢得了当朝大臣的赞誉。左都御史龚鼎孳就撰文称赞他“最后直谏万事之大计”，有如“司马公之累表待罪，范忠宣之头须尽白。血诚轮囷，早见长虑，方诸古人，殆有过之”（《龚鼎孳文集》）。

正月初六日夜半，福临预感到生命垂危，急命太监传谕王熙和麻吉勒，速到养心殿，记录遗嘱。

三更时分，王熙与麻吉勒赶到养心殿。福临表示自己“已患痘症，势将不起”，让王熙按照吩咐在床前速撰遗诏。王熙垂泪从命，在床前匆匆写下遗诏的第一段。这时福临已疲惫不堪。王熙担心皇帝支持不住，便赶紧奏明：为不使圣体过劳，待他们将诏书全部拟就再行进呈。福临点头表示同意。麻、王二人到乾清宫西朝房连夜起草了皇帝的遗诏，又赶到养心殿送皇帝过目。福临挣扎着将遗诏修改了三遍，直到第二天清早才最后定稿。

又挨过一天，即初七半夜，福临死在养心殿。

自正月初八日始，清王朝正式为顺治帝办丧事。初九

一早，宣诏官到天安门外金水桥下，向守候了一昼夜的群臣宣读哀诏，要求百官各退本衙门守制，头九日每天到乾清门外哭丧，在治丧期的二十七天内，俱不准私自归家。

福临的灵堂就设在乾清宫。乾清宫大殿和东西两庑，挂上了白幔；乾清门两边，旌旗幡幢林立，建起释、道两个道场。众多的和尚、道人日夜诵经焚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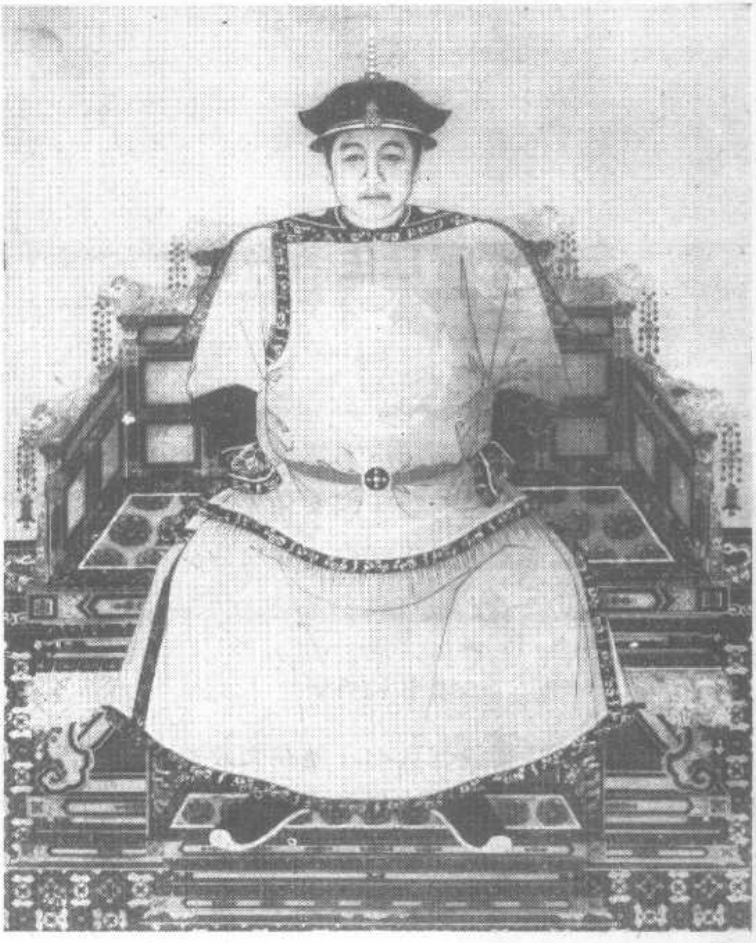
正月十四日，宫中举行所谓“小丢纸”仪式，即在乾清门外焚烧福临御用的冠袍带履，珍玩器皿。皇太后身着玄色长袍，在全身缟素的宫女们的服侍下，来到乾清门，面南而立。文武百官都跪在乾清门两旁。在一片哭声和哀乐中，完成了这个仪式。

二月初二日，福临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文武百官从东华门沿路排班到景山，跪在道旁。送梓宫的队伍由卤簿和象辇开道，后面是上百匹骏马和骆驼，背负着准备焚烧的福临生前所用的绫绮绵绣、帐房什器；接着是几十名太监抬着的灵舆。灵舆上罩黄幔软金篦，内铺紫貂大坐褥，太监手捧金壶、金瓶、金盘、金碗及金交床椅杌等随行。灵舆后面便是福临的棺椁和殉葬而死的贞妃的棺木，太后和妃嫔们的素幔步辇尾随其后。

驼马所驮绫罗绮绣、金玉珠宝，全部在寿皇殿外举行的“大丢纸”仪式中烧毁。福临的灵柩一直停放到百日以后，由与福临关系密切的僧人茆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

第二年五月，福临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

臣等护送，与董鄂妃的宝宫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顺治帝画像

康熙宫廷生活一瞥

商鸿逵

清代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有本领的，究其一生，确实作过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贤识小，在这里只就他在宫廷生活中的几项活动，略作举述，这对评议康熙其人或许也可供参考吧。

读书和科研

康熙从青年时期就好读书，他在亲政不久，年方十七岁时，就是“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当他五十一岁时，能够作到“目前陈列诸书，欲稽考某卷某处，但指令近取之，亦即可得。”（《清实录》）无怪他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熟烂成诵了。一次，他巡视山海关外，路过永平府，亲口出题考知府，题目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皇帝读书宫中，有一种名叫“经筵”的形式，是由讲

官专为皇帝讲解经史要籍的。康熙对此十分认真，还在三藩未叛以前，康熙十二年夏，他对讲官们说："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他并不呆呆听讲，他的作法是"侍臣进讲，朕乃复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圣训·圣学》）。康熙绝不是以举经筵摆架子，而是真正的勤学苦读。康熙于四书五经都撰有"汇纂"和"讲义"，其中颇有他的心得体会哩！康熙的书法艺术也造诣甚高。他喜爱明人董其昌的字，经久临摹，臻于妙境，常书长卷赐给臣下。并能作榜书，热河行宫正门"避暑山庄"四大字，就是他的亲笔，温雅遒美，令人赞赏。

不只儒家经典，康熙还努力学习自然科学。他从二十岁开始，即命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给他轮班进讲科学理论和技术，每日达二、三小时之久（《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他对天文、算学、地理、乐律等专门学术均具有一定的水平。他曾在宫中充当算学老师，教梅彀成（清著名算学家梅文鼎之孙）代数，教陈厚耀几何。著名的算学家蒙族人明安图也跟康熙受业。康熙既通达科学理论，还能掌握技术，他治河即用仪器测量流水量。他最重实践，象种稻米，即经过多方试验培育出优良品种，所产之米叫"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的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康熙研究种植稻米非常用心。他在南巡中看见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其故，答曰："福建稻田以山泉灌之，泉水

寒凉，用此则禾苗靡盛，亦得早熟。”他回到北京，将用玉泉山泉水灌溉的稻米，按照此法去作，“果早熟丰收”（《圣训》）。

饮食和器用

作为一个皇帝，每天用餐无疑要比一般人丰富得多，但是康熙却比较简单。他说：“朕每日进膳二次，此外不食别物，烟酒及槟榔等物皆属无用。”（《八旗通志·勅谕》）还有值得称道的是，他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他道：“亦非所宜”，认为保持健康“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清实录》）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拒绝“仙方丹药”，也即反对寻求长生不老术。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有人进献《炼丹养身秘书》，他对献者痛加责斥后，掷还其书，由此引出以后他对人的生命寿夭问题的一套哲学理论。他说：“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宋人朱熹）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圣训》）这种符合科学实际的人生观和反对神化自己的精神，求之封建皇帝，实在难能可贵！更其妙绝的是，当他年近花甲时，嘴上胡须添了几根白的，有人劝他用“乌须药”，他拒绝说：“从古以来有几个白须皇帝？我若能须发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这种开朗畅达的心怀是极为可嘉的！

康熙一生中所用的器物和居室，也是俭朴无华的。在

其在位的前期，康熙二十五年以前，一年中大半时间住在畅春园（位于北京西郊，是清皇家最早修造的一处园林）。此园是明皇戚李伟的清华园旧基修造的。据康熙自己说是："茅屋涂茨，略无修饰。"有个被召见赴畅春园的汉官，曾记述此园的情状，说："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熳。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程庭：《奇骀随笔》）这可作证明。同康熙多有接触的耶稣会教士法国人张诚，也记道："宣诏我们进入他（康熙）平日宴息的寝宫，那里既不富丽，也不堂皇。我们在那里见到的一切陈设都很朴素。"（《张诚日记》）这也可证明，康熙的生活简单，不事铺张是可信的。在其在位的后期，康熙四十二年修造了热河"避暑山庄"。从此，一年中他要有半年左右时间住在那里。他死之后，他的儿子雍正却不愿意住在那里，把陈设运回北京，对臣下说："服御之物，一惟质朴，绝少珍奇。昨检点旧器，及取回避暑山庄陈设，思慕盛德，实无终已。"（《清史稿·世宗本纪》）无论什么时代，居于高位的人，能够服用俭朴，不务奢华，都是应当予以赞许的。扩建增饰避暑山庄，乃是他的孙子乾隆做的。

康熙教子

阎崇年

在清代京师西郊海淀西边的丹陵泐，康熙帝曾经建过一座“避喧听政”的畅春园。园里的无逸斋，雕梁画栋，典雅恬静，是皇太子允礽读书的地方。

康熙帝有三十五子，二十女。皇长子允禔，为惠妃纳喇氏所生，康熙不大喜欢他。康熙异常钟爱的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生的次子允礽。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出生时，他母亲就死去了。他一岁时被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四岁时，康熙帝便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六岁时，康熙帝请了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为皇太子的师傅，延馆在宫，孜孜教诲。在皇位世袭的封建时代，皇太子的臧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宗庙、社稷。康熙帝认为“自古帝王莫不以豫教储贰为国家根本”。他惟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未明达治礼，所以对允礽孳孳在念，面命耳提，督以礼节，勤加训诲。

允礽长到十四岁时，应该出阁读书了。一天，康熙帝在畅春园对皇太子老师尚书达哈塔、汤斌和耿介等说："古昔圣贤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又援引李世民的教训说："唐太宗亦称英明之主，而不能保全储副，朕深悉其故。"于是康熙帝特委任诸臣，教导他的储贰允礽。康熙帝戒谕允礽读书写字要勤奋，不许有一日暇逸，所以赐名允礽读书的学堂为"无逸斋"。

允礽在无逸斋的读书生活按当时干支纪时为序，以某一天为例，是这样安排的：

卯时（上午五——七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之后，侍立在东侧；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库勒纳、田喜霖侍立在西侧。皇太子允礽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詠不停。允礽遵照他皇父"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年近六十岁的汤斌跪着捧按皇太子的书。听完允礽的背诵，就用硃笔点上记号，重划一段，捧还经书，退回原来地方站立。

辰时（上午七——九时）。康熙帝上完早朝，向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无逸斋。皇太子率领诸臣到阶下恭迎。康熙升座后，问汤斌："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康熙接过书后，允礽朗朗背诵，一字不错。康熙又问起居注官："尔等看皇太子读书如何？"奏道："皇太子睿质岐嶷，学问渊通，实在是宗庙万年之庆！"康熙帝嘱咐他们对皇太子不要过分夸奖，而应严加要求。

检查完允礽的功课，康熙帝回宫。

巳时（上午九——十一时）。时值初伏，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挥羽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这时他的师傅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佇立时久，体力不支，斜立昏盹，几乎颠仆。允礽写好汉字数百，满文一章，让师傅传观。师傅们看后，汤斌奏道："端严秀劲，真佳书也！"库勒纳也奏道："笔法精妙，结构纯熟。"

午时（上午十一——下午一时）。侍卫给皇太子进午膳。皇太子命赐诸师傅饭食。诸臣叩头谢恩后，就坐吃饭。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一百二十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按书，允礽背诵。

未时（下午一——三时）。侍卫端进点心。允礽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苑中张候——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是为教育皇太子"崇文善武"。允礽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翻书出题，允礽依题讲解。

申时（下午三——五时）。康熙帝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允禔、三子允祉、四子允禛、五子允祺、（六子早殇）、七子允祐、八子允禩，同来侍读。康熙帝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向来皇子读书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汤斌依旨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

随意翻开经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皇五子允祺因学满文，所以只读写满文一篇，圈点清楚。

酉时（下午五——七时）。侍卫在院中张候——按置箭靶之后，康熙帝令诸皇子依序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随后康熙帝亲射，连发皆中。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允礽在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

据清代官书记载，皇太子读书，不论寒暑，无一日间断。但康熙教子尽管谨严，皇太子允礽并没有按他所期望的路子走，后来被废掉了。这里原因自然极为复杂。清朝不取皇位嫡长袭制，而康熙帝在位年久，皇子众多，诸皇子鸠聚党羽，奔走钻营，觊觎大位。所以，康熙帝深感“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之苦。允礽被废后，诸皇子更结党营私，趋之若鹜。康熙帝无法，又废而复立，立而复废，后终清世不再订立太子之制。

康熙帝教子，可谓费尽苦心，思之长远，但终于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熙帝无能，而是千年封建专制世袭制度结下的毒果。

康熙与患病大学士

徐艺圃

据清代宫廷医案及有关史料记载，入关前的满族在医疗技术上虽然相当落后，但在利用温泉疗疾方面，却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经验。自清初康熙帝起，陆续修建了著名的赤城汤泉行宫、遵化汤泉行宫和昌平州小汤山汤泉行宫。满族习惯上把温泉叫做“汤泉”，把利用汤泉洗浴治疗关节炎、皮肤病及其他慢性病称为“坐汤”。康熙帝素来反对单纯以吃人参等补剂治病和养身，而主张积极的锻炼防预和对疾病的治疗。他对汤泉浴疗尤为重视，这对后来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亦颇有影响。清宫医案中有康熙帝谕令大学士李光地如何坐汤治疗疮疾的记载，以此可窥见清宫利用温泉治疗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大学士李光地（1642—1718年）比玄烨大十二岁，是清初著名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载，康熙帝“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

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日久君臣关系更加密切。康熙五十年三月，年已七十的李光地身患毒疮，玄烨便赐其坐汤疗疾。综观清宫李光地病案，康熙积极提倡的坐汤疗法，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温泉沐浴有一定疗效。康熙帝对李光地说：“坐汤之法，惟满洲、蒙古、朝鲜最兴，所以知之甚详”，并强调坐汤对治疗皮肤疮毒等疾效果尤为显著。当李光地奏报因病已“坐起甚艰，行步益苦”时，玄烨准予李去汤泉坐汤，并指授其坐汤疗法。经过初次坐汤后，李光地便“下体略觉平复，随于六月末旬盘跚至阁”了。但因他未坚持经常坐汤，时至八月，余毒又发，致“两手硬肿，七著俱废，且浓血多至数升，痒燥经夜不寐”。至九月，毒疮则“遍体盛发，上及发际，不能胜任衣冠，不能动移数步”。此时李光地深感延医服药“不如坐汤之有效”，因此，再次奏乞赐坐汤二七或三七。康熙眷念老臣心切，不但很快答应了他的奏请，并十分恳切地告诫曰：“坐汤好，须日子多些才是”。

二、坐汤浴疗与海水泡洗相结合。赐李光地坐汤的同时，康熙帝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又赐其海水二罐，并谕以泡洗之法，将“海水分为六份，每日如法泡洗二次”。结果确有好转，“其疮头皆变黄色，隔两夜疮疤落者甚多”。因此，李光地满怀信心地向玄烨奏报说：“今继之以灵泉坐洗，似可日就消减除病。”为了巩固疗效，康熙帝于九

月二十八日四更时，再遣内阁中书延福更送海水二大罐，谕李光地继续如法坚持洗浴。

三、坐汤治疗与饮食疗法相结合。康熙谕李光地："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这也就是当今所说的辅之以"饮食疗法"。为此，康熙帝亲赐野鸡、野鸭各五只，嘱李光地在"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

李光地坚持坐汤，辅之以海水泡洗，注意饮食起居，收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他深有感受地向康熙帝奏报说："蒙皇上赐海水洗濯，仍授以坐汤及饮食起居方法，今三七已满，臣病约去五、六分以上。此皆天心怜念，遂使草木更生；圣恩洪造，非言可喻。臣自观此疾气候，再得旬日澡洁，似可全愈（痊癒）。"

四、病之轻重有别，坐汤之周期不同。从清宫医案看，一般根据病情和体质等条件，坐汤有一七至三七或一九至三九周期之分。一七，即七天一个周期（今之曰疗程），二七即两个七天为一个周期……；一九，则九天一个周期，余此类推。在康熙的指授下，李光地曾前后坐汤二七、三七、三九，皆满，可见时间已较长久，康熙便谕李光地停三七或三九，遂即进行"旱忌"。其理由是："坐汤之法……向来只坐三七、三九。……想是坐汤太久恐耗气之故也。"但在坐汤暂停后，亦非绝对不能再濡汤泉，所以康熙说："又闻，坐汤人说，旱忌时，些须坐坐

无妨。”至十月十九日，李光地即“疮毒已净，恶疾渐除”。

五、坐汤四季皆宜，立春后效果更好。如康熙祖母孝庄文皇后在康熙十一年正月严寒季节，因病坚持去汤泉浴疗。然而，据实践经验，在立春以后坐汤，一般比立春以前的效果更好。如上述李光地疮毒复发后，向康熙帝奏请再乞往汤泉“坐一七，以遏目前发动之势”，同时他向康熙帝请教：“当此穷冬之际，不知时候是否相宜？”康熙帝即谕之曰：“朕前已说明，不想举发甚早，皆因旱忌有失调之故。今立春已近，不如春后坐汤，似更有益……。”

六、“坐汤”、“旱忌”周期相同。如连续坐汤三九，即二十七天，那么旱忌亦应为二十七天。之后，再视病情好坏，决定是否继续坐汤。在旱忌期间，应在各方面注意调养，特别要注意“时谨风寒”。康熙帝认为，这一点“不可少忽！”康熙五十年十二月，李光地奏报其“恶疾消除”时，康熙帝即谆谆告诫曰：“目前虽好，须谨慎寒气。明年春深时，还得坐汤二七方好”。

另外，浴疗的效果与“汤力”关系甚大。这一方面指坐汤时间的长短，即是否按规定坐满三七或三九。康熙帝不止一次谆谆告诫李光地，要他一定坚持“坐满”日期。另一方面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在汤泉中浸泡，不能半途而废。李光地在十月十九日离汤泉回京后不久，疮毒很快再度复发，康熙帝说，就是“因汤力未足，根株未消”的缘故。因此，李光地不得不再向康熙帝乞请继续回汤泉坐

汤。

在康熙帝指授下，经过八个多月的浴疗，大学士李光地的疮毒终于在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基本上痊癒了。十二月初二日，玄烨在畅春园赐见李光地，“亲观病患所在”。接着又命奏事处“赍御赐臣鹿尾五条、大鹿一只、野鸡十只、海水三罈”，并谕“勉进饮食，勿妄禁忌”。

通过清宫李光地医案的记述，可知温泉浴疗法颇受清帝、臣僚们的重视。清初，康熙帝即建立了赤城、遵化和小汤山等三个著名的温泉行宫，它们既是重要的治疾养身之地，又是皇帝临时处理政务的行宫。雍正帝即位前作的《汤泉》诗詠道：“凌云兰殿郁崔嵬，绕槛涟漪温液迴。养正为能恒净洁，莹心不止盪氛埃。宿含炎德珠光润，只觉阳和涧底来。著绩岂徒堪愈疾，溶溶一脉万年开。”

康熙打猎

闻性真

自古帝王多好游猎，汉武帝就是个著名的打猎迷。他常“自击熊豕，驱逐野兽”，甚至闹到政务荒疏、人心不安的地步，所以才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的事。清代皇帝的狩猎，自然也是出于享乐，但在清初，主要还是为了保持满人入关前渔猎、尚武的习俗，因而把一年一度的“秋狝”定为一种例行的制度，目的是不叫统治者忘本。

在清代皇帝中，康熙是个打猎能手。他小时候，曾跟一个叫默尔根的侍卫学习骑马、射箭。默尔根要求十分严格，凡是姿势、方法上有一点差错，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默尔根的教练，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康熙晚年曾回忆说：“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默尔根侍卫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

除了在热河围场举行“秋狝”之外，康熙每次到北方

出巡，往往伴有打猎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已行踪绝少的猛虎，当时分布却很广。不仅黑龙江、吉林，就是山海关、锦州、遵化、古北口、滦河西岸，都有虎豹出没。《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出山海关，行围，射殪二虎”；“壬寅，上行围，射殪二虎，驻跸中后所”；“癸卯，上行围，射殪二虎，驻跸宁远州”；“丙午，上行围，射殪二虎，驻跸广宁县闾阳驿”。仅在一周之内，他就打死了八只老虎。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他在巡游五台山的归途中，于“长城岭西路旁射殪一虎。是日驻跸龙泉关。”

康熙二十五年，他去遵化谒顺治的孝陵，在米峪口、滦河西岸、龙井关都打死过老虎。

康熙行围打猎的规模是很大的。跟随康熙身边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所著的《鞑靼旅行记》中记载了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的一段打猎的情况：“抵达了称做山海关的城堡，……皇帝连同王侯百官，从此每天教狩猎，……此时皇帝从亲卫军中，挑选出三千名弓箭武装的士兵。

“他们按着一定的顺序和间距，列队绕着山峰，向两侧扩展，围成了一个直径三哩的环形。……等所有的位置固定后，全体成一条线向前进。前面无论是谷涧，还是荆棘深丛，甚至是险陡的山崖，任何人都必须攀涉，不准左右串动，离开队伍。

“就这样，横越山岭和涧谷，把兽类圈在这个环形网

中，再渐渐地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三哩半径的圆环，缩小到半径仅有二三万步的圆环。然后各自下马（七万人全都骑马，无一步行），步比步、肩并肩地穷追那些从洞穴中、从棲息地赶出来的兽类。兽类东窜西跳也找不到逃路，终于力竭就捕。我亲眼看见，用这种办法，仅半日间就抓住三百多只牡鹿和狼、狐狸以及其它野兽。在辽东前方鞑靼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牡鹿和穴居的熊。……

“打住虎有六十头，这是用另外的方法，使用其它武器击毙的。”

康熙身边的作家高士奇，在《随銮集》中也记录了一些打猎的情况。其卷七《扈从杂记》诗云：“漠漠荒坡路不分，千山立马对斜曛。彩旄时杂岩前树，黄磬遥飞岭外云。出队狐狸人共逐（兽逸出围外者，人皆得射之），合围麋鹿自成群（每合围麋鹿数百）。扬雄羽猎无能赋，后乘空惭托圣君。”其叙述康熙打猎的规模与南怀仁所记大体一致。

在狩猎中，康熙自己常用火枪、弓箭射击。他晚年曾作过一个统计数字：“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有一次，他一天之内就“射兔三百一十八”。他的箭法枪法确实有一定的造诣。他的孙子乾隆曾经说：“圣祖神勇天锡，力能挽强，并用

十二把长箭，臣下罕有及者。曾见圣祖箭无虚发，围中射鹿，率多贯胁洞胸。即猛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一发殪之。”

康熙在学习西方解剖学之后，总想对古代“关于熊能引气，故冬蛰不食”的说法作一次考察。有一次，他在狩猎时获得一只冬眠熊。经过解剖，他发现这熊的肠胃中确实是“净洁无物”。从此，他才相信熊“冬蛰不食”的说法。他认为：“倘猎者不即毙之窟中，熊逸而去，则虽冬月亦必搏兽而食。”由此，他还联想到道家用“食气内息”之术可以“两三日不食不饥”的问题。他说：“若与人应对酬酢便不耐饥饿。”这是因为“气随音而动，动则外泄内虚”的缘故。康熙当时还不知道熊在冬眠中是靠消耗体内贮存维持生命，但他所说的传统理论——“食气内息”，却是值得后人研究的，因为冬眠并不是单靠消耗体内贮存就可以作到的。

当然，大规模地狩猎已不是今天再应提倡的事，康熙打猎也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只不过是作为一桩历史的轶事，从一个侧面来介绍一下康熙罢了。

康熙指挥救火

闻性真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初十，北京正阳门外的居民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毗邻皇宫，这件事惊动了康熙皇帝。他几次派人前往查看，得知“该城及司坊巡捕营等官，并无一人在者，亦无一救火之人。”他派内大臣、侍卫前去扑救，但因火势方炽，不能很快熄灭。于是，他出了天安门，登上正阳门城楼，亲自指挥内大臣、侍卫等前往扑救，经过一场紧张战斗，终于将大火扑灭。第二天，康熙帝针对救火中所暴露的问题，特向大学士发布了一道上谕，把他昨天指挥救火的经过，主管部门玩忽职守和满汉大臣置若罔闻、袖手旁观的情况叙述了一遍，除点名斥责了某些官员之外，还训斥了其它有关人员。上谕说：“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是其该管之处，职分所在，平日不加谨提防，遇灾又不急救，殊为怠忽。左都御史科尔坤、兵部侍郎郭丕、阿兰泰奏称‘臣等留视，俟火势熄灭方回。’

及朕还宫，使人看时，伊等亦已散去。城外系汉官所居之地，遇此等事，亦应协力料理，乃置若罔闻，袖手不顾，则他事亦因循坐视可知。伊等皆国家大臣官员，凡事当视若一体，乃于身外一不关心，可乎？尔等可将此旨传谕吏、兵二部及都察院知之。”

这件事见于《圣祖实录》卷一一四。事情并不大，但它反映了清代官僚制度的腐朽、工作效率低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自家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居官哲学。康熙帝从这次毗邻皇宫的火灾中，由小看大，举一反三，想到救火如此，其它事恐怕也是如此，所以他说“他事亦因循坐视可知”，要大家引以为戒。当时，康熙帝才三十岁出头，他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很想有一番作为。整顿吏治，就是他经常想到的题目之一。所以，一场火灾中的见闻，也就成了他告诫臣下的好材料。

康熙游秦淮

一　丁

秦淮河南源出江苏省溧水县东北，横贯南京，流入长江。相传为秦始皇南巡会稽时所凿，又因疏导了淮水而得名，是江南的名胜之一。

历史上秦淮河是南京地区客货流通的重要通道；由于三国吴、晋等几个王朝相继建都南京，使之成为江南重镇；明朝的贡院设在这里，南方各省的书生都要到这里赶考，又是文人荟萃之地。这一切，无不刺激着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秦淮两岸也因此被那“十六红桥夹两岸，蜀娇越艳扬新声”的舞榭歌台所充斥。当时的达官权贵、文人墨客，都把买笑于秦淮看作是一种风流时尚。因此，明末复社的侯方域尽管吟诵着“商女不知亡国恨”，却仍在秦淮河边与名妓李香君结下了姻缘。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南巡时也亲临秦淮，观赏这一江南名胜。

康熙帝在位期间，为稳固满清在中原的统治地位，曾

六巡江南以观民风土俗，同时乘机游览了江南各地名胜。他曾经谈到："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玩赏移时也，虽身居九五，而乐佳山水之情与众何异？"（《圣驾五幸江南恭录》）在第二次南巡驻跸江宁（南京）时，他亲祭明太祖孝陵，借以笼络那些不肯臣服的明朝遗民，游秦淮即是这次驻跸江宁期间的一个插曲。

当时扈从康熙南巡的南书房大臣张英记载道："至金陵（南京）之次日，上诣明太祖孝陵致祭，……驾旋从至文德桥，明巷陌皆有鼓吹，上命停之，遂登舟……。"（《南巡扈从纪略》）那时候，秦淮河确是非常美丽的，那碧绿的河水缓缓东流，岸边垂柳倒影清晰明丽。唐朝颜真卿曾在这里放生、杜牧曾在这里沽酒。虽然时过境迁，那放生池和杏花村酒店却依然如故，使人留连忘返。两岸河房中不断传出歌声、笑语声……。康熙帝在扈从大臣和侍卫们的簇拥下，从文德桥上船，往返游荡，欣赏着秦淮两岸美丽的景色。看到百姓家家张灯结彩、跪迎"圣驾"的情景，康熙帝不免有些盛世之君的得意之情。为了显示对臣民的仁爱，他又向旁边侍奉的大臣们说了些诸如"无乃烦扰百姓"一类的话。而面对当时社会分工明显加强、工商业日趋繁荣以及文人墨客、乡绅仕宦沉溺于秦淮声色的社会现实，康熙帝似乎又想起了南明政权偏安江宁以致灭亡的历史，发出江南"大略尚虚华，安佚乐，力田者寡，逐末者众"的感叹，他告诫地方官员们"当使之去奢反朴，事事务本"（《清实录》）。

在江宁，康熙帝曾专就江南民风土俗问题对地方官员论道："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其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尔等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激浊扬清，体恤民隐，以副朕老安少怀之至意"（《清实录》）。这些话，说明了康熙受到儒家农桑为本、工商为末传统思想的极大影响。但是，当时工商业日益兴盛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在封建制度下，象秦淮两岸河房那类虚假的繁荣不可能被消灭，康熙帝也不可能真正听到那些下层妓女们强作欢笑后面的痛苦呻吟。因此，尽管康熙帝的"圣谕"被勒石树碑，却终于没有成为现实，只是他的秦淮之游，表现了他"虽身居九五，而乐佳山水之情与众何异"的自白。

数百年过去了，昔日秦淮的"六朝金粉"早已荡然无存，连明清的盛世繁华，人们也只能从偶然尚存的几所雕梁画栋的房舍中，依稀想见它当年的风采。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正象秦淮的流水一样，逝而不返，取代它的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雍正喜好之物

杨乃济

清代帝王中的乾隆，游山玩水遍及大半个中国，吟诗题字，行围涉猎，摆弄古董，无所不好。其父雍正却大体如《实录》、《啸亭杂录》一类官书、笔记中所说的“秉性不喜华靡”，“崇俭而不奢”，“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给人以另一番印象。不过究之于史实，他也的确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终日忙于打击政敌，整顿吏治，清查钱粮，筹划军务等等，以至从未远巡，绝少游幸。尽管人们从已发表的故宫博物院藏画中也看到过一些颇为艳丽的雍正行乐图，以及雍正披西洋假发的画像等，但对于雍正帝勤政之余的其他活动仍因不得其详而无所评论。

笔者近阅清宫档案，于内务府造办处诸档册中，发现了若干与宫中营造、陈设、服饰、器皿、书画、文玩诸制作有关的谕旨。这些谕旨不仅不见于《实录》、《东华录》一类的官修史籍，即或《起居注》、《上谕档》中亦

雍正帝化装画像

未予收录。盖此一类纯属玩物琐事，又涉宫闱隐私，不免讳其言志。今阅此档，得以略见端倪。雍正帝对于声色犬马并非无动于衷，且于雕虫、玩物、西洋奇巧诸技皆深有

所好，反映出雍正帝的另一些活动：

一、嗜好鼻烟，亲定烟壶式样

档册中记有配制上用鼻烟一事：

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太监张玉柱交来鼻烟一包，传旨：此烟是怡亲王进的，朕常用，问刘三九若配得来即配作些，若配不来俟怡亲王事毕后向府内要配方做。钦此。”

烟草于明季传入中国，清初称丹白桂，雍正以前清代诸帝皆无此嗜好，崇德四年皇太极颁有禁烟告示（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栽种或吸卖丹白桂者皆以贼盗论罪，康熙帝亦力主禁烟。

鼻烟的主要原料是烟草，清初它是上层社会中的时髦玩艺儿，一向标榜“敬天法祖”的雍正帝，竟也免不了要违反祖制，染上这一时髦的嗜好，而且对于贮鼻烟的烟壶也极考究，并亲定式样：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黑地珐琅五彩流云画玉兔秋香鼻烟壶一件，奉旨：玉兔不好，其余照样烧造。钦此。

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桃红地珐琅画牡丹花卉鼻烟壶一件，奉旨：上下云肩与山子不甚好，其余花样照样烧造。钦此。”

二、欣赏眼镜，用于劳动保护

眼镜之制作原为校正人的视力，本无所谓欣赏与爱

好。但当雍正朝之际，它还是一种颇为新鲜稀罕的洋玩艺儿，有淫技奇巧之嫌。直到光绪朝末年，那个奉旨为老佛爷拍摄御容的摄影师勋龄，也只是由于他的视力欠佳，以致缺了眼镜就当不好这个差了，这才由慈禧特准他戴眼镜入宫。殊不知早在二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就已戴上眼镜了。雍正非常欣赏这个洋玩艺儿，造办处曾多次奉命制作，或供上用，或供赏赉。在雍正帝经常起坐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中，甚至在他的銮轿中，也都安放上用眼镜。雍正还多次以眼镜颁赐臣下。凡此种种，档册中记载颇多，现选录如下三条：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太监张玉柱交来西洋玻璃眼镜一副（系西洋人戴进贤进）。传旨：着照朕戴的眼镜式样装修，再将盒内西洋字白纸签着西洋人认看，因写汉字。钦此。

随将西洋字白纸签一件，着西洋人郎世宁认得系七十岁三字等语。记此。

于十二月初二日随将西洋玻璃眼镜一副换得玳瑁圈银捏子皮盒，首领太监李久明持进交太监张玉柱讫。”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刘进义来说，首领太监王辅臣传旨：四宜堂如意床上安眼镜一副。钦此。

于本日将（雍正）二年备用上用茶晶眼镜一副交太监刘进义持去讫。”

按：档册中写到眼镜时有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字

样多种。当时是用年龄来标志老花镜的度数。雍正七年雍正帝五十一岁，已到了花眼的年龄。大约他并不近视，因而平时不戴眼镜，只随处安放老花镜，便于取用。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首领太监萨木哈来说，怡亲王奉旨：泼灰处泼灰的人眼睛若不遮护惟恐有伤，尔等将玻璃鼓泡眼罩做些赏赐。钦此。

于本月十八日做得鼓泡玻璃眼罩四副，平面玻璃眼罩八副，郎中海望呈进。奉旨：赏给工程处。钦此。”

眼镜之用于泼灰人劳动保护，实雍正帝一大创造。一代人君能如此设想，亦难得也。

三、玩狗成癖，频制狗衣

档册中有关玩狗的记载始于雍正五年，下面择录一二：

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太监王太平传旨：着给造化狗做纺丝软里虎套头一件，再给百福狗做纺丝软里麒麟套头一件。钦此。”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太监王太平交来麒麟套头一件，传旨：着将麒麟套头着添眼睛、舌头，其虎套头着安耳朵。钦此。”

雍正六年“二月初四日太监王玉持来竹胎红毡毯面、白毡毯里小圆狗笼一件，蓝布垫子一件，白毡垫一件，说太监王太平传旨：着照样做一件。钦此。”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太监雅图交来虎头狗衣一件，麒麟狗衣一件，传

旨：虎皮狗衣上皮托掌不好，着拆去。再狗衣上的纽绊钉得不结实，着往结实处收拾。再做猪皮狗衣一件，豹皮狗衣一件。钦此。”

按：此类玩狗记载不下一二十起，其传谕制做之狗衣、狗笼、狗窝、狗垫、套头等，皆雍正帝亲为定式，做成后又多次返工修改。至于造化狗、百福狗之得名，不外亦系雍正钦定。

四、玩弄奇巧，别出心裁

雍正帝喜制奇巧玩物，如自鸣鼓、藏身表等，皆自为设计。由于机括繁复，档册中记载亦较仔细，现摘录其一二如下：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九月初十日郎中海望奉旨：陈设鼓样并挺子、座子俱照戳灯一样做，将鼓墙厚些的鼓做二面，上安粘翎毛的鸡一只，内安风琴。再将扁形的鼓做二面，上或安缨络式样，或配合何样，尔等酌量再比比，小些的鼓亦做二面，俟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于十月初六日画得高架陈设鼓样一张，郎中海望呈览。奉旨：鼓上鸡肚内安的风琴虽好，但鸡肚内地方窄小，恐不能吹整套曲子，若有响声亦可。再，此鼓小，若安得风琴，顶上就不必安鸡，或安一夔龙式顶才好，其扁形安缨络。陈设鼓样准做。钦此。

于七年正月十六日做得陈设瓶式自鸣鼓一件，郎中海

望呈进讫。”

雍正三年“九月十一日员外郎海望奉上谕：圆明园后殿内仙楼板墙上安表一件，板墙上做一铜火盆，不必用架子，改配座子，使表轮子藏内，其表上针透下楼板，楼板下画一表盘，表轮子声音不要甚响。钦此。”

五、事必躬亲，玩而不厌

从档册中有关穿戴、器玩制作之谕旨，均可见雍正帝潜心于雕虫小技，其指手划脚、评头品足之态，活画出一副玩物里手、富贵闲人的悠然状貌，言其玩而不厌，是丝毫不为过分的。

蟒袍：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尔照朕指示将黑地仗、酱色地仗织圆金龙五彩云蟒袍样画样看下，不用画水，不要象大蟒袍样，亦不要象寸蟒妆缎花样。钦此。”

手巾：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郎中海望奉上交桃红色单丝绢四围透绣西洋花白色绿边手巾一条，着照此样式，或紫色、松花色、桃红色织绣些，两头绣花，两旁边不必绣花。钦此。”

皂鞋：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着将皂鞋样寄与织造处，照样用马尾织鞋面几双，其底交四执事成造。钦此。”

香袋：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着照现在挂的香

袋式样，用象牙雕刻透花做一对。象牙墙像火煃（嫌）包的掐簧，两面盖，透地糊纱，或盛鲜花、或盛香，皆用得。香袋边不必做挑出去的丝子挂络，底下要钟形，上边要宝盖形，中间或连环、方胜俱可。钦此。”

盆景：雍正八年“八月十一日太监张玉柱传旨：年希尧进的点翠盆景五盆内有一盆好的，其余俗气些。再做盆景，树身子不必用铜挺子，做翠树身子，再做点翠竹挺子、点翠竹叶子，象紫竹林款式。再做点翠的竹子做散散的盆景。再做斑竹挺上用点翠叶子盆景。钦此。”

六、爱玩西洋器物

清初西洋耶稣会教士来华供奉内廷，多备物进献。雍正朝有巴多明、宋君荣、戴进贤、郎世宁诸人，凡有所进，雍正帝皆爱而玩之，又命造办处匠人仿制，或将洋器改装。此类事屡见于档册，现择要摘录一二：

雍正四年“五月初六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杜寿交通天气表一件。传旨：交给海望同西洋人认看，准时着海望面奏。钦此。

于初六日据西洋人巴多明、宋君荣认看得系红毛国的。上头玻璃管内水银，天气热往上走，天气寒往下走，中间玻璃管内红，天气热往上走，天气寒往下走等语。

于初七日海望将通天气表呈览。奉旨：着问西洋人做得来否样做一件，不必写西洋字，写汉字。钦此。

于五月十一日将通天气表一件首领赵进忠呈进讫。”

雍正四年“五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杜寿交来西洋日晷一件。传旨：交给海望同西洋人认看，是何用法？认看准时着海望面奏。钦此。

于本日据西洋人巴多明、宋君荣认看得，有玻璃为圈子日晷，中间是水平，下头是地平等语。于初七日将西洋日晷一件海望呈览。奉旨：照此日晷做一件，其做法、花纹俱照此样，不必刻西洋字，刻汉字。钦此。

于十二月初六日照样做得日晷一件，并原样子一件，怡亲王呈进讫。”

雍正五年“闰七月二十一日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镶象牙籐筒千里眼一件。奉旨：照此千里眼整桶式样，或放长些，或放粗些，外面或用香羊皮鞘套，或用西洋纸鞘套，仿西洋式样做几件。钦此。”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郎中海望持出小玻璃镜一面（系西洋人巴多明进）。奉旨：此镜甚好，着仿西洋式做抽长座子，将背后支撑拆去，其糊的西洋纸不必动，安活轴。钦此。

于十一月十一日将小玻璃镜一面配得西洋抽长座，郎中海望呈。”

据以上所示，雍正帝于各种西洋人进献的温度计、日晷、千里眼等，无不爱之。虽说雍正不若其父康熙之精谙自然科学，然而他对这些西洋传来的新技术成果，亦颇持积极欢迎态度，至其后世乾隆之喜好西洋玩艺儿，或许也有雍正的影响吧。

雍正帝重视“祥瑞”

冯尔康

讲求“祥瑞”，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事情。古人把所谓“天降甘露”、“麒麟现”、“瑞芝生”、“卿云出”等等，当作嘉瑞祯祥，标志着政治清明、人民乐业的太平治世的征兆。相信和制造祥瑞的，主要是统治者。在皇帝中有一批人热衷于搞它，也有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清朝的康熙皇帝属于后一类型，他认为讲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灵芝、甘露、天书、月宫诸事，是贻诮后世的事情。他的孙子乾隆皇帝把搞祥瑞视为伤风败俗的事，表示反感。在这祖孙之间的雍正皇帝，性格却大不相同，他虽然不只一次地表白不言休征，然而实际上却鼓励官员们献祥瑞、谈吉兆。

官员纷报祯祥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初二日，发生日月同升和金

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地球一侧四十五度角范围以内的现象，当时叫做“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因为这样的自然现象几百年才出现一次，所以被古人看作嘉瑞。钦天监在推算出这一现象将要发生之后，立即报告皇帝。雍正以为这是难得遭逢的幸事，命令史馆加以纪录，并宣告臣民知晓。

雍正元年（1723年），马兰峪总兵官进呈顺治帝孝陵长出的蓍草。雍正帝命廷臣传观，百官“惊喜赞颂以为奇瑞”。七年（1729年），传说康熙帝景陵的石柱上生长灵芝一枝，长六、七寸，“祥光焕发”。十二年(1734年)，又产瑞芝九本。这是所谓的灵芝之瑞。

雍正十年（1732年），山东官员报告，钜野县民家产牛，生瑞麟，他们煞有介事地说，该物“麏身牛尾，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次年，四川官员亦报称盐亭县农家牛生瑞麟，并画出图来献呈。“圣人出，王道行”，则麒麟现，这当然是“奇瑞”了。

雍正八年（1730年），正在营建雍正的陵寝，官员奏称在房山县的采石工地上，飞来了一只凤凰，“五色具备，文彩灿然”。同时有人报告在该县还见到高五、六尺的神鸟，“毛羽如锦，五色具备，群鸟环绕，北向飞鸣”。凤凰出是“王者之嘉祥”，何况群鸟向北飞鸣，更是歌颂皇帝盛德的好兆头。

雍正朝各地方官员纷纷奏报出现瑞谷，京师发现有十三穗的谷子，御田的稻子长出了四穗，河南的谷子又有多至十五穗的，连刚刚实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也宣称有的稻子

每穗七百多粒，粟米长二尺多。雍正帝特命武英殿把嘉禾绘制成图，刊刻公布，并亲自为《嘉禾图》作跋。与嘉禾相应而生的是瑞茧。雍正七年，浙江总督奏报归安县民家育桑蚕，有九筐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雍正帝怀疑是人工造的，官员回称“实系自然成就”！

卿云现与天子孝

雍正朝时曾任总督、侍郎的李绂写文章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雍正帝即位的前几日，天气阴霾惨淡，到登极受百官朝拜时，“天忽晴明”，阳光灿烂。待到第三天，空中出现了卿云。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雍正帝赴遵化景陵送他生母孝恭仁皇后的灵柩时，卿云再次出现。次年正月，他举行祈谷祭祀礼毕，人们又看到了卿云。七年冬，正在修缮曲阜孔庙，地方官奏报，在大成殿上梁的前两天，当地呈现庆云。同时期，山西官员报称保德州地方“卿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临晋县卿云丽日，五彩缤纷，霞光万丈。次年，湖南官员也不落后，报说该地“庆云丽天，霞光万道”。最有意思的是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报告。雍正帝的生日是十月二十九日，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鄂尔泰的奏折说，圣寿节这天，官员行过祝寿礼之后，云南各地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第二天更“绚烂倍常”。他引述《孝经》里的“天子孝，则庆云见”的话，说明该地卿云的出

现，是由于“皇上大孝格天”。雍正帝见到这个折子异常高兴，在朱批中写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感喜之理”。于是，把鄂尔泰嘉许为上天赐给自己的“不世出之良臣”，将他的世爵由头等轻车都尉超授为三等男爵。云贵的官员也都跟着沾光，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卫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官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雍正帝如此重视卿云的出现，内中奥秘就在它表示“皇上大孝”。因为，鄂尔泰奏折发出的前两个月，湖南人曾静派遣弟子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的事件发生了。案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曾静谴责雍正帝的失德，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为了稳定皇位，雍正竭力制造舆论，所谓卿云的一再出现，无非是表明皇上是真孝子，天上尚且有此征象，臣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若再听信弑父改诏的谣言，不就是违天理昧忠孝的乱臣贼子吗！但谎言终究瞒不过人，云南大理县的刘知县声称：“我的眼睛迷了沙子，怎么看不见庆云啊？”当时怀疑“卿云现”之说的还是大有人在。可见，种种所谓祥瑞以及“卿云现”的出现，完全是雍正帝用以表明他皇位继承合法性的一种宣传而已。

倡导种粮植树的雍正帝

冯佐哲

清世宗雍正（胤禛），是有清一代勤于政事、治国有方的皇帝之一。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极力革除积弊、整饬朝政，并奖励垦植，发展农林牧业。

雍正帝深知“抚养元元之道，足用为先”和“重农务本”的道理，他曾三令五申：“自古帝王致治诚民，莫不以重农为先，……农事者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三，《敕谕》，以下不注出处者，均见此书）。他看到清朝经顺治（福临）、康熙（玄烨）“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因此他多次颁发敕谕，命令各地总督、巡抚、知府、知县们要时刻注重农事，严防水、旱、虫灾发生；并号召他们要时时“课农”，对农民要“悉心相劝，并不时咨访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仍于每乡中

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以示鼓励”。其目的就是让广大农民竭尽全力搞好农业生产。雍正帝当时已经注意到人口增长大于粮食增长速度的问题，故“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由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正因为土地“止有此数”，产量不可能骤增，而人口日益增加，所以雍正倡导“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节约粮食，少生产对国计民生无益的农作物。例如，“烟叶一种于人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小民较量锱铢，且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地方官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转滋纷扰，惟在良有司勤勤恳恳谆切劝谕，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则群情踊跃，不待督课而皆尽力于南亩矣。”这种“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当然很有道理，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基于粮食是“宝中之宝”，雍正帝虽平日锦衣玉食，但他尚能和乃父康熙一样，比较注意节俭。他说：“朕生平爱惜米谷，每食之时虽颗粒不肯抛弃，以朕玉食万方，岂虑天庾之不给，而所以如此撙节爱惜者，实出于天性自然之敬慎”。他的近臣张廷玉也曾说过：“世宗宪皇帝时，廷玉值内廷。上进膳，帝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并屑，未尝废置纤毫。每燕见臣工，并以珍惜五谷，暴殄天

物为戒”（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一）。为号召人民撙节粮食，雍正帝曾谕示：“夫米谷为养命之宝，人既赖之生，则当加意爱惜，而不可萌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得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固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况脾主于信，习惯便成自然。每见食少之人，其精神气体未尝不壮，此显而可见者。”为督促各地妥善保管粮食，雍正还特意给京师管理粮仓的仓场衙门书写一块“慎储九谷”的扁额，并题注曰：“三农生九谷，是惟民之天，邦之本。必高廉神仓储积充裕，斯可以足国而阜民，其慎之。赐仓场衙门”（《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十，《题辞》）。

对林、牧业生产，雍正帝也颇重视，他倡导人们在不宜耕种粮食的土地上种植各种林木。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的一道上谕中说：“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宜，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他认为种树可以解决人们部分吃、烧、穿、用，号召人们广为种植。他还命令地方官在“督率指画，课令种植”树木的同时，必须对已种好的树木加以保护，“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此外，他还号召农民“孳养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养如法，乳字以时，于生计无不裨益。”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告诫封疆大吏要“各体朕惓惓忧民之意，实心奉行”他奖励农耕、植树的各项谕敕。如若“倘视为具文，苟且涂饰或反以扰民”，则要严加惩处。

雍正轶事三则

闻性真

对雍正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颇多。本文仅从雍正七年的《起居注》中摘取其轶事三例，以说明他的某些思想方法，颇有值得人们深思之处。

反对不教而诛

雍正七年三月，湖广巡察王瓒上了一个条陈，主张用严厉手段打击民间的迷信活动，内称："楚俗信巫上鬼，熟习符水咒术，不畏刑罚。惑世诬民，为害靡尽，请严行禁止。倘有违者，拿究照光棍例治罪。"兵部在议论了王瓒条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上疏说："应如该巡察所请，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者拟绞监候。"四月初二日，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两人传下了雍正的谕旨，说："此本内议称：熟习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俱照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议及通行晓谕之后再有犯者方照

此例定拟，甚属疏漏。从前屡降谕旨，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限期，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且令地方官甚有难于奉行之处，著另议具奏。”限制和禁止迷信活动并不错，但用杀头等严刑来镇压，而且不预先警告给以自新的机会，则是矫枉过正，是不教而诛。特别是对于民间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习俗，用这种简单的办法并不能收到如意的效果，而且可能引起极大的反感。所以，雍正批评兵部和王赞“甚属疏漏”，否决这种“不教而杀”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从俗从宜”的民族政策

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倍受压迫，清代亦不例外。以回民而言，所遭屠戮尤烈。雍正时期，有些汉族官吏对回民的风俗信仰、语言服饰很看不惯，总是怀着“非我族类”的小人之见，加之为了取媚满族统治者，曾经多次密折汇报，要求“严加惩治约束”。对此，雍正却别有见地。他在七年四月初七日下了一道上谕，说：“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异视也。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

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殊）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容其置议也。……至于贤愚不一，回民中固有习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政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雍正从考察历史来分析现状，承认回民宗教信仰、语言服装的合法性，认为关键在于“从俗从宜，各安其习”，这与“作奸犯科、惑世诬民”毫不相干。尽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他的思想方法还是正确的。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服从清政府的统一管理，“俱为国家之赤子”。假如不服从这个统治，即使是汉人、满人，也是“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换句话说，是否“作奸犯科、惑世诬民”，不能以民族来区分，而应以其行动、政治态度来区分。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一道上谕，无疑会使清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少犯一些错误，会避免一些人为激化的民族矛盾。当然，他也曾残酷地镇压满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但这与宗教信仰、风俗服饰并无关系。

太阳与灯烛各有其用

有一次，雍正叫“在京大臣官员科道等轮班条奏”，目的是“欲广见闻以资治理”。御史汤倓的条奏，被雍正斥为“甚属鄙琐，不可见诸施行”。汤倓一面表示“醒悟

悦服”，一面又奉承说：“皇上如太阳之光，臣如灯烛之微耳”。雍正针对汤傥的颂扬，发表了一通颇有见识的议论。他说：“尔言不然。太阳与灯烛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也。日间太阳能照，至于昏夜则太阳无所施其光。赖有灯烛之光以补太阳之所不逮。天下至广，应务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处与不能周知之处，尔等能殚其忠诚智虑，以为赞助匡勤，正如太阳之有资于灯烛也。灯烛之功，岂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间耳。倘借奏事之名，以为营私之计，则是燃灯烛于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与太阳争光，其为暗昧极矣。此则可羞可愧之甚，诸臣所当共以为戒者也。”封建时代，称颂帝王“智烛千里”、“明察秋毫”者甚多，颂为太阳者亦有之，故帝王所居之地有“日下”之称。雍正并不反对把他比作太阳，而且也以“朗日”自诩，但他认为太阳与灯烛“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不应分别光之大小”。这个看法，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也就达到了认识的高峰。特别是他厌恶那种借称颂太阳之名“以为营私之计”的人，更为他的议论增加了光彩。汤傥的谀词，不但没有招至青睐，反被作为错误典型加以通报，这的确是雍正的高明所在。

乾隆皇帝咏玻璃

茹竞华

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有一首题为《镜喻》的诗：

青铜摩以旃，照形已无遗。
近代泰西法，玻璨更新奇。
然均藉人工，水银涂抹资。
其未涂水银，素片玻璃辉。
可以施窗棂，外物了然窥。
山亭偶用此，徒缘观峰姿。
孰知别有得，新趣请言之。
亭暗而外朗，承以西峰晖。
通彻玻璃窗，西峰触影披。
不镜而获鉴，实匪伊所思。
回廊数人行，乔树瞰鸟飞。
曰幻幻即否，曰真真又非。
宫疑广寒悬，城似乾闼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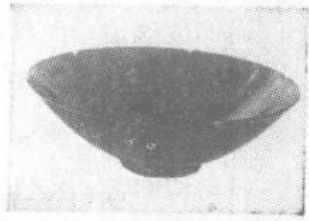
炙毂莫能辨，椎轮谁所为。

宇宙此有素，造物诚无私。

“玻璨”即玻璃。我国制造透明平板玻璃的历史似乎较晚，但制作“琉璃”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十世纪的西周时代，已有烧制琉璃的工艺。从战国时期的古墓中就曾出土过琉璃珠。“琉璃”原写作“流离”，言其流光陆离。《北史》记载，南北朝魏太武帝（公元五世纪前期）时，月氏商贩在京师铸石炼成五色琉璃。“自是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又有说琉璃“铸之中国，其色光鲜，而质则轻脆。”“其来自海舶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番琉璃’。”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国很早就能烧琉璃，但也不断受到外来的影响。

关于琉璃制作的记载很多。如有的书上说“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现代的玻璃是用石英砂、纯碱、长石和石英石等原料，经高温焙化而成。从原料及制作方法来看，琉璃与玻璃基本是同一类材料。

乾隆年间制白地套蓝料蟠龙朝冠直三足炉



乾隆年间制蓝料葵花式碗

乾隆年间制黄地套
红料团寿字花卉豆

但由于原料不完全相同等原因，一般从外观看，琉璃为半透明，玻璃为全透明。

据说郑和下西洋，带回了烧玻璃的技术人员，可能从这时才开始烧制透明玻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写的玻璃，本叫作“颇黎”（按：颇黎是国名），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所以也叫水玉。出南番，可入药，能安心养目。据唐朝人记载，扶南人（今越南）来卖碧颇黎镜，广一尺半，内外皎洁，向明视之，不见其质。看来是发绿色的平板玻璃，全透明的。清康熙三十五年，在宫廷造办处设玻璃厂，这是北京最早的玻璃厂。以欧洲人当监造人员，工人是由博山玻璃厂请来的。产品有青帘、缀缨、华灯、屏风、罐盒、烟壶、鱼瓶、鼓锣（响葫芦）等等。在圆明园内过街楼设分厂，园内西洋楼建筑用的五彩水晶砖就是这里生产的。

清代玻璃生产尚不普遍，物以稀为贵，所以精美的玻璃器皿，在皇宫内被视为珍贵的玩物之一。乾隆有一首咏《玻璃盘》的诗：

> 棐几无尘罽毯平，玻璃盘子伴高清。
> 一般皎洁羞云母，四射光芒突水精（晶）。
> 巧质非缘周玉府，嘉名讵数汉金茎。
> 几回拂拭澄如镜，静对冰心一片明。

又有一首《瓶鱼》诗：

玻璃瓶子贮鱼儿，庙市寻常衒鬻之。
游泳依然在荇藻，唼喁且得饱锣餈。
空明内外浑无阂，网罟搜求底用疑。
欲笑橘中两老者，可曾澄朗乐如斯。

玻璃透明光亮，似水晶一样，又可随意成形，或厚或薄，上面还能刻花、绘画。玻璃器皿，表面坚硬，光洁不染，偶落灰尘，擦拭后如同新的一样。器中放物，了然可见，瓶内有游鱼翠草，足供观赏。当时北京琉璃厂就制做玻璃鱼瓶，所以在庙市上已很容易买到。

乾隆还有几首诗是咏玻璃镜子的。有一首《玻璃镜》诗是：

斲檀紫翠蟠龙蛇，锦帘半揭纹绣斜。
中含冰月无点瑕，水精（晶）云母羞精华。
西洋景风吹海舶，海门晓日摇波赤。
梯陵度索万里遥，价重京华等球璧。
虚明应物中何有，妍者自妍丑自丑。
匡床坐对寂万缘，我方与我周旋久。

又有一首诗名《镜花》：

灼灼复芳芳，盆中一例芳。
逼视原见色，细嗅不闻香。
幻向忽为背，同底亦其昂。
设还彻盆去，空向只如常。

再有一首《镜中灯》诗：

数尺玻璃镜，中含烛影横。
光凝千树焰，彩散一灯明。
圆相分来满，空花对处生。
扑蛾浑不用，剪烬笑难成。
乍似冰壶漾，还如水月盈。
若令长照物，莫彻玉堂檠。

大的玻璃镜子约在明代已传入中国。乾隆时期的玻璃镜子看来是从海外进口的。镜子把被照物的形象色彩如实地反映出来，而且通过光线的折射反射，更具有光彩变幻的特殊艺术效果，因此引起了乾隆帝的兴趣，他越观察心情越加喜悦，便诗以咏之。名著《红楼梦》中也提到大观园内怡红院里的穿衣镜，说明当时除皇宫内，在府第里也有大玻璃镜了。

琉璃与玻璃作为建筑材料用在建筑物上，在我国也历史悠久。战国时已有在陶瓷外加釉烧制成彩色发亮的琉璃瓦。琉璃瓦及琉璃砖一直作为高级建筑材料延用至今。《元故宫遗录》记载："新殿后有水晶二圆殿，起于水中，通用玻璃饰，日光回彩，宛若水宫"。这可能是记载中最早用透明玻璃做房屋装饰的例子。乾隆十六年，为弘历母钮祜禄氏六十寿诞，自西华门外至西直门外高粱桥，十余里中，沿路都张灯结彩设点景，其中有湖北所制的黄鹤楼，形制完全仿武昌黄鹤楼但稍小，重檐三屋，墙壁用玻璃砖砌成，日光照上，辉煌夺目。这是用玻璃制作的建筑模型。浙江所做的镜湖亭，以直径二丈的大圆镜嵌在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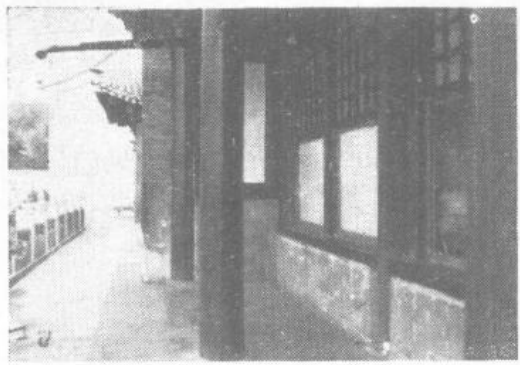
井上，四旁又用数万鳞小圆镜砌成墙。人入其中，身子可映成千百亿个。这是用玻璃镜装饰室内，造成影像变幻的缘故。

把琉璃用在窗子上，取其光亮、美观，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唐王棨曾有《瑠璃窗赋》："璁牖之丽者，有瑠璃之制焉，洞彻而光凝秋水，虚明而色混晴烟。"说明唐时已经把琉璃嵌在窗棂上了。又有"青帘"，是半透明青色象筷子粗细的琉璃条，粘在一起嵌在坛庙及祖庙的窗棂上，昏暗中又见日月之光，更增加神秘崇高之感。由于玻璃在我国制造的比较晚，以前民房和官署的窗户都是用纸糊。就是府邸宫廷亦如是。到了康熙年间，从内务府册记载看到，畅春园已安玻璃装修，宫内则稍晚一些。在乾隆御制诗中也有描写玻璃窗的：

虚明兼洞达，牡蛎未堪论。
净似瑶台月，开如宋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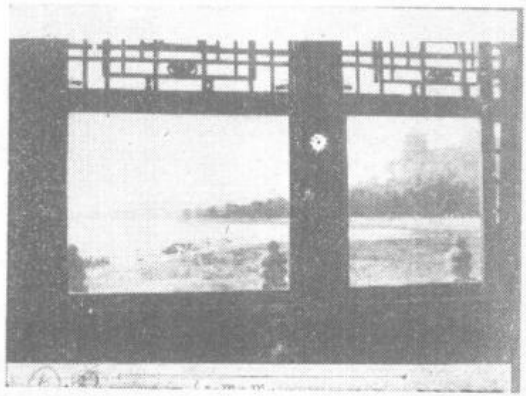
另一首题为《玻璃窗》的诗是：

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
小院轩窗面面开，细细风棂突纱牖。
内外洞达称我心，虚明映物随所受。
风霾日射浑不觉，几筵朗彻无尘垢。
溪畔高枝宿鸟飞，门前小径行人走。
秋添潇洒看阶菊，春回消息凭庭柳。
一径入望尽分明，万象为呈妍与丑。
依稀对镜延清赏，裁诗可以铭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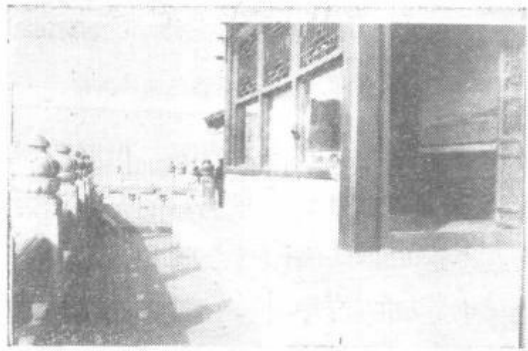
清漪园（今颐和园）玉澜堂西抱厦玻璃窗

乾隆对于玻璃窗能将室内外分隔，但又不碍视线，非常满意。有一首《玉澜堂》，开头写的是“西窗糊玻璃，全湖俯几席。”这里指清漪园（今颐和园）的玉澜堂。在仁宗御制诗《书室四咏》中也有一首咏的是玻璃窗：“棂际玻璃嵌，含光内外清。寒飚避严肃，暖旭助晶莹。”乾隆写《玻璃窗》一诗时，尚未登基，是在雍正年间。由此可



清漪园（今颐和园）玉澜堂西窗

见，雍、乾、嘉时帝、后、王子等住处不少已安上大玻璃窗。同治拟重修圆明园时，样式雷制作的烫样上，有玻璃大方窗、扇面玻璃窗、玻璃三扇窗，都是在雕花木框中心安大玻璃。还有木槅扇中嵌玻璃，玻璃风门，玻璃灯挂檐等设计，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说明对于玻璃的使用已有一些经验了。



清漪园（今颐和园）玉澜堂西抱厦玻璃窗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

若　菁

满清于一六四四年入关，传位到第四代皇帝乾隆，已近百年。因为久处升平时期，满人难免骄逸自安，把弓马之技逐渐废弛了。不少满人受汉人的影响，甚至以通晓汉文、吟诗作画、自侪于士林为荣。乾隆帝对此非常恼怒。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以“悖逆之词”构成大狱，案件涉及一些满族大员，为此，乾隆帝颁发谕旨，谆谆告诫：“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此等弊俗，断不可长！”当时，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巡抚的鄂昌曾经和胡中藻往复唱和，乾隆帝认为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其罪实不容诛”，赐令鄂昌自尽，还特别降谕训示满人，应以清语（满文）骑射为事，禁止满汉人员以文字相往来。上谕称：“嗣后

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乾隆帝禁止满族大员沾染汉俗，对他的皇子皇孙，要求就更加严格，令他们时刻勿忘祖制。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他看到十五阿哥颙琰（即后来继承皇位的嘉庆帝）手里拿的扇子上面有题画诗句，文理字画都清新可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出于十一阿哥永瑆（成亲王）之手。当他接着看到书画落款是“兄镜泉”三字时，就大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以别号为美称，是书生习气，非常鄙俗，这不是皇子应有的行为。他训斥诸皇子说：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寻章摘句，已为末务，爱好虚名更不应该。皇子中有年齿已长的，偶有书斋名字，镌刻成图章，尚无大碍。象十一阿哥这样年纪还轻，正应当涵养德性，怎么能用这“浮伪之事”来淆乱自己的品德呢？

第二天，乾隆帝在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又切实嘱咐一番，并且举了自己继承皇位前的一件事为例。他说：朕即位以前，未尝不留心诗文，但从没有私取别号。二十二岁时，皇考（指雍正帝）因为编纂《当今法令》一书，问诸皇子有别号没有，朕答以没有。皇考遂命朕为“长春居士”，朕兄和亲王为“旭日居士”。可是朕从不用皇考赐给的别号署款题识。我国家世敦淳朴之风，重视习满文、学骑射，凡我子孙自当崇尚本务。起个雅致的别号，于实际丝毫无补。如果效法书呆子习气，流弊所

至，满人纷纷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甚至改易衣冠，变更旧俗，关系国运人心实非浅鲜！不可不知警惕。皇子等诞育皇家，读书容易领悟，骑射行围等事不经过艰苦磨练不能达到精熟。人情好逸恶劳，如不谨慎，必致习为文弱而不能振作。阿哥等即使善词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若能熟谙国语（满文），习弓马，这才是正道。乾隆帝还命令把这一番话缮写张贴在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后来，乾隆帝去世，颙琰即位，嘉庆九年二月也颁发上谕，告诫子孙："词章之学，本属末节，况我朝家法相传，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若竟以风雅自命，与文人学士争长，是舍其本而务其末。"

乾隆帝为何这样警惕满人渐染汉习？主要在于企图保持满人勇猛尚武精神和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以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乾隆朝西餐具的制作

杨乃济

清代乾隆时期，有一大批西洋耶稣会传教士供奉于内廷。档案记载，当时对这批来华的西洋人，在膳食供给份例中，肉类及干鲜果品皆十分丰富（详见拙作《西洋画师的膳食》），这无疑是对他们原有饮食习惯的照顾。这些西洋人虽未必亲下庖厨烹饪西式菜餚，但其中善能为庖者自必不乏其人，他们是否也曾以此等技艺奉献于当朝皇帝，在御膳房中一显身手呢？

就乾隆而言，系一猎奇能手，但凡天底下有关吃喝玩乐的新奇招数，他无不一一品试。满汉全席吃腻了，难免不变更一下新花样。不过乾隆是否尝过西餐，不能凭空揣测，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档案依据。

专事逐日记载皇帝三餐饮食的清宫“膳底档”，每年一册，可惜乾隆朝只遗下仅有的几册，从中尚未发现过吃西餐的文字。但在造办处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确实留

下了若干蛛丝马迹。现摘引档案原文如下：

“乾隆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布膳单一件，西洋布毡衬垫单一件，金地红花西洋锦一块，红地金花西洋锦一块。传旨：将金地红花西洋锦照样做单膳单一件，红地金花西洋锦照西洋布垫单一样做垫单一件，周围边要匀，中间不要边。钦此。

于本月三十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将西洋布膳单一件、西洋布毡衬垫单一件、金地红花西洋锦一块、红地金花西洋锦一块俱改做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交膳房。钦此。

于本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将膳单四件交膳房总管曹进孝收讫。”

“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膳房章京说，承恩公德保传做随膳单小刀五把。记此。

于二月初五日，饭房栢唐阿戳克图将做得单小刀五把并原样持去讫。”

“乾隆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金星玻璃靶（把）西洋刀子十一把，西洋叉子一把。传旨：将刀子俱改做叉子。钦此。”

就以上三则档案所示，传做西洋刀叉、膳单事项皆发生于乾隆十八年四月前，而做成之西洋膳单奉旨交膳房收贮，传做小刀五把又由膳房章京传话，想必皆为皇帝传膳所用。而据《膳底档》得知，皇帝传膳向用“金匙、象牙

筷、纸花筷套”，并未见摆设“西洋布膳单”，“西洋布毡衬垫单”及“随膳小刀”与“西洋叉子”之先例。可以设想，大约在乾隆十八年乾隆曾品尝过西餐，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清宫《膳底档》中，恰恰缺少乾隆十八年的一册。乾隆是否领略过西洋大菜的风味？活计档中虽显示了某些蛛丝马迹，然无从查对核实，因而尚不能最后确定。

咸丰与恭亲王

王树卿

宣宗密定储位

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三十九岁继帝位，在位三十年，终年六十九岁。他一生共有后妃二十多人，先后给他生了十个公主、九个皇子。其中，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夭折早殇，皇长子奕纬也于皇四子奕䜣出生前两个月死去。皇五子奕誴，于道光二十六年过继给道光之弟和硕惇恪亲王绵愉为嗣，袭郡王位。道光帝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和皇九子奕謨，但都年幼无知。所以，在诸皇子中，唯有皇四子奕䜣和皇六子奕䜣颇受道光帝钟爱。

奕䜣的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原为乾清门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因受宠于道光帝，很快由全嫔晋封为全妃、全贵妃。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丑时，在圆明园湛静斋

（后改称基福堂）生皇四子奕䜣。道光十三年四月，皇后佟佳氏崩，八月，奉皇太后懿旨，全贵妃晋为皇贵妃，掌六宫事。翌年，奉旨册立为皇后。这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她从一个普通的嫔位，升到了皇后的地位。但好景不长，在奕䜣还不满十岁时，即道光二十年正月，她就病死了，年仅三十三岁。她死后，奕䜣由皇六子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

奕䜣、奕訢兄弟二人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习，静贵妃抚养奕䜣如同己出。奕䜣为中宫所生，而且居长；但奕訢的才华却胜过奕䜣，并且“与文宗（咸丰皇帝奕䜣）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道光帝喜爱奕訢，还曾赐予白虹刀一把。

道光晚年，为建储传位事颇费了一番心思。《清史稿·杜受田传》中载有：“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这件事，在清人笔记或其他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

道光帝崩后，大臣们在秘密建储匣内同时发现两份谕旨，一份为“皇四子奕䜣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另

一份为："皇四子奕䜣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这两道谕旨，充分说明当初道光帝的矛盾心情，虽然他最后决定传位给皇四子奕䜣，但也不能委曲了另一个宠儿奕䜣，因而同时决定封奕䜣为亲王。

奕䜣、奕䜣兄弟失和

奕䜣继位，改元咸丰，并遵照道光帝遗旨，封奕䜣为恭亲王。但奕䜣对奕䜣即位，不甚甘服。咸丰三年十一月，恭亲王奕䜣受任军机大臣，并以亲王身分不久便任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咸丰帝也常召见奕䜣议事。但奕䜣为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令人生厌。久之，兄弟之间逐渐由猜疑而不和，此后，终于为静皇贵太妃受封皇太后一事暴露无遗。

静皇贵太妃，即恭亲王奕䜣生母静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乃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生于嘉庆十七年，初入宫时为贵人，后晋封为静嫔、静妃。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时，生皇六子奕䜣，后又晋封为静贵妃。孝全成皇后死后，升为皇贵妃。因宣宗密定储位，立奕䜣为皇太子，故奕䜣生母不能再册立为皇后。

静贵妃一生共有三男一女，因抚养过奕䜣，咸丰初年被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皇帝奕䜣还经常到寝宫寿安宫问候，对她格外尊敬。但她自恃抚育皇上有功，一心想得皇太后封号。奕䜣也想通过生母晋封皇太后以扩张自己权势。

但咸丰帝对此并不愿意。认为先帝妃嫔被嗣皇帝尊封为皇太后的，前朝还没有先例。而嗣皇帝的生母，被尊封为皇太后的却有例在先。如顺治帝生母孝庄文皇后、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和嘉庆帝生母孝仪纯皇后等。所以，康慈皇贵太妃的皇太后封号迟迟定不下来。

咸丰五年，康慈皇贵太妃病危。一日，咸丰帝欲入内省视，适遇恭亲王奕䜣自内而出，咸丰帝询问太妃病情如何，奕䜣跪泣言道："已笃！意待封号以瞑。"咸丰帝仓卒间不置可否，只随口答应两声。奕䜣认为咸丰帝已经认可，赶忙回到军机处恭办皇太后封号事宜，迫使咸丰帝在同年七月初一日不得不传旨，"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事后，咸丰帝十分气恼，认为这是奕䜣有意挟制自己。所以，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死后不久，便颁发谕旨："恭亲王奕䜣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付朕成全之至意"。

同时，咸丰还下令："减杀太后丧仪"，不按皇太后礼发丧；在上谥号时，不系宣宗谥，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示区别于其他皇后。《清史稿·后妃传》载："康慈崩后，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附庙。"创清代历史上皇后不系皇帝谥号的

特例。至同治皇帝即位时，才改系宣宗的谥号，曰："孝静成皇后"。

恭亲王奕䜣被罢军机大臣之后，虽于咸丰七年又重新受命为都统，但因咸丰帝周围的肃顺一派势力强大，不断打击和中伤奕䜣。所以，咸丰一朝，奕䜣一直没得到皇帝的信任。

弘德殿中的顽童学子

杨乃济

电视剧《懿贵妃》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正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宾天之时，年甫六龄的载淳，正和几个太监一起，扑在草地上捉蟋蟀。设计这样一个镜头，虽然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作依据，但却顺理成章，符合历史真实。

载淳系咸丰之独子，但由于咸丰早逝，而生母慈禧又一味倾心于宫廷权利斗争，使他的童年既失去父教又乏母爱，惟终日厮混于阉宦之中。而太监之辈，但知阿谀奉承，恣为娱耳悦目。及长，又诱以声色犬马，因而登基之后，年幼的同治帝，仍然嬉戏厌读。进入弘德殿读书，竟是一个少见的顽童学子，大大为难了他的师傅们。

载淳御极后，曾由两宫太后懿旨特派醇郡王奕譞教习蒙语及骑射，爱仁教习清（满）文，恭亲王奕䜣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川驻弘德殿照料一切。大学士

李鸿藻则早被咸丰钦命为载淳之师傅。以后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龢、瑞常等相继入值弘德殿。弘德殿的学习制度是："每日皇帝至书房，拟照上书房规矩，先拉弓，次习蒙古语，读清书，后读汉书。"又规定了"诵读与讨论二者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总宜与师傅随时讨论，以古证今，摒除虚仪，务求实际，切勿诵声甫辍，旋即退息。"其他规定尚多，不复赘述。凡此种种，于六龄之儿童，份量未免过重，然此系遵循两百年来之祖制，这套制度已造就了几代人君，亦未可轻言其不善。但对于早已嬉戏成性的同治帝来说，学业越严则越促其厌学之心，师傅越端庄正色，则越促使其亲暱于阿谀承欢之阉宦。其时弘德殿中之人君学子虽不敢公然逃学罢课，然而"多嬉笑"、"精神不聚"之种种厌学之举，已是家常便饭了。

同治帝在弘德殿就学中的种种表现，可见于翁同龢之《翁文恭公日记》。翁于同治四年十一月始奉懿旨于弘德殿行走，逾年之日记中即屡记授读之事。如同治五年记有：

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微倦，略有戏。"

正月十一日："辰正上至，午初一刻退，讲书颇有戏动。"

正月二十二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

二月初八日："卯正上至，读不甚勤，数进诤言。"

二月十五日："是日上读书尚勤，惟多嬉笑。"

二月十七日："是日上读无倦容，无嬉戏，为今年第一日。惟讲书时言勤，不作抗词争，仍微讽焉。"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急切谏，读当勤。"

以上是载淳十一岁时学习生活的写照。及至同治十年，载淳已十六岁，即将大婚亲政，而弘德殿之授读则更日见维艰，此亦见于同治十年之《翁文恭公日记》：

正月二十五日："看折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

二月二十日："晨读极涩，总振不起，不过对付时刻而已，……多嘻笑，直是无可如何！"

二月二十七日："两宫谕问书房功课，极细，有不过磨工夫，见书即怕及认字不清，以后须字字斟酌，看折奏要紧等语。"

三月十六日："嬉笑意气皆全．功课如此，至难着手。"

五月二十七日："慈禧皇太后谕旨：书房功课耽误，书既不熟，论多别字（曾面试一二次），说话不清……上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督责之词至严至切。"

七月二十四日："精神不聚，读熟书不顺，兰孙（李鸿藻）颇有声色。"

九月十三日："上近日神思不属，每讲论如未闻，故进益更少。"

九月二十六日："两宫又论功课，极言上未能用心，昨令读折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若常如此，岂不可虑。"

以上翁同龢所记，虽措词百般谨慎，然已刻画出一个游遨嬉戏，不近文章之顽童。盖其厌恶学业已成痼疾，遂至亲政前夕竟"说话不清"，"读折不成句"，"神思不属"，"倦于思索"，"讲论如未闻"。师傅之忠言规劝，两宫之严厉切责，皆蔑以复加。

光绪的心病

周　熙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光绪皇帝下落不明，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当时，香港《士篾报》报道说："中国皇帝，久未视朝，乃时事之最可忧者。或传其自寻短见，或谓为守旧党陷害，或谓正抱病，被困一室。""更有人传皇上确系中信石之毒，口吐鲜血，便溺亦皆有血，状甚危险。"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确实是个谜。

那时候，英国驻华公使明白表示不承认慈禧训政，只承认光绪政权，并且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求，要觐见光绪皇帝，藉以了解光绪皇帝的安危情况。各国公使都同意这个意见，就是俄、法公使表示反对，因为他们默认慈禧政权；但众寡悬殊，结果还是签名同意。

上报之后，还是没有批准觐见。理由是：皇帝病重。

究竟是什么病？病情如何？是不是已经把他害死，却

以此为藉口？

上海西报纷纷刊载光绪已死的传说。总理衙门请英使禁止刊载，予以更正。为了打破这个谜，英使推荐法医德对福给光绪看病。他说，只要在报上刊布诊治情况，所谓谣言就不辟自灭。

法医德对福入宫诊视时，见“皇太后与皇上端坐左右。皇太后座前，置有一桌，桌上蒙以黄缎，身穿梅红绣袍；光绪座前，置有黄色踏凳一个，穿着便服，头戴红绒结顶暖帽。”法医宣布的情况，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新闻。上海《字林西报》刊载他诊治的病情：“光绪体气瘦弱，精神短少，脾胃消化迟缓，大便滞泻，有不能尅化饮食之症……脉细速，头痛胸热，耳鸣眩晕。……”

内务府太医院御医所开的脉案，也不外乎“心肾不交，肝脉气旺，腰软精滑……”

天津《国闻报》另有报道，引用见到光绪的大臣的话说：“皇上两目炯炯，精神充足，不象有病的人。身靠龙椅斜坐在慈禧太后的旁边，默默无言。西太后不叫他说话，他就像木偶似的坐在一边。慈禧常对朝见的人说：‘皇帝有病，不能久坐，下去吧。’”

根据这些报导，光绪的“病情”似很明显：维新变法的理想失败，他的羽翼有的被囚，有的被充军革职，有的被处死，他自己成为软禁的政治犯；由不能做主的傀儡变为不能说话的木偶，大有可能被撵下皇帝的宝座。他生理上固然确实有病，但心病更为严重。这就是光绪的“病情”。

光绪的“密诏”

周　熙

戊戌政变之前，光绪皇帝曾两度颁发密诏。这和政变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第一道密诏交杨锐，第二道密诏交林旭。那时，帝后两党倾轧日深，后党的阴谋逐渐暴露，使光绪皇帝感到“今朕位几不保”，嘱康有为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交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虽然光绪皇帝“十分焦灼”等待，但杨锐却没有把密诏送给康有为，“力谋救上”。

杨锐是张之洞的亲信。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有什么事，不找他在北京的儿子，总是叫杨锐代办。杨锐经常给张之洞提供京中情报，使张之洞能随时掌握北京的政治气候。据说张之洞的《劝学篇》——与康有为唱对台戏的著作，就是杨锐代拟的。

慈禧之所以不肯甘休，要追查深究，有一个藉口，听说光绪曾经颁过不利于她的密诏，她命令在宫廷等地大肆

抄查，但始终没有找到。

慈禧和光绪死了之后，到了宣统元年，忽然有人到北京都察院拦舆告状，呈上了光绪给杨锐的密诏。目的是为了说明，光绪的密诏并无不利于慈禧太后之处，为杨锐伸冤昭雪。

献密诏的人，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和他的门生黄尚毅。一八九八年，在逮捕杨锐的时候，他两个也曾被株连，后来释放了。

杨锐被押到刑部狱中之后，他的门生黄尚毅知道光绪曾有密诏，本想呈上去，表示其中并无不利于西太后的话，但考虑到慈禧的毒辣，不敢冒险，于是对杨庆昶说，若搜得手诏，一死必不可免，如果烧了，将来就没有昭雪的根据。他叫庆昶将手诏密缝于他的衣带之中，保留下来。杨锐被斩杀之后，他和庆昶扶柩出京回四川原籍，将手诏密藏了十二年。

宣统元年，他将光绪手诏上缴都察院，“以光先皇帝圣德，慰我皇帝大孝之恩。”力辩其父杨锐之冤，奏请昭雪。

当时执政的摄政王载沣见到这奏本之后，有种种顾虑，没有加以处理，作了“留中”的批示；后来，谘政院陈宝琛提议昭雪，通院赞成，但仍然搁置不究，一直没有下文。

光绪在瀛台

周　熙

作为政治犯被囚禁的光绪，幽居在南海瀛台。那是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通出入；板桥撤了，就里外不通，断绝来往。

瀛台之上，也有一些楼台殿阁。《三海见闻志》对瀛台作了这样的介绍：

瀛台上“仁曜门南为翔鸾阁。阁前有平阶几十级，斜迤而上。离阶十余丈有木吊桥。桥北之东西各有室五楹。”因禁光绪时，那里住的是一些看护的太监，监视光绪的行动。翔鸾阁有七大间，“左右延楼回抱各十九间。阁后东楼曰‘祥辉’，西楼曰‘瑞曜’。阁南为涵元门。门内东向为庆云殿，西向为景星殿，正中南为涵元殿。殿前左右有两井，护以井亭，此殿即为瀛台之正殿”，殿中陈设大镜、红木桌椅，金字筹石等等。

太监每天进送“御膳”时，架起跳板，走向瀛台，“进膳”之后，就抽去了跳板。光绪只能永远在瀛台之中，不

能离开那里。他曾经忧闷地写下了“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

到了冬季，不需要跳板，也有可能离开四面环水的瀛台。那时，海水冻结，冰深数尺，可以踏冰而过。据说有一次光绪曾经带了小太监踏冰离开瀛台，被发觉之后，总管太监李莲英立刻命令凿冰，防止政治犯逃离那里。

生活在瀛台之中的光绪，不用说精神十分苦闷。他接触的人，只是守护他的太监；能去的地方，只是瀛台的那几座殿阁，面对着的只是汪洋一片，既郁郁不安，又十分愤慨，往往把愤怒的情绪倾泻在太监的身上，对他们经常发脾气，罚令长跪。

在无聊的生活中，光绪经常读书写字，作为消遣。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掩卷长叹：“我还不如汉献帝！”

在庆云殿东室的正面，挂有一幅《宋司马光谕人君用人之道》的立轴，跋文是：“光绪丙午十月上澣录，臣全忠敬书”。还有一些匾额斗方之类，下款都写着：“臣全忠敬书”。其实，这并不是别人写的，却是光绪的“御笔”。按照习惯，皇帝写的字，都标明“御笔”，既然是光绪皇帝写的字，为什么却署为“全忠”而自称为“臣”呢？这是为了表明他的心迹；称“臣”者，是不敢以帝自居也。

光绪脑子里盘旋思念的，有心爱的珍妃，有恨之入骨的袁世凯。据说他经常在纸上写有袁世凯的名字，以发泄他的悲愤情绪。临死的时候，隆裕皇后在他的身边，他不言不语地含着泪水，用手指在空中划了“斩袁”两个字。

孝庄文皇后轶事

刘　潞

清初的孝庄文皇后，曾帮助顺治、康熙两位皇帝治理朝政，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远见卓识、对清王朝颇有贡献的皇太后。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蒙古贝勒寨桑之女，在清太宗皇太极还是贝勒时就嫁给他为妃。皇太极即位后，崇德元年被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生了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

崇德八年，皇太极病死于盛京。福临即位，博尔济吉特氏被封为皇太后。

顺治元年五月，满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同年九月，孝庄携顺治帝及大批文武官员从盛京（今沈阳）迁到北京，住进了紫禁城。当时，清廷内部各项制度不完备，皇帝年纪幼小，主持后宫的责任便落到了孝庄身上。

顺治十七年，由于宠妃董鄂氏病故，顺治帝痛不欲

生，哭闹着要放弃皇权，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孝庄极力规劝，顺治帝终于没有出家。此后顺治帝精神一蹶不振，半年后就因病致死。

康熙帝玄烨继位后，尊孝庄为太皇太后。康熙帝登极时只有八岁，十岁时生母又死去。孝庄将他收养在慈宁宫。康熙帝自己也说："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因此祖孙二人的感情特别深厚。

玄烨即位时，顺治帝曾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遏必隆同苏克萨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索尼对鳌、苏之间的矛盾则采取回避、不介入的态度。孝庄很担心辅臣之间的矛盾激化，酿成大乱。于是不待康熙帝亲政，在他还只有十二岁时，孝庄就让玄烨迎纳索尼的孙女赫舍氏为皇后，以此笼络索尼，使之一心一意辅佐皇帝。

玄烨十四岁时，已到了亲政的年令，以索尼为首的一些大臣连续上疏，要求皇帝亲政，然而奏折却都被专权的鳌拜扣住，"留中不发"。又是孝庄凭着她太皇太后的权威地位，出面干涉，玄烨才得以亲政。此后，在解决康熙与鳌拜的冲突以及康熙设计擒除鳌拜的过程中，索尼一家起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孝庄深谋远虑、决策正确的结果。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叛乱。康熙不顾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发兵平叛。那时国家财政困难，经费支绌，孝庄为了表示对皇孙的关心和支持，拿出体己银两缎帛，犒赏出征将士。

关于孝庄，还有所谓“太后下嫁”的传说，说她在清入关后下嫁给顺治帝的叔叔多尔袞亲王。

睿亲王多尔袞在清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功勋卓著，顺治初年尊为“皇叔父摄政王”，后又被称为“皇父摄政王”，成了朝中说一不二的显赫人物。当时明朝遗臣张煌言做了十首《建夷宫词》，后人因词论事，从而便有了“太后下嫁摄政王”之说。加以孝庄死后又不祔太宗皇太极之昭陵，于是这种说法就愈加流行。至今史学界对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袞问题仍有争论。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所著《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曾否定太后下嫁说，认为“太后下嫁说”的直接根据只有张煌言诗，在现存的清代官书、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张煌言对清王朝是怀有敌意的，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因此，不能“据此孤证为论定也。”

笔者查阅了张煌言十首《建夷宫词》，其中一首原文为：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慈宁宫里烂盈门”之句，是说太后结婚时慈宁宫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事实是，据《清实录》载，孝庄是在顺治十年慈宁宫修葺之后才搬进去的。所以，大办婚事，“慈宁宫里烂盈门”，必得在顺治十年之后，但多尔袞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可见“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

张煌言诗之不可信，还可从《建夷宫词》中的另外一首中找到佐证：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这首诗是说清初某皇帝曾经娶了一个怀有遗腹子的孀妇为皇后。揣度作者本意，或者仍是影射孝庄文皇后下嫁这件事，或者是说清代某个皇帝娶孀妇的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首诗所描写的事情都属子虚乌有。孝庄一生仅生过一个儿子——顺治帝福临，那还是崇德三年皇太极健在之时。所以即使她后来下嫁，也不可能出现“错将虾子作龙儿”的事情。此后，直到张煌言被清政府所杀的康熙三年，清朝还从未发生过皇帝娶孀妇为后之事。可见，张煌言的诗确是“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根本没有史实根据。

据《清实录》载，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肃亲王豪格之福晋博尔济锦氏。豪格是顺治帝的大哥，因与多尔衮有矛盾，被多尔衮强加罪名致死。当时多尔衮是炙手可热的皇父，迎娶亲王的福晋为妃，是免不了兴师动众、隆重操办的。又据《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建夷宫词》正是写于顺治七年，诗中所记，看来与多尔衮纳博尔济锦氏有关。

依据这些事实，是否可作一假设：南明大臣张煌言出于对清朝的势不两立和对多尔衮的痛恨，在多尔衮纳妃问题上大作反清文章，编造出了“太后下嫁”的故事。至于诗中涉及的“慈宁宫”，则可能是借明朝旧制讽今。

太后下嫁案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许宝骙

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者有太后下嫁之说。案：此太后当指顺治的生母孝庄（顺治时另一位皇太后为太宗元后孝端），下嫁则谓其再醮于夫弟摄政王多尔衮。明末张煌言《苍水诗集》中有句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殿试策与大库红本及《朝鲜实录》等的记载中，摄政王确曾由"皇叔父"改称"皇父"；以后议摄政王罪状文中有"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孝庄崩后不合葬沈阳太宗昭陵，而别于关内营昭西陵（在今遵化县清东陵），盖因其自绝于夫之故。凡此种种皆为下嫁说之论证，不能谓为无据。孟森（心史）先生本着不轻置信的史家精神多方为之考辨，但也说"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甚且"二百数十年尚传其说"（详见《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我不来考证清史而只说《红楼梦》，不管这是疑案、

是误传还是事实，当时既流传着这样广泛的“小道消息”，《红楼梦》作为一部含有具体内容的政治历史小说，便不会没有反映；就而发其隐微，是则本文之旨。这确属“兹事体大”，而且情节异常突出，欲以假语存真，着笔委实不易。雪芹也只可触处零敲碎打，随事设言托意，表面不着痕迹，细读其中有物。浅见略有所得，拉杂述之于后。

一、书中叙述贾家支派，安排为同胞兄弟两个，即宁荣二公，东西两府。其中，史侯小姐系二房长媳，老来称荣府太君（见第二回，据程乙本，下同），实亦两房硕果。这位贾母，论其地位、身分，特别是按其情节（请细读第五十三、六十四等回），在作者写来，令人大有“一身二任”之感。这种结构布局，难道不是有所影射？

二、第七回写焦大撒野的话：“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前句在书中有着落（当然是暗写），后句则故事里并无此情节，疑系暗指孝庄事。

三、贾家两房四子，按其长幼顺序排列，名为敷、敬、赦、政（见第二回），谐“夫敬摄政”四字一语。其二房两对子媳，则为摄（赦）行（邢夫人）王（王夫人）政（政），又是四字一语。若非出自精心构思，实难信其如此巧合。这里附带指出，这种暗点的手法，书中还有数例：如甄士隐名费，嫡妻封氏（见第一回），谐真废嫡疯四字，显系指胤礽以狂疾被废事。又如全书通写贾、王、薛、史四大家族（见第四回），疑可读作假王血史，则似暗点清初诸王互相夺杀，如多尔衮杀英王阿济格，夺肃王

豪格之福晋为妾；以及雍正翦灭诸弟、喋血友于等事。

四、贾政字存周（见第三回），暗中巧用周公辅成王之典，最为恰当。我总在荣国府里寻找一架屏风，果然竟在第三回中从林黛玉眼里看到了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这就正合周公“负扆听政”的故事。

五、最后，再谈书中一段怪事。夫宝玉者，警幻仙姑推为“意淫”，“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见第五回），画上美人寂寞，都要去望慰一回（见第十九回）；抽柴村女虽死不死，定要为她修庙塑像（见第三十九回）。这是宝玉的天赋特性。正是这样一个宝玉，正是在他硬差焙茗为若玉踏勘庙址（见三十九回）之后不出几日，却单单对千古第一佳丽的水仙庵深表其憎恶之意，并发为破除迷妄之论，自言“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云云（见第四十三回）。这样写来，宝玉在数日之间变了个人，而一天之后仍恢复了本性，这简直是活见鬼。以雪芹文思之细，这能说是无意的疏忽吗？不，恰恰相反，这是有意的对照，意在引读者去深思，而深思便会有所领悟。原来帝王家而嫂叔相恋者，历史上只有甄后与陈思王一例，而洛神一赋正是由此而作。雪芹之所以特写宝玉独恶水仙者，盖心存孝庄之事，而目宝玉为顺治，因表其为人子者之隐痛也。

以上各节，只是些零碎片段。分别言之，各自成理；连贯通观，则多悖谬。设身为作者想，也只能做到这样。

实在说来，假语与真事究竟是两个体系，其间有些情节可以影射比附，却不能形影无间，完全吻合。有时故意造出偏离，甚至形成错乱，亦题中应有之义，大可理解，正堪玩味。反过来说，如果假语竟成真传，则此书也不能流传至今，我们虽欲探微索隐也不可得了。

顺治皇帝的三位皇后

商鸿逵　岑大利

清朝迁都北京第一帝顺治福临，六岁登极，只活了二十四岁，是个青年皇帝。但他却有过三位皇后，一废一疏一爱，情况颇似明世宗朱厚熜。厚熜也有三后，一责一废一立，其中也多蹊跷，此当别谈。今只将福临的三后根源始末探述一下，作为皇帝的家庭问题，写下这一段清朝故实。

根据所知，福临共有十四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如果加上已封东宫，福临死后再嫁孙延龄的孔四贞（四贞，孔有德女，有德战死广西后入宫，延龄为有德部将子），就是十五个了。现在专谈三个皇后。

第一后博尔济吉特氏是内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福临亲政前即被聘为后。顺治八年八月戊午，册立为皇后，举行大婚礼，“庚申，上御太和殿，诸王贝勒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是日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从此朝野上下皆知正宫娘娘已定。过了两年，即顺治十年八月，忽然宣布要废掉她。这一举动引起了震动，汉臣本于封建传统作法，上疏劝谏，礼部员外郎孔允樾激切地说："窃思天子一言一动，万世共仰，况我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同上，卷七十七）结果遭到"上严拒"。令人注意的是，满洲贵族大臣却不发言，有人以为是因为摄政王多尔袞曾参与聘后之事（载《清史稿·后妃传》），此时多尔袞已死，并宣布其罪状，而福临年已长大，坚决要废，遂无人敢言。揆诸事理，应为后者。因为顺治八年二月已揭发多尔袞之罪。八月始册立皇后，主持人当为皇太后孝庄，因而与多尔袞无关。福临亲政后所行之事，多不能顺从孝庄的意旨，此于其遗诏中可以证明。这次废后，竟以"请从上惜""，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清史稿·后妃传》又载"上（福临）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妬，积与上忤。"这也应是后者之动因所致。福临是个纵情任性的青年皇帝，若照和他接触颇多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所讲，他又是"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由此看来，奢侈属于微末，绝非主因，妬则是不容许的。上面谈到的明世宗朱厚熜，其第一后为陈氏，据《明史·后妃传》载："帝性严厉。一日，与后同坐，张、方二妃（后为第二、第三皇后）进茗，帝循视其手。后恚，投杯起，帝大怒。后惊悸，坠娠崩。"

情由虽然不同，性质则是一样。福临自己曾道，他的第一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刻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一举动，靡不猜防，朕故别居，不与接见。”（福临撰《端敬皇后行状》）这位第一后博尔济吉特氏为福临生母孝庄文皇后的姪女，他们的结婚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因为清皇室与蒙古贵族联姻在当时可以起巩固北边的作用，而且孝庄以其同姓亲属配给皇帝又可以掌握内廷的权势。接着，顺治十一年福临再聘第二后，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博尔济吉特氏。绰尔济为寨桑孙，孝庄为寨桑女，论行辈，第二后为孝庄的姪孙女。

第二后的待人处事不同于第一后，“秉心淳朴”，但福临以为她“又乏长才”（据《端敬皇后行状》）。因而对她仍很疏远，并且总是找碴儿压抑她。据《清史稿·后妃传》：“顺治十五年五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而据《清世祖实录》载，是顺治十四年冬孝庄患病，这年十二月丙申愈好，福临为此“发内帑银十万两，一半给八旗兵丁，一半遣官赈济畿辅贫民。”“十五年正月庚子，为此颁大赦诏，曰：帝王以孝治天下，莫大乎事亲。……近者……皇太后圣体违和，朕夙夜恭事，忧念实深。幸赖我圣母懿德素昭，弘庥克迓，仰荷天地祖宗眷祐，今已大安。……遘兹莫大之嘉祥，宜布非常之恩赦。”“其自王公以下，中外臣僚，并

加恩赉。直省逋赋，悉与豁免。吏民一切诖误，咸赦除之。”这年孝庄四十六岁，年事不算高，病非过重，福临如此大举，他定然是想借此作文章，也就是要废第二后。福临在表白董鄂氏的美德时曾讲：“朕为皇太后祷祀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第二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曾未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臣议之。然未令后（端敬皇后董鄂氏）知也。后，后闻之，长跽顿首，因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时，有不焦劳忧念者耶？特一时未及思，故失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端敬皇后行状》）很显然，废此后就是想立董鄂氏为皇后。如果实现此举，董鄂氏的皇后称号，就不是追谥，而是正位中宫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应是由于孝庄的坚决抵制。观顺治十五年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可以证明。再观当顺治十三年四月，建造乾清、坤宁二宫及景仁等宫殿将及告竣，应册立嫔妃。六月，奉皇太后谕：举行册立嫔妃典礼。礼部得旨：先立东、西二宫皇妃。同月，皇太后谕：孔有德女孔氏（四贞）宜立为东宫皇妃。从明以来，宫制东居西上。七月，福临第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八月，立董鄂氏为“贤妃”，又过了四个月，正式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仅次于皇后），并且颁诏大赦（据《清世祖实录》）。在一年当中清宫妃嫔安排无疑是有斗争的。董鄂氏的入宫，似非孝庄所愿。汤若望所说的“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据杨丙辰译《汤

若望传》）满籍军人应为博穆博果尔，夫人应为董鄂氏。而况因董鄂氏受宠，前两后均是孝庄的亲族，一已废，一又将被废，如何能容忍？据《清史稿·后妃传》载，这位第二后对孝庄感情深厚，“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不豫，太后朝夕奉侍。及太皇太后崩，太后悲痛。诸妃主入临，太后恸甚，几仆地。”

董鄂氏为满洲世族，三代武职，父名鄂硕，隶正白旗。据《清史稿·鄂硕传》，原以军功于顺治九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十三年（董鄂氏入宫之年）擢内大臣。十四年，以其女册封皇贵妃，进三等伯。董鄂氏入宫凡四年，死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她虽然宠冠后宫，所行并无失德。福临于所撰行状中的一些过份赞美之词固不能认作真实。但述及一事，反映出其性情温善，行为谨慎。当她的父兄死时，行状记到：

“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拭泪对曰：‘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所以痛悼者，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俱，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此时终，荷陛下恩邮，礼至备，妾复何恤哉？’因遂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宜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

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安。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

据此可以略见董鄂氏的母家情况。董鄂氏有弟费扬古，十四岁袭鄂硕三等伯爵。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之役，费扬古分兵三路齐攻噶尔丹，展开鏖战，大胜之，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走死。康熙帝玄烨说：“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合，遂统兵西进，……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清史稿·费扬古传》）为清初满将的佼佼者。

福临对董鄂氏确存在着一种异乎常态的狂恋。董鄂氏逝世，他曾闹着要出家当和尚，尽管其中还有其他因素，而董鄂氏之死给他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虽然和尚未能当成，可是曾经削发，并起了“行痴”的法名（耿先：《续指月录·玉林琇》）。

总结顺治帝的三后，一废，降为静妃；一要废未废，并且老寿，直到康熙五十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仅长于玄烨十三岁，颇受其尊奉。清制，后帝而死的后妃不合葬，此第二后遂别造陵曰孝东陵；一死后追封为皇后，即端敬皇后董鄂氏，乃与福临合葬“孝陵”，同时合葬者还有玄烨生母佟氏，本汉族女，抬旗称佟佳氏，入满洲，康熙二年死，年二十四岁。孝陵造成，与同葬。

福临的家庭问题，在清代实具特异。《清史稿·后妃传》载：“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

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孝庄）始命罢之。”这与董鄂氏入侍当有关系。又康熙以后的后妃皆出身旗籍，再无藩部蒙古女，此变化亦或有因。这篇短文所述固属帝王家务琐碎，不足以语政事大端，然亦涉及一些内廷规制，作为清宫掌故观之可耳。

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

孟　森遗稿

往年辨董小宛之非董鄂妃，作《董小宛考》，已刊入《心史丛刊三集》。后又于《清世祖出家事考实》中详列董鄂妃事实，入《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近又于档案中得世祖过宠董鄂事证，汇加叙论，亦清代一大故实。世祖虽有过情，董鄂却无败度。后其弟费扬古有名绩于康熙朝。读袁随园《抚远大将军费襄壮公传》，笔墨飞舞，令人向往。世祖之于董鄂，事虽过中，不失为英主钟情佳话，弥可存也。

《清会典》：册立皇后礼成，颁诏天下。册封妃嫔无颁诏。事例所载定例皆同。惟顺治间册封董鄂氏为贵妃，独有殊典，不为后世成例。《事例》载：顺治十三年，册封皇贵妃，前期一日，遣官祇告太庙。时世祖章皇帝驾幸南苑，于行宫正殿阅册宝，命正副使持节至隆宗门，转交内监奉节及册宝入宫。皇贵妃受册宝行礼均如仪。内监传

告礼成，以节授正副使，正副使持节复命。翌日，以册封礼成颁诏天下。

《清史稿·世祖本纪》：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丁丑（初四日），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东华录》书于是月己卯（初六日），差二日。《东华录》据实录；史稿亦应有清国史馆旧撰本纪可据。今未见旧撰本纪，应以《东华录》为信。且诏文内明著其为初六日，尤见史稿之非确，此亦史稿可订正之一端也（按：标点本已改正）。诏文黄榜，原藏内阁大库，今存北京大学史料室，备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帝曰：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天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所有事宜，条列如右：

一，自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凡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叛逆，子孙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告夫，奴婢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及贪官衙蠹受赃，监守自盗，拖欠钱粮，侵盗漕粮员役，亦在不赦；其余死罪俱减一等。军罪以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

讦者，不与审理，以其罪罪之。

一，今岁朝审，候决人犯至一百三四十人，无知罹辟，独外生成，深可悯恻。其在京朝审过，见在候决犯，俱与减等发落。

一，各直省司府州县，见在监候秋决各犯，亦准一体减等发落。

一，文武官员，除贪赃及大计处分，失陷城池，缉盗不获，罪犯越狱，拖欠钱粮漕粮，违误钦件期限，审事徇情等罪不赦外，其余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各该衙门奏明宽宥。

一，武职官员，除贪赃及军政处分，失陷地方，纵兵抢掠，拖欠钱粮，违误钦件限期，审事徇情等罪不赦外，其余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各该衙门奏明宽宥。

一，应追赃私，除贪赃侵盗情重不赦外，其余察原系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该督抚察确题请豁免，不许株连亲族。

一，各地方人等，有因叛逆干连原系无辜者，该督抚按即与具题释放。

一，啸聚山海拥众不服者，果能真心来归，除赦其前罪外，仍破格叙擢。如其中有能擒斩叛首，反正投诚，并与不次擢用，以示劝酬。

一，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逼，情实可悯。如能改过自首者，准赦其罪。

一，各处依附土贼等众，如悔过擒拿贼首投诚，及贼首率众来降者，概宥前罪，仍与官职，以示鼓励。

呜呼！殊恩荡荡，法宥过以施仁；嘉祉绵绵，衍贻谋而昌后。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董鄂妃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追封皇后，加谥"孝献"，事迹具官书者不复述。其殊礼，在董鄂丧中臣工奏事，用蓝笔批答，前此独见于张宸笔记，已叙于《世祖出家事考实》中，所谓蓝笔至当年岁杪为止者也。后检史料室档案，所发见蓝笔批答之本，确符张宸所记。兹据所见揭之。

顺治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按御史张问政题：巡历已周，敬陈粤东兵民交困等事。所请军士缺饷，敕部严催协济。敕将有荒州县分三等，特立章程，分别劝惩。拨春花园租银，分给雷、廉二府牛种。　　蓝笔批：该部议奏（批在八月十九日后）。

又七月二十八日，浙江提督田雄题：欲平巨寇须办全力事。此疏首叶已破损，不见批答，末尾清字批尚存。当时本章，皆前半由前至后为汉字，后半由后至前为清字，首叶汉字批，末叶清字批。此蓝笔批清字，亦系该部议奏。

又八月二十日，浙江巡抚史记功题：紧急军需事。蓝笔批：着察核。该部议奏。

又九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抚徐永祯题：特纠贪酷异常等事。此疏首已缺，其事由从贴黄。其蓝笔批清字五字。

又十月初三日，宗人府和硕安亲王岳乐题：查议射箭不到事。　　蓝笔批：依议。

又初六日，广西巡抚于时跃题：报提督伯（线国安）启程就道日期事。　　蓝笔批：该部知道。

又同日同官同人题：违旨行监大干功令事。　　蓝笔批：该部严察议奏。

又同日，吏部尚书孙廷铨题：遵旨考满事。　　蓝笔批：是。席特讷给与表里各二匹。

又十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孙廷铨题：遵例考满事。　　蓝笔批：依议。

又十月十二日，光禄寺卿哈代题：招补厨役，并请复旧例以收实用事。　　蓝笔批：该部议奏。

又同日同官同人题：职掌殷繁，请添官员事。　　蓝笔批：吏部议奏。

又同月十三日，兵部督捕左侍郎喇哈达等题：豁免流徙解役事。　　蓝笔批：依议。

又同日同官同人题：拿获四次逃人事。　　蓝笔批：三法司核拟具奏。

又同月十五日，山东巡抚许文秀题：考选军政官员事。此疏前半缺，据贴黄补具事由。蓝笔批清字五字。

又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孙廷铨题：州县迁转太迟，总因开复稽迟。谬陈立限报销，并酌升责抵之法，以襄用人实效事。　　蓝笔批：依议。

又同月二十九日，湖广巡抚张长庚题：钱粮虚报不清

等事。　　蓝笔批：户部核议具奏。

又十一月二十六日，甘肃巡抚佟延年题：道缺难裁事。疏首缺，事由据贴黄。　　蓝笔批清字三字。

又十二月初九日，吏部尚书孙廷铨题：补授佐领事。蓝笔批：孟魁补授佐领。

又同月十三日，刑部尚书杜立德题：遵旨逐件分疏具奏事。　　蓝笔批：吴自谨依拟应斩，李卯、张二俱依拟应缓，都着监候秋后处决。

又同月十四日，同官同人题：特纠贪吏等事。此疏首缺。蓝笔批清字八字。

又题本缺后半，不详月日之解任经略洪承畴奏销钱粮一本。　　蓝笔批：该部核议具奏。

今查清代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之丧，即无此制。董鄂妃丧则蓝笔批本至四个月有余。此世祖之过举，所以自著于明年遗诏之中者也。世祖崩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距辍用蓝笔之期止有七日耳。七日间自用朱笔。其世祖丧中复用蓝笔所批之本，今在档案中所已检得者，惟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王弘祚题给与俸禄事。　　蓝笔批：是。其不足银十六万两，着手御用监取给，不必给折与缎匹。

是年二月自初二日起，所见之外官题本，俱无蓝笔批，盖批在二十七日之外。至京部奏本，二月二十九日乃有户部尚书车克题共四疏，皆朱批。可见出二十七日即为不用蓝笔之日矣。

《会典事例》：于列帝及历代太后、皇后以及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之丧，礼皆备。独无董鄂妃或称端敬皇后之丧，盖以其难为典要，已屏诸丧制之外。

妃丧仪内，崇德六年九月十七日，关雎宫宸妃薨，典礼隆重，惟有奉移时临送礼。初祭、周月祭、大祭、二周月祭，各祭礼，太宗皆亲临。又二月再行大祭，太宗及孝端后皆亲临。如此而已，于外朝事无与也。

董鄂氏贞妃殉死之丧。十八年正月初七日，贞妃薨，一应礼仪，悉从妃例。顺治初年定，妃嫔之丧，皆内务府掌行，临时请旨。

列帝之丧，未除服前，票本用蓝笔，各部院衙门文移用蓝印，二十七日而除。各衙门本章，于十五日进奏用朱印。

圣祖之丧，二十七日内，各部院文移皆用蓝印，惟奏章过十五日后用朱印。诏旨蓝笔批答。

世宗之丧，未除服内批本用蓝笔。各部院行文皆用蓝印。奏章俟十五日后再行具奏，均用朱印。奉旨：是。过十五日以后仍用蓝笔。

高宗之丧，未脱孝内批本用蓝笔。各部院奏章，俟十五日后再行进奏。二十七日内奏疏文移俱用蓝印。

仁宗丧仪，百日内上谕批本用蓝笔。各部院奏章，俟十五日后具奏。二十七日内奏疏文移俱用蓝印。

宣宗之丧同仁宗。穆宗又同。德宗丧不在事例内。

太后之丧。顺治孝端文皇后丧，在顺治六年，不言批

本笔色及印色。孝庄文皇后丧在康熙二十六年，二十七日内部院衙门文移皆用蓝印，惟题本用朱印，诏旨蓝笔批答。孝惠、孝康两章皇后丧，孝惠在康熙五十六年，孝康在康熙二年，俱不言笔色及印色。

皇后之丧。孝诚、孝照、孝懿三仁皇后丧，俱不言批本笔色及印色，以后皇后皆不言。

雍正朝以下太后之丧，孝恭仁皇后丧在雍正元年，不言批本笔色等事。孝圣宪皇后丧在乾隆四十二年，二十七日内，上谕用蓝笔，各衙门题本文移用蓝印。孝和睿皇后丧在道光二十九年，同上。

至于皇后之丧，孝慎成皇后丧在道光十三年，十三日内，各衙门文移用蓝印，奏疏仍用朱印，无批本改用笔色事。孝全成皇后丧在道光二十年，同上。

孝静成皇后丧在咸丰五年，同孝圣宪皇后。此系太后丧。孝贞显皇后丧在光绪七年，同上。亦系太后丧。孝哲毅皇后丧在光绪六年，不言批本用印等事。此更属变礼。毅后殉穆宗，不得其死，既非太后，亦非当时之后。

以上备详清列帝、列后丧制中用蓝笔之限制，可证世祖时董鄂妃之丧礼，宜为清世所讳言。纪载中无张宸笔记发见于改革之后，世尚未知有此事，非档案中发见如许蓝笔批本，亦无由证明张宸所记之确也。

附：赘　言

商鸿逵

这是孟心史师的一篇遗稿。由于他发现清顺治帝福临封董鄂氏为皇贵妃所颁诏书黄榜原件，又检得档案中当时蓝笔批本，写成此稿，用以补证其《董小宛考》、《清世祖出家事考实》之文。福临对董鄂氏的一切举动，确是特殊。于晋封时颁布诏书，大赦天下；死后以其弥留时遗言，下谕刑部，对全国“监候各犯，概从减等。”诚如福临遗诏所云“诸事太过，踰滥不经。”遗诏本出太后（福临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正是由于有此特殊，引起对顺治朝二事之探索：一、董鄂氏的来历；二、福临的结局。兹特附赘所见，作为一点补充。

关于前者，《清史稿·后妃传》记：“董（作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同书《鄂硕传》说董鄂氏为满洲正白旗人，三世以军功袭职。鄂硕本人官至内大臣。女册封皇贵妃，进三

等伯。董鄂一家隶属上三旗，是皇帝的亲信。这样人家的女儿，年及十三、四岁必须报选秀女。按照“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的定例，董鄂氏是有资格做妃嫔的，而况其才其貌，当选之后，必不致久居下陈。但综观官书所记宫闱情状，太后并不喜悦董鄂氏，皇后更因董鄂氏得宠而“不当上怙”。因此，我觉得董鄂氏可能是入宫后被指配别一皇子。清制：秀女入宫，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指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九）。本此推度，她应该是入宫后又出宫而后入侍福临的。

今简列《世祖实录》有关记载于此：

顺治十三年四月，建造乾清、坤宁二宫及景仁等宫殿，将及告竣，应册立嫔妃。

六月，奉皇太后谕：举行册立嫔妃典礼。得旨：先册立东、西二宫。

同月，皇太后谕：孔有德女孔氏（名四贞，育养宫中，年尚幼小。）宜立为东宫皇妃。

七月，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年十六岁，福临第十一弟，福临行九）。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襄亲王逝世，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

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

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先于二十五日遣官祭襄亲王。

十二月，正式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颁诏大赦。

从这些活动迹象来看，如关于典礼丧仪的安排，令人感到董鄂氏和博穆博果尔必定有着何种关系，决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幼弟新逝，不忍举行纳妃典礼。还有，董鄂氏不是由嫔位以下提升的。那么，自当别有来历。从太后先指定孔四贞为东宫皇妃一事，说明董鄂氏之立，必非太后之意。因此，其中必有曲折的情节存在。清皇族在关外及入关后一段时期，对婚配本不拘守汉人所重伦纪。董鄂氏先配博穆博果尔，后归福临，是完全可能的。

今于官书之外，有一私家著作可参。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曾记道：

>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六六〇年（按应为一六五七年。董鄂氏死于一六六〇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按应为三个多月，本年旧历十月至明年正月）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亦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杨丙辰译魏特《汤若望传》）

清初爱新觉罗子孙经常领兵出征，称博穆博果尔为军人，不足为怪。当时在北京的汉官如吴伟业等对此事也并

非无所见闻，但只能隐约于吟咏，决不敢明言。西洋人则无此顾忌。今以官书对参汤记，个中情节已得十之八九，从而年十八入侍一语也就得到了注脚。

关于后者，福临系死于痘疹恶化，已无疑问。当时满人最害怕此症，蒙古人不出痘者，不准来北京；汉人居京者出痘，全家迁往郊外。福临很长时间住在南苑，即为避痘。至于出家之说，虽然出于民间附会，但却不排除福临有过出家的念头和准备。他不仅自取“行痴”法名，并且更剪掉发辫（耿先《续指月录·玉林琇》）。后来出家愿望未能实现，乃命所瞩太监吴良辅做替身，还亲到恫忠寺观其祝发（张宸笔记）。这就是出家传说的由来。

说到福临这个人，他虽然具有一定的才能，而纵情任性，做出事来，往往超越常轨，宠妃和出家，正是由此发生。还可举其一事。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郑成功率兵进入长江，围攻南京。福临闻讯后，先打算退走关外，经母亲申斥，便又大发雷霆，用剑砍碎御案，喊着要亲征。他的奶母来劝阻，就连她也要砍。若和他的儿子康熙帝玄烨相比，当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三藩叛变，举国沸腾，这时玄烨才二十岁，比福临当年还小一岁，却能镇定如常，从容应付，终获全胜，而他则实在远远莫及。

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

于善浦

一、从容妃墓谈起

容妃墓座落在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的裕妃园寝之中。这座园寝背靠郁郁葱葱的昌瑞山，左依乾隆皇帝的裕陵，右傍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裕妃园寝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初称妃衙门，按妃园寝规制建有宫门、享殿、燎炉、宝顶等主要建筑，周围红墙。后来，因为葬入一位皇贵妃而命名为纯惠皇贵妃园寝，增建了宝城、明楼和配殿。在苍松蔽日的园寝深院中，从乾隆十一年葬入仪嫔等人开始，至道光二年葬入璟妃为止，经历了七十七个春秋，先后埋葬了乾隆皇帝的三十六位妃嫔。其中有一位皇后、二位皇贵妃、五位贵妃、六位妃、六位嫔、十二位贵人、四位常在，除宝城下的大宝顶内葬有皇后和纯惠皇贵妃外，其余三十四位横排五行，均各自为券。按《陵寝易

知》所记，容妃就安葬在宝城东侧第二排第一号墓中①。

容妃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②。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容妃金棺奉安纯惠皇贵妃园寝③。容妃墓的规制与其他妃墓相同，在月台上建宝顶，宝顶下为地宫。容妃墓的月台面阔10.34米，进深13.53米，露明高0·78米，宝顶下口对径7·15米，上口对径6.35米，高为4.55米。月台的角柱、阶条和踏垛的垂带、级石均用青白石。月台包砌台帮，俱为特制的砍细澄浆城砖。

二、容妃墓出土文物

容妃墓的修建距今将近二百年，由于自然损毁和解放前人为的破坏，已残破不堪。一九七九年十月初，墓前踏垛级石塌陷。从塌陷处露出的洞口向下看，地宫门楼的飞檐、瓦垄和兽吻、横梁历历在目。已敞开的巨大石门几乎被地宫中积年渗水所吞没。经过排水之后，才显露出地宫的原来面貌。地宫由两个券堂组成，均为栱券式石结构，其中金券面阔4.8米，进深与中高同为5.15米。宝床面阔4.8米，进深3.57米，露明高0.43米。宝床上的清式红漆棺木因解放前被盗而移位，棺木东西向横置。棺头正中有金漆手书的回部文字数行。棺木南帮被盗墓者用利刃砍了一个长1.75米、宽0.6米的大洞。棺内空空无物，仅有一寸多厚的淤泥。在金券四壁和石门上，挂满一层白色海绵状的灰碴，从所存的水线测出地宫积年存水约深2.5米。在清除宝床上的泥灰浆时，于棺木西侧发现一具头骨。在

西北角棺木下，发现一批衣物残片，其中混杂着尸骨和没燃尽的木屑、松枝，这是盗墓者照明时所遗留的。经过清理，可辨认的衣物有：金黄地绣花龙袍、蓝地缂丝金龙五彩风云龙袍和钉绣龙袍的残片。蓝地妆花织成龙袍料（幅宽72厘米），机头上织有“江宁织造臣成善”的字样。酱地妆花寸蟒（幅宽76厘米），机头上织有“江宁织造臣成善”和“机匠王奇”的字样。驼色团龙杂宝缎（幅宽70厘米），机头上织有“苏州织造臣四德”的字样。黄地八宝花绫（幅宽86厘米），机头上织有奇特的文字。八达晕锦褥套一件。青缎衬帽（女朝冠内的衬帽）一顶，前面的佩饰大部拆除，仅存嵌有红宝石的银蝙蝠饰件，帽边钉有用青罗编结的小辫。堆绫花卉“寿”字荷包一个。花白发辫子一条，长85厘米，扎有头绳。包头青纱一块。还有各色宝石、猫睛石、钻石、珍珠、耳环、琉璃珠、累金丝饰件残片，以及牙齿和指甲。

容妃墓所出零星残碎的物品，并非奇珍异宝，然而，在考证容妃时却是极其可贵的资料。第一，棺木上的回部文字，它是判定容妃所属民族和生前信仰的有力证据。按清代习俗，后妃死后的棺木上多镌刻或书写藏文或梵文经咒。而容妃棺木上独特地书写着回部文字。把可辨认的文字译成汉文是：“以真主的名义”……。这充分证明容妃生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尽管在皇宫内廷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死后居然能将《可兰经》中“以真主的名义”等文字写在棺木上。这种照顾回部信仰的办法，和乾隆帝在

《喇嘛说》一文中“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办法是同样性质的。这是清朝皇帝的统治手段之一，宗教为政治服务。第二，墓中所出的猫睛石，它是后妃朝冠上所嵌的装饰品，证实了容妃死后是戴着朝冠入葬的。皇帝、皇后和妃嫔冠服都有一定规制，朝冠上嵌猫睛石也有明文规定：“皇太后朝冠饰猫睛石七块”④，“皇贵妃、贵妃同皇后朝冠不饰猫睛石”、“妃冠上嵌猫睛石”⑤，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四日容嫔封妃时，赏赐物品中有“金累丝凤朝冠一座，嵌猫睛石一块、三等东珠九颗……”⑥这些文献上的记载与墓中所出的猫睛石相吻合，证明容妃死后是以妃礼入葬的。第三，墓中所出花白发长辫，说明了容妃入葬时的年龄。据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同志说，清朝后妃以及品官命妇在穿朝服戴朝冠时，均梳长发辫。从现存的花白发辫来看其年龄与文献上的记载相吻合。乾隆三十八年容妃四十千秋⑦，以此推算容妃死时为五十五岁。第四，墓中所出朝袍及衣料，不仅证明容妃死时穿着妃子等级的朝袍，而且和赏赐衣物以及入葬年代的文献完全符合。容妃生前由嫔晋妃时，赏赐吉服二件，其中“八团龙褂已前赏过不赏，唯再赏给金黄绣九龙袍一件”⑧，这种妃子等级的龙袍与墓内所出绣龙袍残片相符。墓中所出两件妆花织物，在机头上都织有“江宁织造臣成善”的字样。文献记载，成善在乾隆五十三年任江宁织造⑨，在这一年内，他的奏事、请安、进单等折件就有二十多封⑩，墓中所出成善款的妆花织物正是这年进呈之物。另一件驼色杂宝团龙

暗花缎，机头上织有“苏州织造臣四德”的字样。按文献记载：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四德任杭州织造，多次进京呈送贡品⑪，自四十九年改任苏州织造，仅乾隆五十三年呈奏事、活计成数、晴雨录等折件近三十封。不仅墓中驼色杂宝缎为四德所进，容妃生前大量织物也是苏州所进。如：杏黄缎绣八团龙满地凤云袍⑫，杏黄缎蟒袍，绣石青、大红、鹅黄缎大小荷包二百对，绣各色扇套二十个，还有青紫、大红、鹅黄素缎五疋，杏黄、藕荷、绿色、紫色实地纱和芝麻纱八疋，青绉纱包头，大翠花、红头绳等⑬都由四德所管理的苏州织造所置办。第五，墓中所出八宝花绫，上面所织的奇特文字，有待进一步探讨。历来墓葬中所出文字对考证墓葬历史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而容妃墓中所出花绫上的奇特文字，虽经四处请教，无有识者。因借本文发表之际，将它公布于众，有待国内外识者鉴定。这对进一步研究容妃会有更大的帮助。综上所述，容妃葬于东陵是确凿无疑的了。

多年来传闻所谓乾隆帝有个回妃葬在新疆之谜，如今已解开了。关于容妃的生平，在本文中还要进一步说明。文献上所载：“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麦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妃，薨。”⑭高宗是清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在位六十年，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死时八十九岁。这一时期历史上常称为“乾隆盛世”。高宗生前还自称“古希天子”、“十全老人”。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

汉各族都有，至于乾隆皇帝四十多名妃中有一名回妃，本不奇怪，可是在容妃死后的一百多年内，却引起了一批骚人墨客的兴趣，在容妃身上大做文章，甚至编造出一个“香妃”的名字。从野史、诗词到舞台，绘声绘影大肆渲染，竟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诗词、戏曲中的人物是可以编造的，但是发展到排除史实、以假乱真的程度，就不得不作辨伪的工作了。这次在调查墓葬的基础上，参阅了一些有关著录，并得到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大力支持，将珍贵的档案汇集起来，用以澄清那些有关容妃的不实之词，还容妃以本来面目。

三、容妃生平

容妃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五日，她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世居叶尔羌⑮，其族为和卓，故称容妃为卓氏，亦称霍卓氏。其父阿里和卓为回部第二十九世⑯，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平定准噶尔时，解救了曾被囚禁的墨特二子霍集占（小和卓）和波罗泥都（大和卓）。后来霍集占弟兄又叛乱。容妃的哥哥图尔都因为反对割据，不屈顺于叛酋霍集占弟兄，他将全家从天山南路的叶尔羌迁往天山北路的伊犁居住，到了乾隆二十三年闻知清朝政府征讨霍集占的军队已到达叶尔羌，容妃的五叔“额色尹偕同图尔都”⑰及其堂兄玛木特，配合政府军队作战，平息了霍集占等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来额色尹、玛木特被召入京师，乾隆皇帝以额色尹等为派噶

木巴尔的后裔而加封为辅国公，玛木特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容妃的哥哥图尔都入京后也封为一等台吉⑱。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额色尹、图尔都、玛木特都参与了正大光明殿的大宴。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部振旅凯旋⑲，这年的四月初一日“谕军机大臣等，额色尹、玛木特、图尔都和卓安置京师，著照伊等应得俸银，赏给禄米，以资养赡，嗣后在京安置回人俱遵照办理”⑳。容妃的亲属从此定居京师，屡次受到皇帝赏赐，图尔都受赏次数尤多。这年容妃随同其六叔帕尔萨和堂兄玛木特之子巴巴等家属入京师。就目前所查到的史料所载，容妃首次在宫中出现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㉑，这一年六月福建巡抚吴士功进献的十八桶荔枝树结了二百多个荔枝，这种南方生长的果树在北方结实甚为稀罕，宫中后妃在接受赏鲜荔枝的时候，容妃以和贵人的封号出现，时年二十七岁，乾隆皇帝五十岁。和贵人在宫中历年多次受到赏赐，象闽浙总督呈进的蜜荔枝、陕甘总督呈进的哈蜜瓜，她都按份受赏。按宫中典制，贵人每年赏银一百五十两，和贵人每年在九月十五日生辰时都领到这样的赏银。每逢十二月下旬由御茶房按年例赏赐皇后、妃嫔等干果品，和贵人按份领得绿葡萄干、白枣干、荔枝干、白葡萄干、藏杏、藏枣、莲子、藕粉、耿饼等。和贵人进宫后，于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六至十五，回部杂技也被召入宫表演，其中玩小羊、玩绳杆、斗羊等艺人都受到了赏赐㉒。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

谕旨，册封和贵人为容嫔，时年二十九岁。五月二十一日授册，“命兵部尚书阿里衮为正使，礼部侍郎五吉为副使，册封霍卓氏为容嫔。册文曰：……尔霍卓氏，秉心克慎，奉职惟勤，壸范端庄，礼容愉婉，深严柘馆，曾参三缫之仪，肃穆兰宫，允称九嫔之列，兹仰承皇帝太后慈谕，册尔为容嫔……”㉓在这一年里，容嫔的哥哥图尔都“追论攻克喀什噶尔功晋封辅国公”㉔。容嫔每年宫分赏银三百两，物品也增多了，在宫中很得宠。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南巡，同行的后妃有：皇后、令贵妃、庆妃、容嫔、永常在、宁常在等六人，随着皇帝到过江南的苏州、杭州等地。乾隆皇帝按照回部的习俗赏赐容嫔许多食物，其中有涿州饼子、祭神糕、奶酥油野鸭子、羊肚片、羊他他士、油煠果、苏州糕、酒炖羊肉、晾狍肉、鹿觔羊肉等八十多个品种㉕。他的叔叔额色尹，和哥哥图尔都在宫中也多次受赏阳羡茶和碧螺春茶。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懿旨，容嫔著升为妃㉖，此时容妃三十五岁。因为容妃在宫中平时穿着回族衣服（见容妃遗物册），所以在封妃前夕于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专有行文为其传做冠服。“容嫔封妃现无朝服、吉服，应赏给处，赏给。其项圈、耳坠、数珠，应添换之处，添换。”“容嫔封妃，天鹅绒朝冠一顶传做，染貂朝冠一顶传做”，“赏给其吉服袍褂二件，八团龙褂已前赏过不赏，惟再赏给金龙绣九龙袍一件”，这年十月初六日命大学士尹继善为正使，内阁学士迈拉逊为副使，持

节册封容嫔霍卓氏为容妃。册文曰：尔容嫔霍卓氏，端谨持躬，柔嘉表则，秉小心而有恪，久勤服事于慈闱，供内职以无违，夙协箴规于女史，兹奉皇太后慈谕，册封尔为容妃……。乾隆三十一年，皇后死，乾隆皇帝不再册立皇后，容妃在宫中的地位逐年升高。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三日至四月初七日，容妃跟随皇帝东巡，同行的妃嫔有：皇贵妃、庆贵妃、颖妃、豫妃、容妃、顺嫔，这次东巡曾到过泰山和曲阜，一路之上得到赏赐的食物有：自来红、回子饽饽、羊肚丝、羊西尔占、爆肚、五香鸡、香笋炒醃菜、拌粉皮、拌老虎菜等五十多种。在四月初四南海子新衙门行宫吃晚饭时，赏皇贵妃全猪肉丝，赏庆贵妃祭神肉炖白菜，赏容妃奶油野鸭子[27]。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容妃四十千秋（实际生日为九月十五日），皇帝赏赐她无量寿佛、玉如意、青玉寿星、银晶象耳双环瓶、玛瑙灵芝盃以及银两、锦缎等大批物品[28]。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容妃随乾隆皇帝到盛京。在随同前往的六位妃嫔中，容妃已名列第二。此次曾到沈阳故宫，并拜谒清太祖的福陵。一路上赏赐容妃的食品有：粘散粉子饽饽、鸡汤老米膳、杂脍热锅、烧鹿肋条、羊肉汆子面、野鸡挂面、额思克森、鸭羹热锅等三十多种。八月二十一日晚饭时，妃嫔们吃野猪肉，另赏容妃烧鹿肉。八月二十四日行至围场，猎得野猪一口、狍子一只，赏容妃时另赐狍肉一盘[29]。此时在宫内专设有回回厨师，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五斋宫进晚膳时，回回厨师努倪马特因为了做二道名

菜“滴非雅则”、“谷伦杞”，而受到皇帝奖赏。正月十五日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宴，容妃居西边头桌首位。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澹泊敬诚殿宴会上，容妃仍居西边头桌首位。到十二月乾清宫殿内设万寿节大宴时，容妃已升为东边第一桌第二位了[30]。在宫中容妃多次为乾隆皇帝进菜，皇帝也深知容妃所爱，每逢宫内赏赐哈蜜瓜时，总把最上品的花皮回子瓜单赏容妃，其他妃嫔则赏二等青皮瓜。“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太监刘秉忠奉旨着查容妃今年五十岁该赏何物，随遵旨查得乾隆四十五年颖妃五十岁赏过如意一盒、古玩九件、锦缎九疋、银元宝九个、藏香九束，具折片一个奏过，奉旨亦照此例赏，钦此”[31]。容妃生辰为九月十五日，本应在乾隆四十八年庆五十寿辰。为什么延至四十九年初才赏赐，有待考证。自乾隆五十年起，容妃在宫内大宴上很少露面。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和十月初四，容妃娘娘在御药房取药[32]；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单独多次赏给容妃枣糕、桔饼、柿霜、梨膏、西瓜、耿饼等物品，从这些材料可看出容妃于乾隆五十年以后有病。在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赏容妃春桔十个[33]之后，相隔五天容妃就死了，时年五十五岁。她临死时，对宫中朝夕相处的妃嫔和本宫女子等以及她娘家的叔叔、婶婶、嫂嫂、姐妹都寄以无限的深情，她把毕生积存的全部衣物和珍贵的首饰分赠给他们留作纪念[34]。

容妃和她一家，为了反对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

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从乾隆二十五年六月至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容妃在宫中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这本应传为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而野史上传说她是一心为叛乱分子效忠、在宫中手持白刃而遭皇太后赐死的“香妃”，这完全与容妃的真实史料不符，纯属无稽之谈。

至于容妃是否遍体生香，则无从考证。总之，乾隆皇帝只有一个回部的妃——容妃。现在，从地下发现的实物和传世的档案都证明，容妃在宫中二十八年，死后葬在遵化东陵是确凿无疑的。一个平常的妇女，死后也没有运回娘家下葬的道理，何况皇帝的妃怎么能在死后在自己原来的部落下葬呢？从以上一系列的实物和史料可以证明，传奇性的故事是不能代替历史的。

---

① 《陵寝易知》陵寝图考卷一，光绪三十二年。

② 《清皇室四谱》卷二，唐邦治著，民国十二年。《陵寝易知》卷三。

③ 《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昌瑞山万年统志》卷一第二册。

④ 《清宫史续编》卷四十九典礼，四十三冠服。

⑤ 《钦定大清会典》冠服。

⑥ 《内廷赏赐例》三，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立。

⑦ 《内廷赏赐例》四，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⑧ 《内廷赏赐例》三，容嫔封妃赏物。

⑨ 《江宁织造呈送库使石图履历考语清册》，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⑩ 《日记档册》（上）（下），乾隆五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⑪ 《进小菜底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起。

⑫ 《容·绣杏黄缎净八团龙满地风云袍料工银清册》，乾隆五十年十

月初四日。

⑬ 《容·绣蟒袍褂拉领袖缎匹等项料工银两清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⑭ 《清史稿》后妃传。

⑮ 《西城同文志》派噶木巴尔属。

⑯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八杂录。

⑰ 《回疆通志》额色尹传。

⑱ 《回疆通志》图尔都传。

⑲ 《起居注》，乾隆二十五年一月至四月。

⑳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至四月。

㉑ 《哈蜜瓜蜜荔枝底簿》，乾隆二十四年至四十四年。

㉒ 《银两月积》宫中杂件乾隆各年。

㉓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一卷，乾隆二十七年。

㉔ 《回疆通志》图尔都传。

㉕ 《江南节次照常膳底档》，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止。

㉖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百十二第二十一页，乾隆三十三年六月。

㉗ 《山东照常膳底档》，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三起至四月初七日止。

㉘ 《内廷赏赐例》四，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立。

㉙ 《盛京照常节次膳底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六日。

㉚ 《节次照常膳底档》，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止。

㉛ 《内廷赏赐》五，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立。

㉜ 《用平安丸底簿》，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十二月。

㉝ 《赏赐底簿》，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实际至五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㉞ 《容妃遗物》宫中杂件，乾隆五十三年。

珍 妃 之 死

周 熙

北京紫禁城庭院里的水井，都筑有琉璃瓦盖顶的小亭，四周围着汉白玉栏杆。在东北角的一个小院里，却有一口普通水井，井口极小，什么装饰也没有。这就是慈禧淹死珍妃的地方，俗称为珍妃井。

封建时代的帝王生活，夫妻之间的关系，有着许多礼法、虚套子，没有家庭生活的乐趣。珍妃是光绪皇帝心爱的妃子，年轻貌美，性情活泼，工翰墨、善奕棋，能拉会唱。她敢于打破陈例，不被虚套束缚，有时穿皇帝的服装，扮作光绪；有时扮作太监，陪光绪在养心殿办事。在生活和政治上受到压制的光绪，心情十分苦闷的时候，珍妃给了他很大的安慰，成为光绪的爱妃，而独揽大权的慈禧却恨透了她。

光绪十九岁大婚时，慈禧将她胞弟桂祥的长女塞给光绪，命他选为皇后，这就是隆裕皇后；同时以侍郎长敍的

珍妃像

两女珍、瑾为嫔。隆裕比光绪大两岁，其貌不扬，光绪对她没有好感，很少接触，却宠爱珍妃。使慈禧更为不满的，是珍妃赞同光绪变法图强的主张，成为她的政敌。甲午战争后，瑾、珍两姐妹曾被革去妃号，褫衣廷杖；两妃的哥哥志锐，被谪于乌里雅苏台。

瑾妃跟她妹妹不一样，胆小怕事，甚至对她妹妹也怀有妒意。珍妃继续被慈禧虐待，打入冷宫，而瑾妃没有受到更大的摧残，只是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挟持光绪逃走之前，命令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把珍妃从三所提出来。

被禁闭冷宫与外人隔绝，度着凄惨岁月的珍妃被带到院子里来了。她面色憔悴，战战兢兢地跪在慈禧脚下。

这时，随侍的太监都被打发到游廊拐角，院里只有慈禧和两个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准备逃出京师的慈禧，穿着兰布旗袍，挽着“旗头座”式发髻，冷冷地对珍妃说：“洋人就要进城，兵荒马乱，在这里万一受到污辱，丢了皇家的体面，对不起祖宗。”

珍妃叩了个头，说：“老祖宗可以离京暂避，皇上应坐镇京师，力挽危局。”

慈禧冷笑了一声，斥责她说：“你死在眼前，还敢胡说！”她指着院里的那口井说：“赐你一死，下去吧！”

“老祖宗，求求你，让奴婢跟皇上见一面。”

“还想皇上庇护你？死去吧！”

首领太监崔玉贵把井盖挪开，瞧着珍妃。珍妃泪流满面，抽抽咽咽地说：“奴婢死不足惜，这大清江山……”

慈禧大声命令崔玉贵：“把她推下去！”

崔玉贵连挟带提地把珍妃拉过去。在悲惨号哭声中，珍妃被丢进井里，盖上了井盖。

随后，西太后一伙人仓皇地走出神武门，逃离京城，绕道到西安去了。

慈禧死了之后，珍妃的姐姐瑾妃为了纪念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妹妹，在这口井北面的房子里，布置一个小灵堂，供着珍妃的牌位。院子里的那口井，从此被叫做“珍妃井”。

清朝汉族公主——孔四贞

刘　潞

清初，曾有一位名叫孔四贞的汉族公主。清皇室的天潢贵胄理应尽是满族人，怎么会赐封一名汉族公主呢？这其间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孔四贞的父亲孔有德，原是明朝镇守辽阳的一名参将，明末降清，顺治初年封为定南王，后来成为清政府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其它抗清力量的得力干将。顺治七年，孔有德率清军打到广西，杀了宁死不降的南明东阁大学士瞿式耜，从此驻军桂林，镇守广西。

顺治九年五月，一直活跃在西南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余部——大西军，北伐抗清。起义军在李定国率领下，由川东入湖南，打到广西。一路所向披靡，节节获胜。七月初，大败孔家军，将孔有德围困在桂林城。孔无路可走，只好手刃爱妾姬，聚其珍宝于一室，闭门自焚。大西军进城后，杀了孔氏全家，唯有女儿孔四贞被其部下线国安救

出。

孔家军当时是清王朝镇压全国抗清斗争的一支主力军。孔有德之死，对政权尚未巩固的清政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消息传到京中，顺治帝深感震惊，下令撤朝"痛悼"。后来，世祖与皇太后（即孝庄）悯有德歿于王事，令将四贞送入宫内由太后抚养。于是，孔四贞就从广西来到北京，住进皇宫。

顺治十一年，孔有德灵榇自广西经北京运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安葬。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皇帝特命"葬车至日，应遣内大臣、礼部官员各一员迎奠。并令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官往迎"。"往东京时，仍令诸王大臣会送，给银四千两造坟，工部立碑"。接着，又派礼部侍郎恩格德给孔四贞另送去白银二万两，供她日常生活之用。孔四贞接受赠银后，又提出："臣父骸骨，原命归葬东京，但臣兄既陷贼营，臣又身居于此，若将父骸送往东京，孝思莫展，请即于此地营葬，便于守视"。顺治帝欣然允诺，不但将孔有德安葬在京城，还以"定南武壮王孔有德建功颇多，以身殉难，特赐其女食禄，视和硕格格。"从此，孔四贞成了清宫中的一名公主。据说孔四贞十六岁时，孝庄皇太后打算把她嫁给顺治帝为妃。但她却申明，自幼父母作主，已许配给其父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皇太后不好勉强，只得给他们完婚，并赐第西华门外。

康熙五年，孔四贞因家口众多，费用浩繁，向朝廷提

出就食广西的请求。清政府准许了她的请求，并任命孙延龄为广西将军。孔、孙举家南迁，从此一直住在广西。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等三藩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发动叛乱。孙延龄碍于孔家与三藩的老关系，也参加了叛乱，受封临江王。对丈夫的反叛清廷，，孔四贞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不仁不义。因此，她时时规劝丈夫归顺清朝。孙延龄与吴三桂因权势之争，彼此不和。孙叛乱不到三年，便表示要投降清朝。这个消息不慎被吴三桂获悉，吴以欲收复广东为名，派其孙吴世琮从云南来到桂林，将孙延龄暗杀。孙死后，孔四贞落入吴三桂手中，被拘往云南。直到清军最后攻克昆明，扫平三藩，孔四贞才回到京城。据说死后葬在京西即现称为公主坟的地方。

孔四贞之所以受到清王朝如此厚遇，其真正原因，是由于清入关后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清王朝从关外起，就重用明末降清的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封以高官显爵，赐予重禄厚俸，使他们竭诚为清王朝进取中原卖力。在降清武将中，孔、尚、耿以及后来的吴三桂，力量最强，是清王朝在全国建立政权的依靠力量。

当孔有德自焚身死，孔家军遭到李定国大西军重创时，南方还激荡着抗清斗争的风云，存在着永历南明小朝廷。这无疑是清王朝统一全国的严重障碍。因此，清廷仍然要利用吴、耿、尚等降清汉官的力量。顺治十一年，孔家军的部将线国安、李菇春率军击败大西军，再度盘踞广

西。孔四贞就成为孔家军的一个招牌，也是清廷维系吴、孔、尚、耿四家的一条重要纽带。孔、尚、耿三家是世交，他们同是明总兵毛文龙的部将，孔四贞又是吴三桂的养女。清政府深知对他们必须持积极、慎重的态度，故而孔有德死后破例由太后抚养孔四贞，赐封公主，恩宠有加。然而当孔家军及其它三藩的作用消耗殆尽，孔四贞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了。康熙朝以后，随着政权在全国范围的逐步确立与巩固，清政府对孔家及其它三藩由依靠变为控制。因此当孔四贞举家迁往广西时，清政府便乘势将她的名份由和硕格格降为郡主，并明确规定“下不为例”。就这样，孔四贞成了清王朝二百余年中绝无仅有的一位汉族公主了。

和孝公主——乾隆帝的掌上明珠

汪菜茵

清代乾隆皇帝共有十个女儿，其中有五个女儿早殇，未及加封。和孝公主乃乾隆第十女，即最年幼的一位公主。

和孝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年正月，即乾隆帝六十五岁时。道光三年九月逝世，年四十九岁。母惇妃汪氏，汉族人。乾隆帝后妃众多，仅葬在清东陵的就有四十一个。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惇妃被列在乾隆所封的有名氏的十八个后妃之中的第十七位，在容妃（民间称为香妃）之上。《清史稿·后妃传》谓："惇妃，汪氏。尝笞宫婢死，上命降为嫔。未几，复封。女一，下嫁丰绅殷德。"惇妃虽曾因打死宫婢而获罪被贬为嫔，但她生的女儿仍被乾隆帝视为掌上明珠，所享的待遇均在她的四个姐姐之上。

《清史稿·公主表》载："高宗第十女，惇妃汪氏

乾隆帝画像

生。封固伦和孝公主。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丰绅殷德。”又附载：“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乘金顶轿。”按清朝体制，皇后所生之女才能封为“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妃嫔所出者，封“和硕公主”，品级相当于郡王。乾隆帝的其他四个公主的封号分别为：三女，封固伦和敬公主，孝贤纯皇后生；四女，封和硕和嘉公主，纯惠皇贵妃苏氏生；七女，封固伦和静公主，孝仪纯皇后生；九女，封和硕和恪公主，孝仪纯皇后生。和孝公主既非中宫（皇后）所生，又非皇贵妃的女儿，只是由于受到乾隆帝的特殊宠爱，才按皇后之女的“固伦公主”称号加封，甚至在尚未出嫁时即赐乘金顶轿。

惇妃画像

乾隆帝之所以格外恩宠他的幼女，从出生在乾隆年间的礼亲王昭槤著述的《啸亭续录》一书中可以略窥一二。书中说："和孝公主，惇妃所生，为纯皇帝最幼女。上甚钟爱，以其貌类己，尝曰：'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渥。"昭槤比和孝公主年长五岁，是满清宗室皇族之一。《啸亭续录》写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之间，和孝公主则死于道光三年。昭槤所记应是可信的。

固伦和孝公主经乾隆皇帝指婚，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给和珅的独生儿子丰绅殷德，时年十五岁。和珅是

乾隆的宠臣，官至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权极一时，宠任冠朝列。皇女之婿，在有清一代称为“额驸”，亦即历代所谓的驸马。固伦公主下嫁后，丰绅殷德被封为固伦额驸，品级与固山贝子相同。丰绅殷德官至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

据记载，固伦和孝公主不仅没有恃势凌人，相反对于和珅的专横暴戾颇为不满，因而经常规劝其夫不可骄纵。一年冬天，地上积雪甚厚，丰绅殷德偶弄畚锸作拨雪戏。公主见到后立刻责备说：“汝年已逾冠，尚作痴童戏耶？”最后丰绅殷德只得向公主“长跽请罢乃已。”《啸亭续录》记载道：“驸马恃和相势颇骄纵，公主曰：‘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果不出所料，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嘉庆帝即位不久，即宣布和珅二十条罪状，终被赐死。和珅伏法，家产被籍没，廷臣议夺丰绅殷德爵位和职务。父亲获罪，株连儿子，这在封建社会是情理中事。终因固伦和孝公主的关系，嘉庆帝未夺丰珅殷德爵位。《清史稿·和珅传》附载丰绅殷德事略，记载这件事说：“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清史稿·公主表》也说：“和珅得罪，籍没。仁宗命留资为主养赡。”

《清史稿》载，丰绅殷德不久被公主府长史奎福诬告“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后经“廷臣会鞫，得诬告状。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

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按《大清会典》卷三十七载：在国丧期内“近支宗室二十七月内不嫁娶。远支宗室及在京王公百官，期年内不嫁娶。”丰绅殷德的侍妾在乾隆国丧期内生女儿，触犯了丧礼制度，他当年留袭的爵衔终被褫夺了。嘉庆十一年，丰绅殷德又获伯爵封号，“授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这当然“亦以公主故推恩也”。

据昭槤说，丰绅殷德中年慕道，与方士辈讲养生术。丰绅殷德因患喘病，嘉庆十五年解任回家。他痨病死后，和孝公主持家政十余年，内外严肃，赖以小康。丰绅殷德无子，以其胞叔和琳的儿子丰绅伊绵袭轻车都尉。道光三年九月，公主去世，道光皇帝曾亲临皇姑陵前奠醊。和孝公主的一生恩宠有加，但她能不倚仗皇父权势，跋扈非为，却能治家遵法从严，这在封建社会是少有的。

和孝公主轶事点滴

冯佐哲

一

和孝固伦公主系乾隆第十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孝公主十四岁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时，乾隆帝特于是年五月初二日颁发上谕："凡下嫁外藩固伦公主，例支俸银一千两。如系在京住者，即照下嫁八旗之例支给。从前和敬固伦公主，虽系在京居住，而俸银、缎疋仍照外藩之例支领，年久未便裁减，是以降旨仍许照旧关支。今和孝固伦公主，系朕幼女，且在朕前承欢侍养，孝谨有加。将来下嫁后，所有应支俸禄，亦著一体赏给一千两，以昭平允，而示嘉奖。"

二

洪业（煨莲）先生在《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文

中，曾提及和孝固伦公主小像问题，云：

去年偶于琉璃厂得所谓和相行乐图影片，有跋云：岁庚申，在厚载门外书肆，见人持宫装行乐女像一帧。貌颀而瘦，敷色工雅。审其签标十公主影像。以直昂未议。且云：'其家尚有衣冠男像一，定次日携至肆中一观，即此梅花行乐图也。带黄而袍衩开四，须眉如五十许人，知非尚主之丰绅殷德，实殷德之父致斋和珅之像（按：和相父子均赏用四开衩袍）。嗣以语满洲绍襄侍卫，绍襄因浼余代为购存。公主像已为西人持去矣。绍襄捐馆，像归于伯衡同年。伯衡嘱余题识，然犹不敢遽定也。偶以示完颜亮生、子中昆仲'。子中云：'二十年前曾至和相家祠，见和珅行乐数轴，与此正同。其为和相之像无疑。'盖丰绅殷德之女孙适瓜尔佳承霖（官直隶霸昌道）。其所生女，即子中夫人。故子中与和相家有连，新正贺岁，睹其祠堂影像，因了然其服饰形状云。今其家日益衰落矣。和相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宜乎身获重戾。睹其嘉庆己未上元狱中对月诗，悽怆动人，亦可哀也已。丁卯嘉平月既望，长白宝熙题并书"。关伯衡先生，瑞梧女士父也，去年已故。琉璃厂商人云，原图早又易主矣。

此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燕京大学校刊》（今收入《洪业论学集》）。可见和孝固伦公主确有小像流传后世，如得之，可与今传世之所谓"香妃像"比视一番，以辨真伪。又，丰绅殷德曾过继一子名富那，跋中提及之丰绅殷德之女孙，也许即为富那之女，待

考。

三

和珅事败后，其子丰绅殷德，特别是十公主并未受多大牵连。后来嘉庆帝、道光帝对和孝公主仍待遇优渥，非同一般。现举数例如下：

（一）据丰绅殷德《延禧堂诗钞》、《嘉庆万寿庆典总汇画样》、《史料旬刊》第十四期等记载，和珅抄家后，其在海淀之花园“十笏园”（即淑春园）之西半部仍赐予和孝公主及丰绅殷德居住，东半部则赐予成亲王永瑆居住。又据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三日上谕，和孝公主在丰绅殷德死后，因无力修葺十笏园，才于嘉庆十九年九月交给内务府管理。

（二）据清宫档案《内务府堂呈稿》记载，嘉庆十五年五月嘉庆帝曾令内务府大臣派人在新立屯地方为和孝公主修建公主园寝。

（三）《内务府堂呈稿》还记载，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内务府曾令直隶省宝坻县催迫和孝固伦公主府（按：公主府在今北京市景山东街，清末改为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址）庄头康衍庆缴纳欠交租银：“今派公主府三等护卫忠敏、家人钱统仁前赴该县收领前项租银。”嘉庆十七年元月、嘉庆二十年十月，嘉庆帝几次下谕旨，要和孝公主府事务坐办堂郎中福宁管理好和孝公主府的庄园栾州长春庄的地亩及租税。

（四）嘉庆十九年五月，嘉庆帝见和孝公主开支见绌，特赐给白银六千两，并令其放债收息；以供消费。《奏销档》还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奴才英和谨奏为请旨事，前蒙恩赏给和孝固伦公主银六千两以佐用度，自应遵旨生息，妥为筹划。奴才再四思维，拟将此项赏银六千两全数发达长芦监政，按一分生息，遇闰增加，每年所得利银以五月、腊月两次解交内务府广储司，由司拨给公主府为费用之资，较之置地之虞，如蒙俞允，俟命下之日，即行知长芦监政，委员领取。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嘉庆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五）道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奏销档》记载，"总管内务府谨奏，遵旨查得嘉庆四年查抄和珅入官'恒升当'一座，原成本十四万吊……著加恩赏给公主，以资日用。钦此。"

（六）道光二年，道光帝下谕旨，把"从前查抄和珅西直门外白石桥入官地六顷余亩，附近伊家祖坟，著加恩赏还和孝公主作为祭田。"

和孝公主的妆奁

万　依

《清朝野史大观》所载的清宫遗闻，多系辛亥革命以后的传闻，不写出处，令人难于置信。但有些条目，抄自清人笔记，也不无可信之处。如《和孝公主》一条，即抄自《啸亭杂录》，其前半段仅与原文有十几个字修辞上的差异。《啸亭杂录》系礼亲王昭槤所著，内容大体准确，尤其是有关皇家的故事，更不会虚构。在《清朝野史大观·和孝公主》中说："和孝公主，惇妃所生，为高宗最幼女，上甚钟爱"，并说："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上大喜，赏赐优渥。下嫁于和相子丰绅殷德"。这些均与历史相符。

《皇室四谱》载，和孝公主，惇妃所生。惇妃汪氏为都统四格之女。档案记载，惇妃，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生，乾隆二十八年被选入宫，十八日新封为永常在，时年十八岁，而乾隆皇帝已五十三岁。不过，惇妃还不是最后

入选的女子，最后选进宫的有金常在和循嫔两人，这年弘历已六十六岁。

永常在于乾隆三十三年进为永贵人，三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封为惇嫔，三十九年十一月进为惇妃，次年正月初三日生下弘历最小的女儿——十公主。十公主满一周岁的时候，即四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晬盘日，赏给她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玉扇器等很多玩器。

乾隆四十三年，惇妃因殴毙使女，曾受到降级为嫔的处分，但不久又复妃号，可能与宠爱十公主有一定关系。十公主年方六岁，弘历即将她指配给当时权势最大、最为富有的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和珅十岁的儿子丰绅殷德为妻，也说明弘历对十公主的关照。

当十公主长到十三岁时，被破格地封为固伦和孝公主。按常规，妃嫔所生皇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皇后所生皇女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又据档案载，因十公主自这年三月二十六日起留头发，准备下嫁，于三月二十日赏她一批珠宝绸缎，到二十六日又赏给十公主镶松石如意一柄，伽南香念珠一盘，汉玉扇器四件，并赏给丰绅殷德金镶松石如意一柄。

乾隆五十四年，十公主十五岁，决定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嫁。按规定，自然要赏赐一笔妆奁，档案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宫中赏赐各种物件的清单，约可分七类：

（一）头饰

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十颗。

金凤五只，嵌五等东珠二十五颗，内无光七颗；碎小正珠一百二十颗，内乌拉正珠二颗，共重十六两五钱。

金翟鸟一只，嵌碟子一块，碎小正珠十九颗，随金镶青金桃花垂挂一件，嵌色暗惊墨小正珠八颗，穿色暗惊墨小正珠一百八十八颗，珊瑚坠角三个，连翟鸟共重五两三钱。

帽前金佛一尊，嵌二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二枝，嵌五等东珠二颗。

金镶珊瑚头箍一围，嵌二等东珠七颗，重四两七钱。

金镶青金方胜垂挂一件，嵌色暗惊墨小正珠二十四颗，穿碎小正珠二百四十九颗，珊瑚坠角三个，重四两五钱五分。

金嵌珊瑚项圈一围，嵌二等东珠五颗、五等东珠二颗，重五两四钱。

鹅黄辫二条，檀石背云二个，珊瑚坠角四个，加间三等正珠四颗，四等正珠四颗。

双正珠坠一副，计大正珠六颗，二等正珠六颗，加间碎小正珠六颗，金钩重一两七钱五分。

金手镯四对，重三十五两。

金荷莲螃蟹簪一对，嵌无光东珠六颗、小正珠二颗、湖珠二十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九块、蓝宝石二块、碟子一块，重二两一钱。

金莲花盆景簪一对，嵌暴皮三等正珠一颗、湖珠一

颗、无光东珠六颗、红宝石十二块、碟子一块，无挺，重一两五钱。

金松灵祝寿簪一对，嵌无光东珠二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十颗、碟子二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碧牙玄二块，重二两。

以上是一批首饰，从这些详细记载中可想象到在合卺宴上公主头上珠光闪烁的情景。

（二）朝珠

清代皇家有一种象征着高级权贵的特殊装饰品——朝珠。这种朝珠可用各种宝石珠玉缀成，十分华贵，只有皇室主要成员和高级官员能够佩戴，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戴的。和孝公主的妆奁也有各式各样的朝珠，包括：

碎小正珠朝珠一盘，计珠一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纪念，银镶珠背云，嵌小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八钱五分。

以下每盘朝珠都有这样详细的记载，为了节省篇幅，下面不得不略去详细说明，只抄一个品名。

又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其细部与上一件不同），珊瑚朝珠一盘，又珊瑚朝珠一盘，青金石朝珠一盘，催生石朝珠一盘，松石朝珠一盘，又松石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又蜜蜡朝珠一盘。

（三）皮衣

绛色缎貂皮袍、青缎貂皮褂、青缎灰鼠皮褂各两件，

青缎天马皮袍、绛色缎灰鼠皮袍、绛色缎羊皮袍、绛色绸羊皮袍、绛色缎上衣羊皮下接银鼠皮袍、石青缎貂皮褂、石青缎绣八团金龙貂肷皮褂、石青缎绣八团白狐肷皮褂、石青缎缀四团夔龙银鼠皮褂各一件。

（四）衣料

各种绸、缎、纱、绫共九百四十匹，细目从略。

（五）各种用具

金镶玉草筋二双，商银痰盆二件（以下每件重量从略），银粉妆盒一对，银执壶一对，银茶壶一对，银盆二件，银壶一把，银盒二件，银盒一对，商银小碟一对，镀金盒一对，银杯盘十份，银壶四把，银匙四把，玉杯八件。

（六）梳妆用品

象牙木梳十匣，黄杨木梳二十匣，篦子十二匣，大抿二十匣，剔刷一匣，刷牙刮舌十二匣。

（七）陈设品

摆紫檀格子（即多宝格）用：青汉玉笔筒、青玉槓头筒、青玉执壶、汉玉仙山、汉玉鹅各一件。

摆紫漆案用：汉玉璧磬、汉玉半璧各一件。

摆紫漆琴桌用：汉玉磬、汉玉璧、青玉瓶各一件。

摆黑漆笔砚桌用：汉玉笔架、汉玉璧、汉玉水盛各一件。

紫檀画玻璃五屏峰（风）簡妆二座（每座随玻璃镜一面）。红雕漆长方屉匣十对，雕紫檀长方匣六对，红填漆

菊花式捧盒二对。

同一天，还赏给额驸丰绅殷德朝珠二盘，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帽前金佛一尊，帽后金花一枝，镀金嵌碧牙玖四块瓦一副，银镀金嵌温都鲁四块瓦一副，象牙牙签筒一件，虬角牙签筒一件，集锦荷包二匣、小刀二把。各种皮袍、皮褂十二件。另赏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每名女子各赏有皮、棉、袷衣，丝缎衣料，银项圈，铜耳坠。并赏给户口男人十一人，女人十一人，户口管领夫妇二人，也各赏有衣服。

此外，还赏给公主、额驸做衣服、被褥、帐幔等物用的绸、缎、纱等八百五十九匹，以及黄猩猩氈二丈一尺，红猩猩氈一丈八尺七寸，绣缎领、袖十副，绣纱领、袖三副，绒线四十四匣，三等金线七百三十四子。

这些陪送物已是洋洋大观了，但还不是全部。另外，也许是出于对十公主的特殊宠爱，又加赏了一批妆奁。这批加赏的妆奁有：紫檀嵌玉如意一盒(九柄)，红填漆菊花式捧盒八对，黄彩漆八方捧盒七对，雕漆填金捧盒二对，填漆透风八方捧盒八对，彩漆皮圆盒五十件，银珐琅里镶嵌玳瑁面盆七件，广珐琅面盆四件，铜镜四面，玛瑙把镜四件，珐琅把镜四件，紫檀支镜十件，翠顶花钿边三十份，翠凤二十匣，翠花六十匣，小抿二十匣，篦子八匣，刷牙刮舌八匣，剔篦二十匣，剔刷十九匣，旧锦缎绸里袷被三件，大红缎绣花卉高桌围四个，缂丝扇套片十片，缂丝香袋片十四片，绣香袋片五十六片，绣缎镜套料三十六

片，小荷包料八十八对，绺丝镜套料二片，西洋线络单一块，绣纱帐子一件，绣纱幔子二件。

这份档案所记的只是从宫中赏出的首饰衣物，作为和孝公主的妆奁，仍然不是全部，因为还有通过礼部等处备办的礼物，尚不包括在内。

十公主下嫁后六日，即十二月初三日，公主和她的丈夫丰绅殷德进宫行回门礼，这时又赏赐给她们一批厚礼，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总之，从十公主下嫁所赏赐给她的妆奁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自己六十五岁时新得的小公主是比较钟爱的，足资证明《清朝野史大观》所抄的《啸亭杂录》上的这一条材料并非杜撰。

粉侯辱御史

汪菜茵

在清代历史上，载入《清史稿》的最后一位公主，并非皇帝的女儿，而是一位亲王之女，名为荣寿固伦公主。

据《清史稿·公主表》记载，亲王和郡王之女被皇帝特许留在宫中抚养、并被赐称公主的，有清一代共十二人。其中被赐称和硕公主的九人，被赐称固伦公主的仅三人。第一个固伦公主是顺治帝所抚从兄简亲王济度之次女，她初被赐称和硕端敏公主，雍正元年又被赐称固伦端敏公主。第二个固伦公主是康熙帝所抚弟恭亲王常宁之长女，初赐称和硕纯禧公主，雍正元年又被赐称固伦纯禧公主。第三个固伦公主即咸丰帝所抚弟奕䜣之长女。

“固伦”、“和硕”，均系满语，“固伦”是“国”的意思，“和硕”则是“旗”的意思。按《大清会典》规定，被赐封固伦公主的应是皇后所生之女，品级与亲王相等。其他诸王之女育于宫中者，一般赐称和硕公主，品级

与郡王同，可享受妃嫔所出之女的同等礼遇。清代的前两个固伦公主都是雍正年间由和硕公主加封的，而奕䜣之女却是直接被赐封荣寿固伦公主，享受皇后之女的礼遇，那就不同一般了。

恭亲王奕䜣系咸丰帝之异母弟。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逃至热河避暑山庄，翌年死于承德。恭亲王奕䜣是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的主角之一。“辛酉政变”成功后，慈安、慈禧两宫垂帘听政，由恭亲王秉政。奕䜣遂成了赫赫有名的议政王、军机大臣，并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总揽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神机营等外朝内廷的大权。西太后慈禧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乘坐四人轿，真是不可一世。

奕䜣长女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当时，慈禧对奕䜣恩宠有加，因而泽及其女。同治初年，西太后宣召奕䜣之女进宫生活，破格赐称荣寿固伦公主。父亲既有炙手可热的显赫权势，女儿也就身价百倍，睥睨天下一切了。

前述三位固伦公主，为什么有的称固伦纯禧公主，有的则称荣寿固伦公主呢？据记载，乾隆朝之前公主的封号乃置于固伦（或和硕）之后，即称固伦（或和硕）某某公主。嘉庆朝才把封号改冠于固伦（或和硕）之上。道光二十四年，宣宗明确谕定，先列封号，其次才分别固伦或和硕，即呼某某固伦（或和硕）公主。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荣寿固伦公主下嫁志端为

妻。据《清史稿》记载，志端，姓富察氏，是世袭一等诚嘉毅勇公景寿之子，任职都统，一品荫生，与公主成婚后被赐予双眼花翎。志端之父景寿，娶道光帝第六女即孝静成皇后所生的寿恩固伦公主为妻。父亲娶一个固伦公主，是个额驸，儿子又娶一个固伦公主，又是个额驸。亲上加亲，代代皇亲国戚。但志端与荣寿固伦公主成婚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年轻的荣寿固伦公主骄横跋扈，仗势欺人，世人皆畏之。道光、咸丰年间大学士柏葰之孙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对荣寿固伦公主有一段记载："荣寿公主，恭亲王长女也。同治初，育于宫中，封固伦公主（亲王嫡出之女，皆为郡主，此特封者也），下嫁于六额驸之子志端，不半年而寡〔按：《清史稿》载，志端于同治十年卒，即他们共同生活有五年之久〕。其后屡承特恩，赐金顶轿，增护卫。凡出入，行人皆回避，车马停止让路，予屡遇于途，皆策马入巷避之。光绪初，锡席卿尚书（珍），官副都御史，遇诸市，其顶马偶犯卤簿，为公主驺从所捉，并其车夫皆押于协尉官厅中。锡无法前行，亦羁于官厅。后经协尉声明，叩求于轿前，始放行。"

对于朝廷命官锡尚书在公主轿前受辱，当时的宗室盛伯希（羲）也为之忿忿不平，曾在其祭酒诗集中戏谑地写有《捉御史》七古一章：

车如鸡栖马如狗，绣衣使者蹒跚走。
车如流水马如龙，四姓小侯行斗风。

黄尘薄日长安路，玉勒珊鞭竞驰骛。
驺唱之仪不听前，纷纷旗校影缨怒。
乱箠挝马马横触，进退仓皇真击毂。
旋抽左右又参差，我未断鞅君脱辐。
大驸喊怒坌来前，一僮一仆絷送官。
触忤粉侯罪当死，又向车中捉御史。
御史觥觥立殿中，南台况复称端公。
翁主犹须避赤棒，贵游孰敢干青骢。
千步清道九华盖，王公皆当顿轭待。
奈何翻欲截角来，凭藉张皇毋乃太。
圣明四海方照临，强宗乃尔相凌侵。
朝廷不惜赫赫法，御史偏有休休心。
挥鼠辈鼠等闲耳，细事何须告天子。
旁观父老亦咨嗟，还是大臣知大体。
峨冠怒马犹断断，暂从亭长赦宪臣。
亭长叩头还告语，今朝姑纵御史去。
（《郁华阁遗集》卷一，光绪壬寅刻本）

从诗中可知，荣寿固伦公主作风狂肆，朝野侧目，达官显贵对这位“粉侯”尚且有所畏惧，世人更是退避三舍了。

清代第一次选秀女

刘　潞

清王朝自顺治到光绪的二百余年间，九个皇帝朝朝都曾大张旗鼓地举行选秀女活动。皇帝们都说这乃是“遵循祖制”。查一查清代的官文书，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时，全无关于选秀女的记载。其实那时正忙于进行各部落间的吞并战争，尚无暇“选秀女”。据《大清会典》载，选秀女始自顺治年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清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行送阅。未经阅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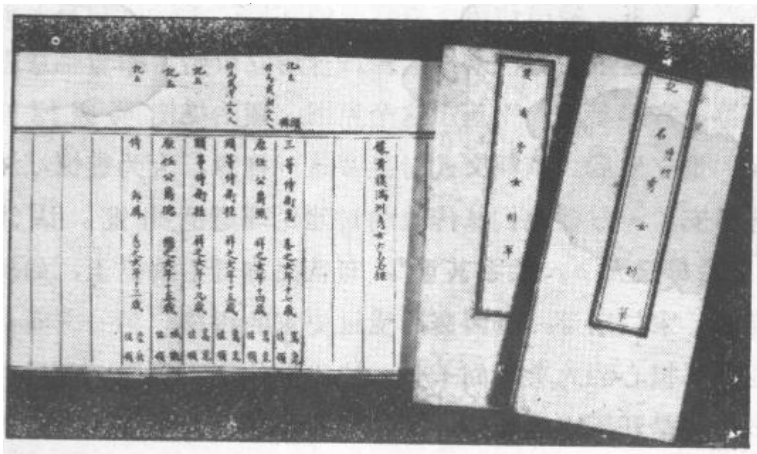
女子及记名女子，私相聘嫁者，自都统、参领、佐领及本人父母族长，皆分别议处。”

那末，顺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什么要举行选秀女活动呢？从《清实录》可知，顺治皇帝六岁登极，十四岁举行大婚，二十三岁死去，在位仅十七年，而在这十七年中，前七年又是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那时顺治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选秀女之事根本提不到日程。多尔衮虽然专横，却也从未选过秀女。这一点，从顺治为追黜多尔衮而拟定的罪状中可以找到证明。显然，第一次选秀女应发生在多尔衮死后。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于塞北喀剌城。翌年，顺治帝亲政；同年八月，举行了大婚礼，册立科尔沁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按理说，大婚之前举行选秀女应是最理想的时机。事实却没发生过选秀女之事。顺治在两年后曾明确宣称：“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伊始，即与朕意志不协，宫闱参商。”基于这个原因，顺治提出要废掉博氏，重立皇后。满朝文武对皇帝这一打算，大为震惊，深感不安。一方面他们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认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有些史称贤主的君王，如汉光武、宋仁宗等，都因废后受过史家的指摘；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清入关时间不长，统治地位还不巩固，废后之举不应是开国之君所为，深怕因此而在朝野引起动荡，所以纷纷上疏反对。但“君为臣纲”，皇帝要办的事情，岂

能容大臣阻挡？何况顺治正值春秋鼎盛，血气方刚。大臣们的反对，反而促使他下定了废后的决心。顺治十年八月，他下令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顺治自大婚后两年来，一直因多尔衮为他“包办”婚姻而耿耿于怀。为了弥补两年来的遗憾，顺治把选择皇后的范围，从宫中已有的妃嫔，扩大到全国满蒙八旗人家。这年十月，他下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这次选秀女，只限于满蒙官民，由于居住分散，且多在边陲之地，从上谕颁布，到各家打点行装，将女儿送至京城，也还是要相当的时间。因此，这项活动前后进行了半年多，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择定了科尔沁蒙古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废后静妃的姪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并于同年六月举行了大婚礼。



清宫选秀女排单

尽管顺治在前述上谕中没有使用“选秀女”这一语汇，但为解决皇帝配偶、而在满蒙官民女子中大规模进行选阅的作法，与后来所谓“选秀女”的活动，却是完全一致的。清人吴振棫就指出，选秀女的目的，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至于顺治这次选秀女的安排，并不如《会典》要求的那么完备。这说明某种制度的确立，总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候选秀女违制抗上

羊　司

清朝有一整套独具特点的选秀女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规定凡年届十三至十七岁之八旗满籍女子，均须按年向户部具呈备案，届期至京师紫禁城供帝后选看。所有京城及各地参加被挑选的适龄女子，都要先期启行，下车后，聚集于神武门内，按年龄排班，然后循序由太监引入顺贞门，备帝后相看选挑。制度周详，气氛隆重，规秩严密。当选之秀女，或为皇帝妃嫔，或被指配亲王、郡王及皇子、皇孙。

据《清宫述闻》引述《春冰室野乘》载，咸丰朝的一次遴选秀女期间，竟发生了前所未遇的违制抗上事件，因而使这年隆重的盛举草草收场。

这事发生在咸丰初年，时值禁中大选秀女，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军兴，风靡一时，并已攻占长江重镇南京，清室惊恐，朝野惶乱，以至咸丰帝“忧劳旰食，每枢臣入见

议战守事，至日昃乃退”。国事虽在危急之秋，而选挑秀女之事仍照常进行。坤宁宫门外那班当选候驾的秀女，多属闺中年轻幼小女子，一经远离家门，辞亲别故，加以舟车劳顿，食宿不惯，其心绪不宁的景况自不待言。

清朝选秀女事，悉由内务府主持，执事员司暨太监等，分担禁卫、整饬、排班、传谕等一应职责，彼等只能恭谨遵照上谕执差，不敢稍有疏略，但见秀女交头私语，逾班喧嚣等事，辄加呵斥。而上述那些“民家女子入宫禁已战慄不自胜，又俟驾久罢，倦不能耐，重以饥渴交迫”，因此有些秀女不免“相向饮泣”。

龙廷宫苑之地，帝后选美之期，“相向饮泣”，是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圣意相违悖的。备选女子，不能遵制守纪，监者岂能坐视不顾？为防干犯上怒，自身蒙受科罚，一监者遂近前叱之曰：“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正在悲悽的秀女，听到斥责，相顾失色，愈发“战惧欲绝”。正当监者想要再度恫吓之际，忽有某氏女勃然起立，挺身而出，厉声语监者曰：“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耶！”未及监者开口，女又曰：“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南京），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欢，而弃宗社于不顾……。吾死且不

畏，况鞭笞乎？”

此女这番义正词严的言论，真是石破天惊，监者震撼，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只得“急掩其口”，不许该女再说下去，以弭祸端。恰在这时，“上适退朝，御辇已至前”。监者遂赶忙“牵诣上前抑之跪”，而“女犹倔强不肯屈膝”。实际上，这时节“初，女所言，上已微闻之”。咸丰帝笑问其故，“女侃侃奏如前语”。受到此女这等严词斥责，但皇帝只说了声：“此真奇女子也！”并“亟命释女缚，令引入宫中朝见皇后”去了。据载，该女朝见了皇后，值某邸初丧偶，谋续娶，“因以女指婚焉”。由于当时发生了这件事，结果，除某氏女一人为皇族宗室王公做了续弦外，其余所有这届候选秀女均放归原处，以“皆宁其家”。

吴士鉴为此事著有清宫词一首，词云：“女伴三旗结队偕，绣襦锦襜映宫槐，褐牙已命南征将，选秀仍闻撂绿牌。”

另据《湘绮楼文集》，也载及此事，说这个“直辞女童”为满洲人，其父为京营四品官，职位是参领抑或佐领则未详；对该女愤懑议论皇上之后，咸丰帝默然良久地说：“汝不愿选者，今可出矣。”就是说，某氏女在这件事情中，是被“温旨遣出”，不再列作选挑之属（即所谓“撂牌”）；其父受到降职一级处分。其后某氏女之归宿如何，已难予详考，但该秀女违制抗上的史实，看来是确有其事的。

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

唐国耀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人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1657年）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因为考试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公开贪赃受贿，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人花了银子没有考上，于是投状叫冤。顺治皇帝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

李振邺等，中试举人田耜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濬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士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门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

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阝”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江宁书坊店里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长洲尤西堂侗又作了一部传奇名《钧天乐》，也是讲考试行贿买通关节之事。《钧天乐》这本书一直流传到京师，闹得满城风雨。

顺治十五年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这次是吴珂鸣文列第一，当了解元。他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其中“不为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亦不受乡党无足轻重之誉”句，一时为世人所传诵，都说他有宰相风度。据《池北偶谈》云，顺治帝对吴珂鸣大加赞赏，特赐他进士及第。

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此案的审理一直延续到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更为轰动。吴兆骞为江南名士，号汉槎，江苏吴江人。平日，大家都认为他的文章“惊才绝艳”，而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麐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他的《生查子·古意》写道：

“秋高紫塞风，阵阵衔芦雁，盼断别时音，尘暗书难见。昨岁灞桥头，折柳看如线。又是玉关春，絮捲天涯远。”

康熙十五年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和明珠长子纳兰性德关系很好。顾贞观托纳兰性德在他父亲面前代为说情。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五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吴兆骞和顾贞观经常以词代书。其中吴兆骞的《寄顾

舍人书》最为感人：

“嗟乎，此札南飞，此身北滞，夜阑秉烛，恐遂无期，惟愿尺素时通，以当把臂，唱酬万里，敢坠斯言。”把一股悲愤慷慨的生离死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顾贞观回寄的《金缕曲》二首，也写得极情深：

“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摧人泪下。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吴兆骞的好朋友，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他赎回来。徐乾学官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辛酉，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夜夜梦乡里的情景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

“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

吴兆骞获释回来后，辇下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还纷

纷赠以诗文。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两员外郎险遭正法

古　林

康熙晚年，皇子争夺储位，贪官侵吞国帑，吏治日趋衰败，礼仪制度，也逐渐松弛。清世宗继位后，立即着手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清理钱粮亏空，严肃各项规章制度，使清王朝重又出现了一派生机。雍正二年，清世宗严惩在庆典中未曾叩首即先就坐的两名失仪官员的事件，便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雍正二年四月十五日早晨，紫禁城内“以青海平定功成”，举行庆贺之礼。清世宗升中和殿后，内大臣、侍卫及执事等官在此向皇帝行礼。尔后，清世宗再升太和殿，由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上表行礼。清世宗升殿时，发现左翼班末官二员于众官未坐之前，也未行礼即就坐了。由于与大典攸关，当时不便查究。待庆贺礼毕，清世宗随即遣领侍卫内大臣公马尔赛、都统拉锡查问。据监察御史苗寿、高维新奏称：有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

二人不曾叩首，于众官未坐之先就坐，我等正欲纠参，适值皇上遣大臣查问，等等。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历次朝参大仪成了走过场，所谓尊君敬上之礼已有所废弛。圣祖皇帝虽经目睹，却往往予以宽容，视若不见，只当不知。因此，掌管监察之责的大臣官员，看到皇帝如此宽宏大度，遂将此等失仪之处视为常事，并不整肃纠参，以致疏忽不谨者愈来愈多。对此，清世宗早已深知。因此，这次亲眼看到失仪之处，决心加以整顿严禁，认为倘不严禁，流弊势必无所抵止。且居官者尚且不知敬上之礼，更何以告诫属下？对此等失仪之员，“非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于是世宗谕令，将大礼之时未曾叩首即于众人之前就坐的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以大不敬之罪革职，并拿送刑部监候，待秋后正法。

《清史稿·世宗本纪》载：雍正二年八月“壬午，停本年秋决。”李建勋、罗植就此才被赦免一死。

大内更鼓敲错之后

古　林

旧时，把一夜分成五更，每更约两小时，三更为半夜。每到一更，巡夜的人打梆子或敲锣报时，名为打更。在城镇有专为报更而建的更楼，里面设置更鼓，每到一更，报更人即敲鼓报时。紫禁城为封建帝王处理政务和帝后生活之所，同样也设有更鼓报时。

清代紫禁城的更鼓设在神武门城楼上，如今更鼓早已不存在了。据雍正朝《大清会典》记载："凡钟鼓楼，设旗手卫校尉，每夜值更发擂。凡神武门每夜司钟司鼓，向系太监承值。康熙六十一年奉旨：著銮仪卫官校承值。"尽管如此，紫禁城内的更鼓并未能做到夜夜正更报时，不出差错。雍正年间即发生了一次夜间敲错更鼓的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夜深人静，清世宗在灯下批阅奏章。忽然，从高高的神武门城楼传来咚咚的更鼓声。清世宗顿时发觉更鼓点敲错了。次日

一早，清世宗便谕令銮仪卫堂官查问。然而，銮仪卫堂官吴达礼、阿尔逊并不将值更错误之官员察出奏闻，却随便签掣一人迫令认罪，在清世宗面前参奏。然在吴、阿参奏此人之前，清世宗即已闻知此人，非值更错误之官员，因而故意下令将此人加重处罚，革其官职，令当苦差，以试看本人到底陈辩与否。然而，此人非但不申辩，反而甘受重处，不加剖白。清世宗看此人庸懦无能，只得特降谕旨予以宽宥，勿使其承受不白之冤。

为此事清世宗想到，管辖属员之大臣如此奉旨问事，并不究问实情，乃随意签掣一人，以坐其罪，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访察事实真相，从而为之宽释，则天下无知之人将认定皇帝用罚卓率从事，岂不妄生议论？清世宗联想起吴达礼原是隆科多门下之徒，而阿尔逊则在允禵军前效力数年，吴、阿二人见隆科多、允禵及其同党被惩，必然心怀不满，因而有意颠倒是非，欲加雍正以苛刻之名。然而，吴达礼、阿尔逊二人恶名之心乍起，即被雍正帝识破了。

乾隆时《永乐大典》被盗案

吕　坚

《永乐大典》是明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有凡例、目录六十卷，共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余万字。它保存了明代以前我国的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宗教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大典》一书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永乐五年（1407年），由明成祖朱棣正式命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了序文。序文中说道："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集群分，著为奥典。"据统计，前后参与该书编辑的人员多达二、三千人，辑入的书籍多达七、八千种。

因为这部书卷帙过巨，不易刊印，明嘉靖年间曾钞过一个副本，而永乐时代的原本不知在何时被毁失了。这个副本，一直被保存在"皇史宬"，清雍正时，又移存到东

交民巷翰林院典籍库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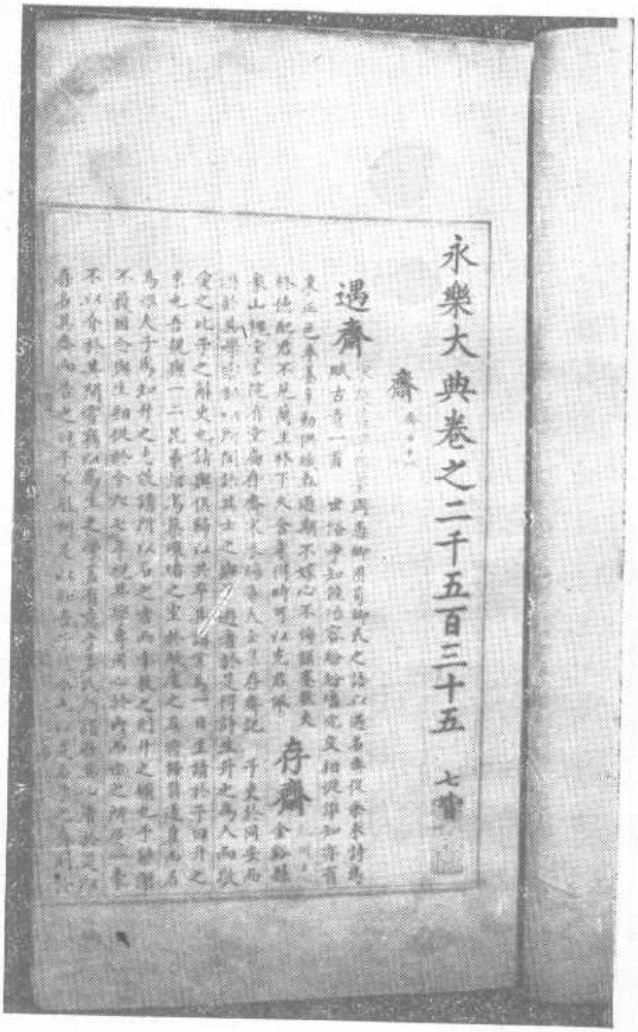
清乾隆年间，发生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大事。那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除从全国各地征集书籍外，乾隆帝还批准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现在流传已少不恒经见之书”，以便编入《四库全书》。从此，《永乐大典》才开始得到利用。但军机大臣们派员往库内检查后才发现，《大典》当时就仅存九千余本了，“约缺一千余本，较原书少什之一，不知何时散佚”。乾隆帝在同年二月二十三日访求《永乐大典》的上谕中说：“闻此书当时在内阁收存时即有遗失，似系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未经缴回。”（陈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同）为此，他特地要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派人前往当年在局人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家查询，并派人向各处购觅《大典》的散佚书籍。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三宝的奏折中曾提到：“……据鄞县贡生卢址呈缴遗书二十余种，并据缴出抄存《永乐大典》内《考工记》一部计六本。据称系祖上遗留，情愿呈缴等语。”

为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军机大臣兼四库全书总裁刘统勋决定在“翰林院衙门内……迤西房屋”作为校核《永乐大典》办事之所。由于《大典》篇幅浩大，头绪纷繁，为了保证排纂剋期，又决定从翰林等官员内挑选三十员担任分校，并派军机司员一、二人作为提调、典簿

厅等官员作为收掌。

但在次年六月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永乐大典》被盗案。案情是这样的：当时纂修官、庶吉士黄寿龄，被派辑《大典》中散篇《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部，白天校阅未毕，于当天（十三日）晚间，“将（大典）原本六册，用袱包裹带回，拟欲乘夜趱办。讵行至米市胡同，偶然腹泻下车，被贼连包窃去，追觅无踪。”（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质郡王永瑢奏折》）为此，庶吉士黄寿龄曾受“经部议以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的处分。乾隆帝在上谕中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不可误课程，原无藉复事焚膏继晷。至馆中设有提调人员稽查，乃其专责。携书外出，若曾经告知提调，即当与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携归，该提调亦难辞失察之咎。著舒赫德查询明确，据实复奏。其所失之书，仍著英廉等上紧严缉，毋致阙少。”

一个月之后，即七月十五日夜，黄寿龄所失《大典》六册在“御河桥河沿被人拾得”。《大典》六册，何以失而复得，由于文献阙如，殆不可考。但从乾隆帝七月十八日的上谕中我们可略知一二：“朕思此书遗失以来，为日已久，必其人偷窃后潜向书肆及收买废纸张等处售卖，书贾等知《永乐大典》系属官物，不敢私行售卖。该犯亦知缉捕严紧，不敢存留。遂于夤夜潜置河畔，以冀免祸。其情形大概如是。”乾隆帝要步军统领英廉“密派妥干番役等于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實
遇齋
存齋

永乐大典

书肆、纸铺、小市、荒摊等处留心体访……跟究贼踪。”

由于《大典》因携出翰林院被盗，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乾隆帝后来下令：“所有翰林院现贮各书，著总裁等交该提调照各省进到书单，造成档册，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四库全书》总裁质郡王永瑢也表示：“所有《永乐大典》现交提调等通行查检，敬谨收贮，嗣后断不致各纂修任意携取外，至各省送到遗书……并饬令各纂修等务须在馆校阅。”应该说，乾隆的这道上谕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永乐大典》的妥善保存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黄寿龄因失书被科罚俸处分之后，经乾隆帝改为从宽处理：“虽然……咎所应得，第念《四库全书》处未定章程以前，纂修等将书携归校办者谅不止一人……其情尚稍可原。”于是，这桩公案总算得以了结。

乾隆丧葬期间的一桩缮写讹错案

冯佐哲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崩逝于紫禁城养心殿。入殓后梓宫一直停放在景山观德殿，并拟于是年九月初二日移往遵化裕陵地宫。为此举朝上下有关人员，忙于准备梓宫发引事宜。不料，就在此间，发生了一桩繙译、誊缮讹错的事件，仅为了一字之差，累及多人受罚，其中竟有二人险些丧命。

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嘉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大臣布彦达赉、阿明阿、缊布等人向嘉庆皇帝呈送了一份奉移梓宫途中所使用的赐奠折片。该折由满文书写，嘉庆皇帝在审阅时发现译文中错把其祖母孝圣宪皇后的“圣”字写成了“贤”字，故非常气愤，认为“其咎甚大，非寻常讹错可比，因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询”（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又见《清仁宗实录》卷49）。下令将“所有承办奏折之主事德

宁、缮写之笔帖式兴保，俱著交刑部治罪”，并决定对主管此事的内务府大臣也进行追纠。

奏

刑部等衙門為 查明成德等請

奏為遵

旨審擬具奏事嘉慶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內務府大臣呈遞清字摺片內於敘吉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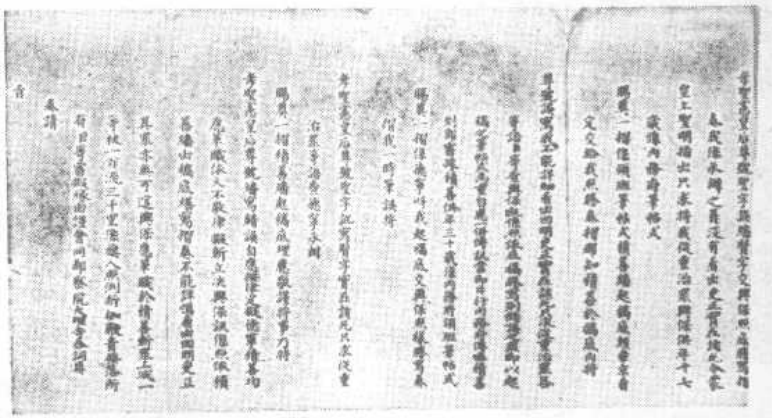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

六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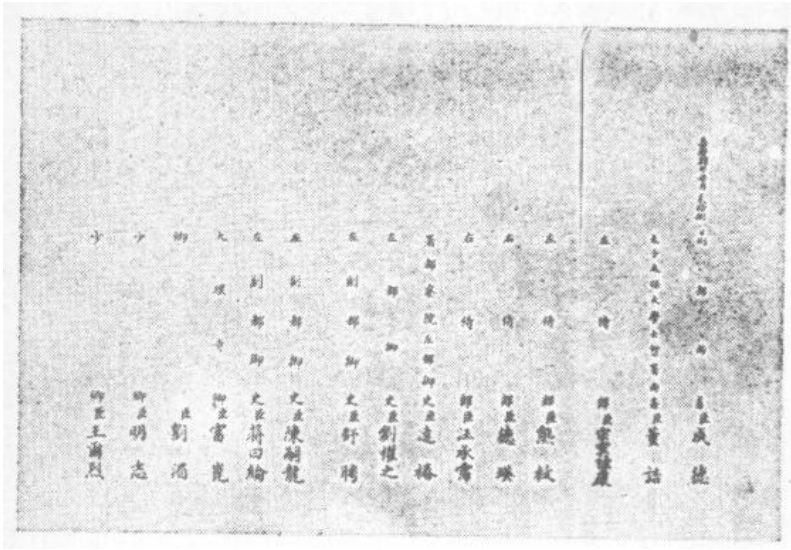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六
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孝淑睿皇后葬禮之事交與內務府大臣辦理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六
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孝淑睿皇后葬禮之事交與內務府大臣辦理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六
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孝淑睿皇后葬禮之事交與內務府大臣辦理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六
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孝淑睿皇后葬禮之事交與內務府大臣辦理
孝淑睿皇后葬禮鐫寫錯誤其咎甚大非尋常挑錯可
比所有承辦葬禮之主事德寧繕寫之筆帖式興
保俱著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當經內務府將德
寧興保咨送到部查等隨審據德寧供年三十六
歲係內務府堂主事九月初二日
高宗純皇帝拜官年移葬請沿途
遣員
賜奠一摺係我公辦理領班筆帖式情事緣起錦庭將



嘉庆四年刑部尚书成德等奏折

为什么嘉庆皇帝如此震怒呢？这是因为“圣”与“贤”虽一字之差，但却差了辈，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是雍正帝的皇后、乾隆帝的生母，而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是乾隆帝的第一个皇后。把祖母写成了母亲，这在皇帝看来乃属对其大不敬，故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并治以重罪。

类似错误早在乾隆十三年时就已经发生过，也是在汉文译成满文时出的差错。那是在孝贤皇后的册文中，把“皇妣”二字，译成了“先太后”。乾隆帝为此曾大发雷霆，在上谕中认为：“从来繙译有是理乎？此非无心之过，文章不通可比。”结果协办大学士阿克敏因此被革职。

刑部接到嘉庆皇帝的谕旨后，马上会同都察院、大理寺等有关部门（即所谓三法司）审理此案。参加的人员有

刑部尚书成德，太子太保大学士、暂署尚书董诰，左侍郎、宗室禄康，左侍郎能枚，右侍郎德英，右侍郎汪承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达椿，左都御史刘权之，左副都御史舒聘，左副都御史陈嗣龙，左副都御史蒋日纶，大理寺卿富昆，卿刘湄，少卿明志，少卿王尔烈等。据当时人内务府堂主事德宁（当年三十六岁）交代："九月初二日，高宗纯皇帝梓宫奉移，奏请沿途遣员赐奠一折，系我承办。经领班笔帖式积善缮起稿底，将孝圣宪皇后尊号'圣'字误缮'贤'字，交兴保照底誊写折奏。我系承办之员，没有看出更正，实在该死，今蒙皇上圣明指出，只求将我从重治罪。"内务府笔帖式兴保（当年十七岁）也交代："赐奠一折系领班笔帖式积善缮起稿底，经章京看定交给我照誊奏折，那知积善于稿底内将尊号误写，我不能详细看出，回明更正，实在该死，只求从重治罪。"办案众人听后觉得，"兴保既系照依稿底誊写，则错误之罪即以起稿之笔帖式为重，自应一并传讯"。于是，马上传讯内务府领班笔帖式积善。据积善交代："赐奠一折，系德宁叫我起稿底，交与兴保照样誊写奏折，一时笔误将孝圣宪皇后尊号'圣'字讹写'贤'字，实在该死，只求从重治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主管此事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布彦达赉、缊布、阿明阿等人也深知事情严重，"自认错误，均请革职交刑部治罪"。

三法司会审后，认为："德宁承办赐奠一折，积善缮起稿底，理应敬谨将事，乃将孝圣宪皇后尊号缮写错误，

自应按律定拟，德宁、积善均应革职，依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兴保讯系照依积善缮出稿底缮写折奏，不能详慎看出，回明更正，其罪亦无可逭，兴保应革职，于积善减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人照例于鞭责发落”（出处同上）。

最后结案由嘉庆皇帝钦定的，他觉得为此一字杀二人，流放一人，委实有点处罚太重，故他最后裁决时，还是解脱了死罪，对其他人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罚。

早在七月二十五日的谕旨中，嘉庆就曾说：“除怡亲王永琅现在患病，永来系在圆明园，所递之折未经阅看外，布彦达赉、缊布、阿明阿三人自认错误，均请革职交刑部治罪，实属罪所应得。惟念布彦达赉管项繁多，一时未能兼顾，阿明阿初管事务，向来不识清文，朕所素知，二人情有可原，著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仍交军机大臣议处具奏。至缊布久管内务府，竟系福薄灾生，有心试朕留心事务否？著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并工部侍郎、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赏给四品顶戴，拔去花翎，仍交军机大臣严加议处具奏。一任缊布市恩邀誉，朕亦不惧。姑念伊于造办处事务尚为熟悉，著加恩留其佐领，在造办处司员上行走，以观后效。其管理造办处，俟朕另行简用。缊布不得以曾任大员自居，亦不得心存推诿，遇事知而不言，致于重戾……。”又说：“阿明阿因内务府奏折错误，已降旨革去内务府大臣，但念伊向来不识清文，管理内务府未久，诸事本未谙练，著加恩赏给头等侍卫，仍戴花翎，随

同永来学习管理圆明园事务，朕非因阿明阿系藩邸随侍之人，同罪异罚也”（《清仁宗实录》卷49）。实际上他通过上谕已把宗室贵族以及他在藩邸时的心腹人员都解脱了，只找了个缮布作替罪羊，科予较重的处罚。对于当事者德宁、积善和兴保三人的处理，他在七月二十八日又发布了一条上谕：“三法司奏，将内务府呈递奏折书写错误之主事德宁……，笔帖式等官，律以大不敬之条，实属罪无可宽，自应依律办理。惟是朕在藩邸时，向知内务府掌仪司承办祭告典礼，于列后尊号中，惟孝贤纯皇后尊号，常时敬谨缮写，此次竟系顺笔致误，且内务府人员，于清文本不熟习，至如缮写清文则多有依样描画，不但不解文义，且并不识字面者有之，即汉人中亦有能写不能识者。况此案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已皆分别从轻示惩，未加深究。则此等微员，于万无可宥之中，亦不得不求其一线生路，量从末减。所有承办之主事德宁、写底之笔帖式积善，均著加恩免死，各枷号一个月，满日鞭责八十发落。笔帖式兴保，年仅十七岁，系照本誊缮，或竟不识清字，业经革职，著从宽鞭责五十，即行发落。”（《清仁宗实录》卷49）

由这一桩案件看来，“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一点不错。为皇帝办事的人，必须时时、处处、事事加以小心。稍不留心，就会遭到横祸。即使一字讹误，就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发生在乾隆帝丧葬期间的这桩缮写讹错案，不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石匠丧事引出的朝廷风波

陈东林

乾隆五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他的丧仪却极为风光，轰动了整个京师。宅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事后据查，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仅有户部尚书陈惠华几人託故未来。一时，九卿会丧被街头巷尾传为笑柄。

本来，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帝后驾崩才得使用。据《大清会典》载，皇帝驾崩，皇子、皇孙、后妃会丧须朝夕哭临三日，各有其位。梓宫停乾清宫时，嗣皇帝立殿檐东，皇子皇孙立丹陛东，皇后立其西，诸王立丹墀下。百官齐集会丧，也各有其位。隆宗门外为三、四品以上命妇

哭位，乾清门外为王以下各爵及二品以上朝官哭位，景运门外为三品以下文武官哭位。外省官员则于公署内会丧，跪接遗诏。

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然而如一个匠户之死，既非王公贵胄，又无特旨，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只为一个“财”字。这匠户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凿石匠。大凡此等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余润。俞君弼家资丰饶。然而偏偏膝下无子，死后撇下数万金，任凭一群“义孙义婿”争夺不休。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託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丑剧。

丑闻上达天听，三十岁的乾隆又气又恼。气的是即位已几年，这群大臣仍未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如此多人违制，又不能尽行开革。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严鞫。谁知早有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并未奏闻请旨，私差人前往俞宅刨掘，得银二万两。参加了会丧的礼部侍郎吴家驹也闻风声不好，又适逢丁忧，便将分给他官的炭金席卷，溜之大

吉，回乡奔丧去了。而其余诸官却也不敢讨银，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廉。

鄂善一一审明，请旨将张鸣钧交部察议，义女婿许秉义论如律，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乾隆又特下谕戒饬九卿："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十二月更重申：京官"除亲友及同朝者仍照常庆吊外，其有交结富室大户，希图肥润等事，照不谨例革职。"承办此案的鄂善，则因"干练、廉洁"，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自以为已是乾隆最宠信的心腹之一了。一场闹剧似乎就这样要收尾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忽上疏奏劾鄂善，称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人与其说合，"送银一万两，嘱其照拂。"乾隆闻奏先不肯信："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为了治仲之罪，特命和亲王等查明所涉人等。谁知一经研讯，鄂善家人及过付人俱各招认。乾隆闻奏，又亲提鄂善面加询问，鄂善却坚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相慰道："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从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却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

不可恕！”原来，先时汉九卿受贿，乾隆已萌杀一儆百之心，此时亲信满臣又受贿，更使其怒不可遏。贪污一千两银事虽小，他怒的是苦心培养的心腹，却对其亦有隐私，“鄂善之重罪在于欺罔大不敬！”见乾隆翻脸，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详讯时，又推翻前供：“我听谕旨云：如果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另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我实无赃私入己。”然为时已晚矣。乾隆又传谕：“彼若恳切哀求，尚欲缓其须臾之死”，今又翻供，“即立时正法亦不为枉”。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带至家中令其自尽。

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凿匠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毕竟不是光彩事，乾隆不得不掩饰道：“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然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却不识相，以为劣迹没被抓住，上疏攻击仲永檀毁谤自己“理学清名”，并以“解退”相要挟；另一给事中卢秉纯见仲永檀一奏升官，也步后尘，劾赵国麟口出怨言……。数日以来，乾隆已被搅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见仍有人啰唣不休，下旨痛责，将赵国麟降二级候补，卢秉纯革职。

至此，九卿吊凿匠引起的风波虽总算平息了，但透过貌似威肃的大清礼法，却掩饰不住达官贵胄身上的铜臭。

乾隆朝筒子河浮尸案

杨乃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初十这一天，驻守在紫禁城西北角（北长街北口一带）一个堆拨（满语，即哨所）里的护军哨兵，沿着筒子河边巡逻。冰封了一冬的筒子河刚刚解冻，早春的水面，平静如镜，因此，漂在河面上的一具浮尸也就格外显眼了。

哨兵发现浮尸以后，立即报告给值班的护军章京，章京又回奏给在景运门当班的护军统领崇信（礼烈亲王代善七世孙），最后又惊动了皇室的大管家——总管内务府大臣们。于是，内务府慎刑司的官员们迅速出动，会同护军人等，七手八脚将浮尸打捞上岸。

死者是一青年男性，从尸身悬挂的腰牌（出入紫禁城的通行证）上得知，此人系造办处的绣匠常德。经刑部传来的仵作（验尸员）检验尸身，从头到脚均未发现伤痕，因而得出了“溺毙属实”的结论。不过他到底是失足落水？

还是被谋杀者推入水中？或是投河自尽？尚不得而知。

现场得到的另一线索，是从尸身上找到一张当票。经派人去当铺核查，所当者系官绒一包（官用刺绣绒线）。

由于死者是造办处的绣匠，又死在紫禁城筒子河中，此案照例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于是慎刑司将死者之父得受，以及造办处绣作头目田保住、催长长住、领催泰山保等人，一一传缉到案，经“逐一严加究讯”后，有关绣匠常德之死的种种内情，遂逐渐了然。

原来，得受、常德父子皆属内务府包衣管领下，分别在绦儿作、绣作充当绣匠。绣作共有绣匠二十四人，承担一应内用绣工活计，由于“活限甚紧”，故一向“分散各匠，按限成做”。至常德其人，原即经常“做工迟误”，本年十一月初七、初八两日，常德所派活计又未如期完成，至九日晨，常德即“乘间外出，至晚尚未进作”。催长长住曾派绣匠头目田保住至其家查问，其父未见常德返家，无以答对，遂“诡称患病在家”，愈后即归。后又屡次传唤，得受皆称尚未痊癒。虽有人疑心常德外逃，但未想到他会投河自尽。那知失踪三月，竟一直在冰水中浸埋。为此，主审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常德素日猾懒，兼之所领官物私行当用，该作催迫甚紧，常德一时情急轻生，似无疑窦。”

常德被迫投河自尽一案，本算不得甚么稀奇事件。处于最底层的宫中奴仆——宫女、太监、苏拉、匠役们，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胆子大的外逃了，胆子小的总不

外是投河、跳井、悬梁自尽。再者，造办处的匠人本来就是皇上家的包衣世仆，远比不上那些大人们豢养的猫儿狗儿，一旦轻生自尽，也不过如碾死个臭虫一般而已。但此等人竟敢遗尸于禁城重地，既脏了皇上家的御河水，又为大内添了几分晦气，更属可恶之极。然而死者既已咽气，就只有就死者的亲属和该管官员们从重责罚，以示警告了。

如此这般，内务府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就把一大批有关人员都牵连了进去。首先是常德之父得受与绣匠头目田保住，分别以“明知其子当差猾懒，不行管教”及“既知常德素日猾懒……乃敢于徇隐，至活计迟误始行连次催逼，以致常德在紫禁城内投河自毙”，应将二人“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而主管绣作的催长长住与兼管绣作的库掌舒明阿，皆分别处以“革职留任”及“从重降一级留任”。主管造办处的郎中永德、佛宁、福克精额“均照失察律罚俸一年”。至于以质郡王永瑢为首的，包括福隆安、英廉、德保、和珅、金简等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及常德所属之旗管领等人，均被处罚俸三个月至一年不等。而紫禁城的护军统领、章京人等，也以“管束未周”交发兵部“分别议处”。

内务府的奏折上报以后，乾隆皇帝批以“依议”二字，遂将此一公案了结。

一身貂褂罚俸半年

杨乃济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紫禁城内妆扮得光彩夺目，重重宫阙悬灯结彩，慈宁宫内外，更是热闹非凡，从那里散发出缕缕香烟、声声鼓乐，悠悠然飘越宫墙，一直传到隆宗门以至前三殿一带。

原来，这一天是乾隆帝的生母孝圣皇太后的八十三岁寿辰，乾隆帝在慈宁宫中为母后行祝寿礼。在中和韶乐的演奏声中，皇太后陛座了。皇帝、皇后、妃、嫔、王子、公主、王公、福晋、命妇们依次向皇太后行大礼，最后轮到文武百官按班行礼祝寿。

就在这时，一员任职副都统的当今贵戚，乾隆皇帝的嘉淑皇贵妃金佳氏（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生母）的长兄金辉，刚刚礼毕，转身退出慈宁门，步出永康左门，一眼看到一位似曾相识之人。这人身穿貂皮朝衣，五品水晶顶戴，正踟立于隆宗门外。再一瞩目，则辨出此人原是有

名的长芦盐商范清济。

这个范清济，于乾隆二十九年起接办其叔范毓馥、堂兄范清注、范清洪遗下的长芦引监及办买倭铜的皇商事务。久在内务府任职的金辉，对这名世代皇商早就认识。不过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又不能不使金辉感到十分惊愕。原来范清济不过捐了个五品虚衔，以前在保案上也只得过一个候选员外郎，从未放得实缺。当此皇太后万寿庆典之际，他竟斗胆混入大内，擅穿貂褂，这正是僭越违制之举。据清代舆服规制，一二品大员方可穿貂褂，三品则以猞猁皮与貂皮间做，至四品、五品，就只能穿红豹皮、黄狐皮了。范清济以捐班五品虚衔竟如此斗胆僭越，固然是庸人自扰，自取其祸，然而金辉当此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装做视而不见，已不可能，如果落下个知情不举，更难免招祸于未来，因此，金辉打道回府后，立即缮折参奏。

十一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金辉递的折子，不免龙颜大怒，立即将此案批交内务府大臣查办，内务府遂即将范清济缉传到案。

这个一心想乘皇太后万寿之机，在紫禁城内抛头露面、花钱买脸的盐商，不免慌了手脚。他诚惶诚恐地招认了自己惹下的这场荒唐罪过：

“因世代蒙受圣恩，毫无效犬马之劳，本月二十五日恭逢皇太后万寿朝贺之期，愚昏起见，意欲随从行礼。即于是日将我叔父范毓馥在日遗下的朝衣一件穿了进内去行

礼。我因没做过官，实在不知貂皮朝衣是三品以上京堂才穿用的，现任职官才行得礼。我违例错穿朝衣，僭越进内行礼，这就是我的不是，实在并无别情，只求治我的罪就是恩典了。”

经内务府官员反复究讯之后，于十二月二日以总管内务府的名义缮折上奏乾隆皇帝。折中首先援引了“官员朝贺或应穿朝服之日不穿朝服，或违例错穿者，俱罚俸一个月”的律例，但又说“范清济系议叙候选员外郎，亦应恪知礼制”，故“仅照违例错穿朝服例罚俸一个月，未足示儆，应加重，照不应为律笞四十。系官，罚俸六个月”。但范清济并非现任职官，原本无俸可罚，故又定其“照依现在品级俸银，交纳广储司银库”。此外还将范清济“饬交长芦盐政，严加管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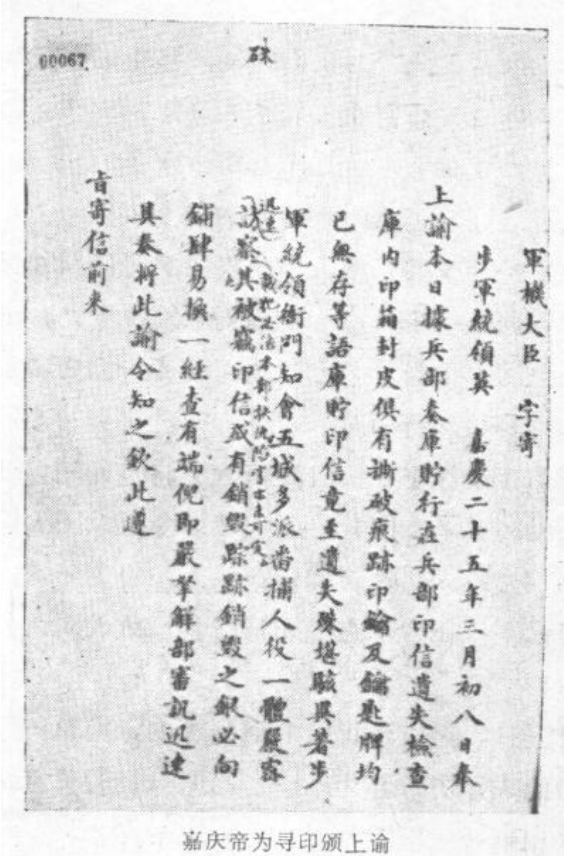
此折一上，乾隆皇帝立即批以“知道了”三字。范清济自去称足银两前往广储司交纳，这一桩庸人自扰的荒唐案子就此了结。至于长芦盐政又如何对其严加管教，就不得而知了。

嘉庆庚辰兵部失印案

古　林

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跟随嘉庆帝，由汤山取道昌平一路祇谒东陵。銮舆刚抵汤山行宫，兵部忽然奏报：库贮行在印信遗失，印钥及钥匙牌也一并无存。嘉庆帝闻知，不禁大为惊愕。以前各朝尚未发生过丢失部堂大印之事，而今此件大案怎不令嘉庆帝恼火？于是当即命行在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令其知会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同时，谕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立即锁拿兵部看库人员，严行审讯。一经查有端倪，迅速具奏。

嘉庆帝认为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预防，应首先给予惩处。管理部旗事务的大学士明亮，年已八十六岁，不能经常到署，虽旧日有勋绩，仍被撤职并降了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均被摘去顶戴，分别受到降调处分。只有汉右侍郎吴其彦，因赴任不


嘉庆帝为寻印颁上谕

久，且又出差在外，才幸免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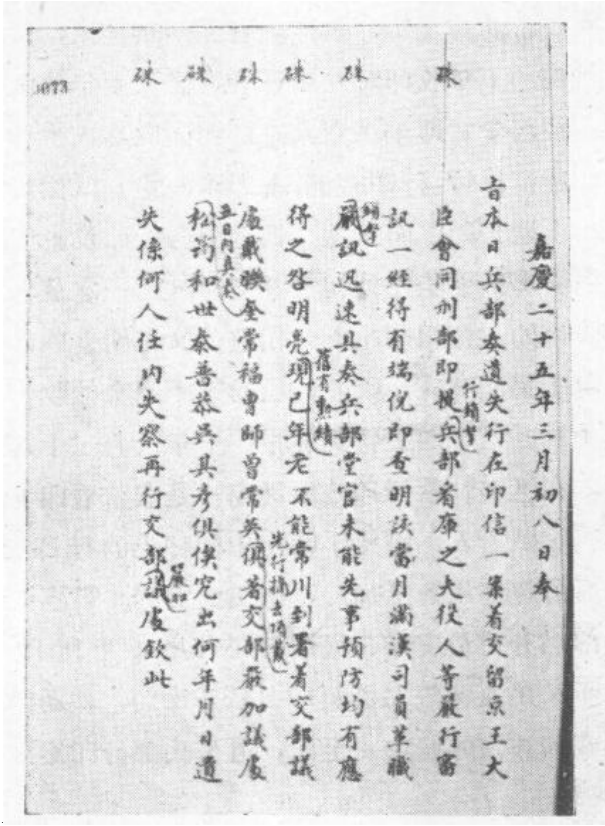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方及知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独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七日提取行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对此，嘉庆帝满腹狐疑：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猝之间

哪有余暇将印箱移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因此，嘉庆帝在谒陵路上的三家店、大新庄等行宫，连日寄谕留京王大臣和刑部堂官，将拿解到案之胥役人等严切根究，务令早日审个水落石出。

刑部经过连日审讯，兵部堂书鲍千谎供：上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思绶曾于九月十三日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丁康泳宁在旧日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由于这个供词纰缪甚多，因此，嘉庆帝谕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思绶，同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三日，嘉庆帝谒陵后回到大内，审讯情形仍未见奏报。对此，嘉庆帝甚为不满，当即斥责有关官员“疲玩性成，互相推诿。”四月九日，嘉庆帝谕令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之司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谕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自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须赴部，“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迟延，严谴立降！”

四月十六日，兵部遗失行印案仍未审出实据，次日庄亲王绵课等只得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是想脱身，希图另派他人了结此案。但嘉庆帝认为，此案业经绵课等审



嘉庆帝为失印议处官员的上谕

讯多日，口供屡次更改游移，断不能另委他人审理。即使以后要将绵课等全行斥革，也要令其审出实情。于是谕令将绵课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等降为二品顶戴，仍令其加紧研鞫，并限定于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倘能如此，当立即予以开复。否则，将于初六日降旨治罪。

在嘉庆帝的督催下，刑部堂官等严刑诘讯，兵部堂书鲍干始供出：上年收印时并未开看，恐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刑部堂官即刻派章京赴圆明园向嘉庆帝奏报这一消息。嘉庆帝思忖：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既然行印系上年秋围路上遗失的，而钥匙、钥匙牌与行印及正印匣必然一并失去。那么上年九月初三日交印时，一定是将备用印匣充抵入库的。备用印匣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如果事先不向鲍干嘱託照应，收贮印信的鲍干岂会接收？果然，嘉庆帝于四月二十四日得到奏报：上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回銮时，在巴克什营行印连匣被窃。是夜，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入，将缚于帐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尔后俞辉庭用备匣加封，贿嘱堂书鲍干冒混入库。当时，兵部当月司员庆禄、何炳彝二人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干又贿通该班书役莫即戈私开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至此，遗失兵部行印案终于真相大白。

为寻找行印、捕获窃贼，嘉庆帝先后数次命军机处寄谕直隶总督方受畴和直隶提督徐锟，令其遴派能干员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百里内外，梭织往来，明查暗访，结果毫无所获。嘉庆帝在徐锟的奏折上无可奈何地批道："此印大约难得！"最后，只得谕令礼部重新补铸了新的兵部行在印信。新印的印文和印式有所改易，所用银两及铸造工费，则由兵部尚书松筠和上年秋围时署理行在兵部侍郎裕恩赔缴。

奏

直隸提督臣徐錕跪

奏爲遵

旨嚴密訪查偽印正犯連日尚無端倪現在添派員

弁四處查拏謹先恭摺覆

奏事竊臣昨因檢出各臺站遞送公文底冊內有

兵部遺失行印以後大案未知尚係預印之件

冒昧繕摺具

奏本月初三日接到

廷寄欽奉

上諭據徐錕奏檢查上年各臺站遞送文票印冊內

有八月二十九至九月初一等日送遞行在兵部

印票是失印之後遞日復有行在兵部印票等語

恐行印外有未廢且有偽造之印審出有偽

等情俾以滿局上前通其欵式情樣內中竟有

印信混而為如調撥數取機密消息甚屬紊亂

已極臣惟有悉心籌辦總期得有應得之犯即據

究實據由驛奏

聞以冀仰副

皇上綢繆隱忖之至意所有臣現在添派查拏緣由

理合恭摺先行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此印大約難得此賊必須嚴緝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　初　日

徐錕奏折

銮驾内库失金案

朱先华

紫禁城东华门内的銮仪卫内驾库（又称銮驾内库），“内贮全分新大驾卤簿，大礼轿一，法驾步舆一，十六人亮轿一，各样轿十四，法驾、骑驾、銮驾共三百七十余件。”（《日下旧闻考》）

卤簿就是帝王的仪仗队。所用的器具，多为金、银、珍宝或丝织品等特制而成。内驾库日夜都有人守卫值班，开库要登记，锁后贴封条，还有銮仪卫署官员监视，制度非常严密，加上紫禁城警卫森严，可说是慎之又慎、严之又严，万无一失了！可是，就是在这块禁地之中，还是经常发生失金、被盗等案件，不能不称之为奇案丑闻。据清代档案记载，嘉庆、道光年间，銮仪卫金器被盗、遗失就有数起，尽管皇帝发谕旨，刑部动酷刑，均无济于事，往往查无结果，不了了之。道光二十二年二月间銮驾内库皇太后仪驾金器八件被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据銮驾内库值班官、云麾使文伦报称："贮皇太后仪驾金库，库门微开，当即会同查看库门，封皮擦损，锁头脱落，进库内查点，失去金器八件，内金提炉一件、金香盒一件、金瓶盖一件。随派总理堂务冠军使等查验，禀复相同。"十三日，管銮仪卫事大臣载垣等将案情奏报皇帝，称："将经管头尉长虎、文得，该班马甲十名一并交刑部严行审讯，务期水落石出，俟定案时，再将管库及值班官员一并交部议处。"十四日奉上谕："内驾库经管头尉长虎、文得及该班马甲十名均著交刑部严行审讯；管库官员、带甲该班官员著先行摘去顶戴，听候传讯；载垣、端华、玉明、满承绪著交该衙门先行议处。钦此。"接着，刑部传讯和严审銮仪卫的总头尉、头尉、民尉、旗尉、厨役、苏拉（杂役）等约二百余人。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奏称："经臣部叠次添派司员昼夜严行熬讯，案内人犯无行窃情事，自应先行拟结，将案内轻罪人犯暂行发落。"同日奉上谕："刑部堂、司各官审办此案两月有余，未能究出正贼，著交部分别议处。余依议。钦此。"尔后，刑部将有关人犯发落。兵部将是日在库值班官、云麾使文伦，治仪正善嵘，带该班官、骑都尉德凌阿均降二级调用，罚俸二年；管库官、冠军使松安，云麾使奇车布降一级调用，罚俸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载垣等奏请如式补造金器，以备皇太后陈设之需。其中仅补造金提炉、金香盒、金瓶盖三件约计八成金一百三十两。其余五件，因库中尚有存储，只是成色未能一律，

先请交工部擦洗，一律见新，以重典仪，而昭体制。同日奉上谕："载垣等奏请补造遗失金器一折。此项金器自应先行补造，……所需八成金一百三十两，即著载垣等赔缴，不准开销。该部知道。钦此。"（以上均见《銮仪卫》档案）

此案历经数月，既未破案，又未追获赃物，只是乱处分一通，就草草收场了。从此案的查处说明了清政府的腐败，清官吏的无能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蔡寿祺疏劾恭亲王

杨乃济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政变后慈禧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奕䜣获封议政王，出任军机揆首，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等要职，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

盖慈禧与奕䜣之联合，基于权力斗争之共同利害。二人皆有极强烈之权力欲，慈禧意在独揽大权，奕䜣则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政变成功，即呈两雄并立之势。

然而，历史往往是反复迂回的，辛酉政变时的慈禧与奕䜣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取胜，肃顺犹如被一个晴天霹雳打翻在地；曾几何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却在奕䜣的头上炸响了。这便是本文要介绍的同治四年蔡寿祺疏劾恭亲王一案。不过奕䜣毕竟不同于肃顺，一者他于朝野树老根深，羽翼遍布，旦夕间未可动摇；二则由缔结和约之

机缘，深得洋人为后盾，自然是乌纱帽上安装了避雷针。所以这一场权力斗争虽自突然袭击而始，却不得一发以定局，反呈波澜起伏之状，几起几落，持续近二十年之久。同治四年的第一回合，仅仅是一出连台大戏的开场而已。

蔡寿祺，原名蔡殿齐，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二甲进士，入值翰林院任编修，并曾于胜保营中稽核军务。咸丰七年丁父忧，时太平军驻九江，未能返里，遂于次年取道秦晋入川，以求辗转归乡。同治元年自故里还京，复翰林院编修职。四年二月初七署日讲官，二月十四日即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折留中未发；遂又于三月四日再次上疏，直指当朝第一号权贵恭亲王奕䜣，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疏中言：

“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

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议政王之骄盈。

……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以杜塞言路……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份，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

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

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

陈述过四大罪状之后，蔡寿祺干脆要奕䜣罢官引退，他说：

“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个胆大包天的蔡寿祺，颇有几分割下头颅为赌注的政治流氓气味，这四大罪状竟全由“疑虑”、“猜疑”、“疑惧”、“疑惑”而定。原来他看准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切中慈禧之心思。故奏折一上，两宫震怒，诸臣惶恐，奕䜣愤而不知所措。紫禁城内的一场好戏就此开锣。

此案一开始即极富戏剧性。惟《实录》、《起居注》等官方记载皆讳而不志，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祺祥故事》皆有极生动之描述。盖李、王皆当时权贵之座上客，消息大有来路，非一般野史之捕风捉影也！

《越缦堂日记》极其绘声绘色地记述道：

“传是日王进见，太后谓王曰：‘有人劾汝！’示以折，王不谢，固问何人？慈禧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欲逮问之。两宫怒甚，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垂泪谕诸臣曰：‘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太后复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周祖培顿首曰：‘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

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祖培因又曰：‘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大学士倭仁共治之！’太后始命退，诸臣均流汗沾衣；而外间亦藉藉，皆言有异常处分矣。”

以上系三月初五日事。初六日，倭仁、周祖培等于内阁召讯蔡寿祺，蔡供四大罪状率皆风闻，惟所言“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系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二人。故倭仁等于初七日缮折复奏，首言蔡折之无实据，继又言及恭王：“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招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最后又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慈禧遂将已草成之硃谕一纸交下，谕为慈禧亲笔，假幼帝名义罢黜奕䜣，命润色后“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如此违制而行，乃因军机皆奕䜣党羽，绕道而发以求其神速，免生不测。

此一硃谕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件错别字连篇（见照片），现一一订正抄录原文如下：

“谕在廷王大臣同看：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之事，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

罢免恭亲王的慈禧硃谕

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言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此谕经润饰后，又增如下语句：“至军机处政务殷繁，着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

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等四人轮流带领。”是已为革去奕䜣一切差使预做善后安排，两宫之意绝矣!

谕旨颁发后，不仅未致事件之终结，反而一波三折越发不止。初八日惇亲王奕誴进折为恭王申辩，折中言：

“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王为宣宗系近枝亲王中最年长者，所言又直指谕旨而抒。故两宫遂即召见孚郡王并军机大臣文祥等三人，令传谕诸王公大臣并内阁詹翰等，以惇王折、蔡寿祺折一并交发会议，并令文祥传所述旨。

初九日，诸王及近臣群集内阁会议，先是大学士倭仁传所受旨云：“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文祥亦传旨云：“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我听许焉可也。”二人述旨大相径庭，众论纷纭，哗然不能成议，因定十四日再议。

十四日，诸王大臣再次会议，适十三日又有醇郡王奕譞上折为恭王请命，折中有言：“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而通政使王拯、御史孙

翼谋亦各具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如此三折亦一发交议，遂又有肃亲王华丰、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藩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纷纷上疏，众论皆倾向恭王。因之事态急转直下，两宫不得不偃旗收兵矣。

十六日颁明发上谕，谕中言：“日前将恭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耶？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

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之至意。至在廷臣工，均为国家倚任，惟当同矢忠赤，共济时艰，毋得因此稍存疑虑，畏难苟安，致蹈因循积习。”

于是恭王复被录用，然撤去议政王衔，又开出军机，但事态并未就此了结。十八日醇王又上疏，明刺倭仁扣发谕旨，未将七日之硃谕当众宣示，实则指慈禧将谕旨直下内阁绕过军机有违祖制。而自奕䜣开除军机，一应政务均呈脱节。原来军机处全属奕䜣之亲信班底，文祥、宝鋆更属奕䜣死党，他们有意重演肃顺等人辛酉年八月之搁车故伎。奕䜣于两宫召见时又假惺惺地洒下了一把辛酸泪。如此软硬兼施，两宫遂于四月十四日懿旨复奕䜣军机揆首之

职，谕中言：

“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

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该旨下达后，紫禁城内持续了三十九天的一场政治波澜，始告平息。十分有趣的是，这一场戏以慈禧“垂泪”而始，奕䜣“伏地痛哭”而告终。

就奕䜣而言，是极尽全力应付了一场突然袭击，而慈禧之行事亦现草率荒唐。她低估了奕䜣的实力及其影响，惇王、醇王、肃王等诸亲藩皆以恭王有匡服务社稷之功，怕兔死狗烹，遂全力为之请命。诸臣中各抒所见，实则意见两途，一以倭仁为代表，虽一味迎合两宫之初意，但倭仁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目奕䜣重用汉官、交通外夷，视为不端久矣，此番正欲藉两宫以抑奕䜣之势，惟和者寥寥，不能成事。至于其他诸臣，多为奕䜣羽翼，此时惟拥诸王以唱和。如此，两宫之初意未能如愿，终不得不圆转退让而收场。

究其实，两宫于八日召见文祥时，初意已有动摇。惜诸史籍皆未志召对之详情，无从确言个中之奥妙。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做了一番揣测，他说：“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

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劫，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此说不无几分道理，再对照王闿运《祺祥故事》中所说的：“朝论大惊疑，而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用是得解。”可知文祥于面见慈禧时得以扭转事态者，即在于他打出了一张极有力的外国牌——假列强之淫威，胁迫两宫退让。

恭王之所以于此一突然袭击中未致一败涂地，其原因之一亦在得列强之后盾，诸王大臣上疏为恭王请命者固多，然最有力之二折，当推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围绕夷务而言者，折中云：

“十年秋间夷务不靖，人情洶洶，官民惊徙，凡平日奔竞专擅及优游养望之人，尽皆束手无策，而恭亲王维持大局，独能竭尽心力，不避难险，日与文祥等委婉筹划，刻无停晷，卒使夷情帖服，渐次就抚，大局易危为安，至今赖之。”

“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钜，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不在圣明洞鉴之中。”

总而言之，庚申以后的清政府，惟知一味屈服迁就列强，当慈禧头脑稍事清醒，她便懂得了，如果还未找到一个在办理夷务上更遂洋大人心意的人，而又贸然要奕䜣下台，那是不可能的。

经过这第一回合的较量，慈禧以小胜而收兵，奕䜣虽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然军机、夷务等实权仍然在握。不过经历了此番交手，奕䜣于言行着实有所收敛，他谨慎地维持力量平衡，以保全自我。就慈禧而言，虽未尽符初衷，然已为树立其寡头尊荣的专权地位显示了力量，奠定了基础。至以后尚有波澜起伏的第二回合、第三回合的斗争，以至十余年后终将奕䜣打翻在地，那都是后话了。

回过头来再说挑起这场斗争的那个跳梁小丑蔡寿祺，由于慈禧与奕䜣达成了休战协议，他便被视为一根不能兑现的无用筹码抛出了赌场，由于疏劾奕䜣，及疏中言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行贿之无实据，经吏部议处，予以降二级调用，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如此下场，亦一般政治玩火者通常之结局也。

清代最大的戊午科场案

唐国耀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顺天府乡试，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科场案。这件科场案是由顺天府监考官员内讧引起的。谣言说贡院中出现了不祥的大头鬼，闹得人心惶惶。发榜以后，有人告发，在中式前十名中，有位旗下大爷平龄，因为喜好唱戏，曾经登台演出，所以“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因而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这样，事情就愈闹愈大了。

顺天府乡试的考场设在京师的贡院。主考官是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葰，副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

咸丰皇帝于是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吏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这件案子。凡有牵连的考官先都解职听候查办。

这些查办大员们“与柏葰不相能，欲藉此事兴大狱以

树威”。陈孚恩先找到监考的副都御史程庭桂，拐弯抹角地提到科场的情况。程庭桂是个老实人，以为陈孚恩是无意中提到开后门递条子的事，就老实说，这也不足为怪，光我收到的条子就不下一百条。于是陈孚恩借去查看，将条子全都拿走。陈孚恩查的结果，发现程庭桂的次子程秀，陈孚恩自己的儿子陈景彦也都牵连在内。陈孚恩有后台，掩饰过去，而其他人等“因此案情节甚多，非革职逮问，不能彻究。”于是，柏葰和朱凤标、程庭桂都被革职下狱。柏葰的门丁靳祥也被追捕归案，死在狱中。

其实这件事柏葰本人并不大知情，也没有纳贿的实迹，“若仅失察之罪，不过褫职而止。”问题在于柏葰自登枢府，就与肃顺一党不和，因而此案中夹有私仇。虽然咸丰皇帝也觉得柏葰老成宿望，有矜全之意。但肃顺等力言“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这样一来，咸丰皇帝虽然心犹不忍，也没有办法。咸丰九年二月下谕：“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于是，柏葰和同考官浦安，中式举人平龄、罗鸿译，主事李鹤龄，程庭桂的长子程炳采等共七人，被绑到菜市口，准备开刀问斩。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朱凤标革职，其余受株连而褫、革、降、调的有数十人。

清代凡是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加赦免，改斩为戍，这也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习下来的惯例。因而柏葰也自以为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死罪的，他打点行装，准备圣谕一到，就起解登程。忽然看到刑部尚书赵光

捧谕哭至，方知不免一死，叹息说："是必肃顺弄权，吾其休乎！"程炳采也大哭说："我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

清代因科举案杀军机大臣兼大学士，这还是开国以来第一次。所以当市人看到年逾花甲的柏中堂，望阙谢恩，引颈就戮的神情，也不禁为之挥泪。

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敏给者常致胜，朴纳者常失利。更有无耻之徒，在条子上还加上三圈、五圈，如果获中，三圈就赠三百金，五圈就赠五百金。由此可见科举之腐败，官场之污浊。

清末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谈到此案时说："肃顺等人之意，在快私憾而张权势，不过假科场为名，故议者不以整科场之功归之也。"

《清史纂要》也说："实由端华、肃顺方用事，忌柏葰为先进，而性颇憨直，资望声誉均出己上，故藉端锄去之。"

因此，过了两年，即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以后，肃顺在菜市口明正典刑，也就成了大快人心之事了。

几遭杀身之祸的太医李德立

郑逸梅

记得幼年在国文教科书上，读到薛福成的一篇《观巴黎油画记》，描写生动，兀是令人神往。按薛福成（1838—1894年），江苏无锡人，字叔耘，一字庸盦，讲求经世之学。清光绪年间参李鸿章幕府，为洋务运动人物之一，出使英、法、意、比诸国，著有《庸盦笔记》。他昆仲甚多，如薛福辰、薛福祁、薛福庚都是。福辰字抚屏，工岐黄术，声闻远布，达于宫闱。慈禧太后病，召之入京，进剂奏效，赏赉有加，成为一代名御医。

我的世姪辈彭长卿，藏有薛福成及福辰、福祁、福庚致沈子梅等亲笔书札，凡四十余通。沈名能虎，浙江海盐人，官直隶道及上海招商局总办，喜谈洋务。这许多书札从未发表过，长卿给我阅览，希望我为作跋语。我一经翻检，发现书札中颇多谈及为慈禧太后治病事，是难得之医林珍宝。如薛福辰致沈子梅云："马文植（字培之，孟河

人，寓苏州，设诊之处，至今仍称马医科巷）、赵天向，均经随同请脉数次。目下奉旨无庸再诊，但须于方剂头上备列衔名。浙省所荐之薛宝田、仲学辂，今日始到，而圣躬（指慈禧太后）已九分之九大安，想亦方剂头上列衔之局。惟沅公（曾沅甫，曾国藩之弟）所荐汪令（守正，字子常，浙江钱塘人，官山西阳曲县。精医理），颇为小兄得力之帮手耳。其他如湖南所荐连士华，岘帅（刘坤一）所荐程春藻，计日内先后可到。总之，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侥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又云：“西圣（慈禧为西太后，故云）自廿四日泻止熟眠，日有起色，至七月廿六日，眠食居然复原。太医李德立，以为到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鄙人万不得已，乃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圣上经此比较，便知高下判然。立将李德立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俞允。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将九日，圣上居然食量增加，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大约从此竟无阻碍，则早在中秋，晚在寒露节令，当可告成矣。”又云：“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指李鸿章）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

又如，薛福祁致子梅函云：“抚兄（指福辰）在都，

接得其九月廿三日所发信，得悉西圣新恙悉愈，须旧恙一一就痊，方许报安，云云。圣意所用诊事，尚无了期，翻不如仲、薛、连、张诸君（仲学辂、薛宝田、连士华、赵天向），转得翛然事外。昨接叔兄十五日来书，得悉抚兄近状，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引退，业已两次谕吉报安，既而中止，盖圣躬虽臻大愈，然元气过亏，终未能拔去病根。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又云：“天气枯旱，吾邑疾疫流行。前月中，抚兄处眷口大小俱病，日来甫陆续就痊，然次姪女竟以慢惊殆殁。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而不能自理者非耶！”

又，薛福祁致沈旭初云：“禧圣现报大安，薄海臣民，同深庆幸，躬与医事者，以抚兄为到京最早，奏效最著。懿旨谕令枢臣破格拟奖，而钧轴胸有成见，故示裁抑，仅以原阶奖叙记名题奏字样，较诸候选，自胜一筹。现已奉谕留京，调理数月，异日喜占勿药，至准其销差时，当另有一番恩遇也。”

又薛福庚致沈旭初云：“西佛（慈禧有老佛爷之称）以六月廿五日报安，抚哥所赏匾额为‘职业修明’四字，系禧圣自撰。汪子常匾额，为徐阁学（徐郙状元）颂阁所撰‘效奏雷桐’（雷公、桐君，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四字，而禧圣取以赏子常者也。抚哥亦不能即时出京，盖报安后仍须请太平脉，非耽搁数月不可也。”

观以上数札，当时为慈禧治病情况，得见一斑。并知

所谓御医，除薛福辰外，尚有马培之、仲学辂、薛宝田、连士华、赵天向、汪子常、程春藻诸人。而李德立为庸碌无能的太医，献媚求宠，不料适得其反，自取其祸，交刑部治罪，几至杀身。前人谓“伺君如伺虎”，况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势位更胜于君王，爵禄斧钺，随其喜怒，毋怪薛福辰战战兢兢，亟想脱身，大有临渊履冰之惧。一方面又复患得患失，其矛盾心理，在行间字里，昭然若揭。又书札中所谓：“从此竟无阻碍”，“医事中之千回百折”，“便少掣肘”，“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引退”，“钧轴胸有成见，故示裁抑”，“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以上云云，可见当时植党营私，上下其手，及嫉妒倾轧，无所不为。此中黑暗，可抵一部《官场现形记》，不过具体而微罢了。且福辰为了给慈禧诊病，羁身宫禁，致自己女儿失于治疗而死，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在专制淫威之下，哪敢申诉呢？

太监苏德掘银案

赵蕙蓉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六日，主管京城的步军统领荣禄和顺天府尹彭祖贤，接到从军机处转来的一道谕旨：立即查看沙河镇告退太监苏德掘得藏银一案。

老太监苏德系直隶景州人，曾充乾清门总管太监，同治十年一月因病乞退。同年，他在京郊沙河镇西上地村置买已关闭当铺空院一块及临街瓦房六间。光绪四年春，苏德因盖房需用砖块，在挖拆旧当铺地基时，刨出小坛一个，发现坛内装满银两。几天之内，陆续刨出坛五个，小缸一口，内共有藏银约万余两。苏德和家人将掘得之银悄悄用轿车四辆，分三次运回家中。

苏德自以为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谁知在装车运载时已被人发觉。不久，此事就传遍北京九城，直达内廷。

有关官员在向朝廷禀告此事的奏折中说："苏姓又挖出银七缸，金一铜箱。金系条，银系宝，每宝百两，系前

明成化字样，均在十数万两。续又挖出银一窖，长九尺，深五尺，宽二尺，每日夜间装车载运，尚在刨挖。询问工人，据云苏姓已奏明皇太后赏给。”消息传出，这笔飞来之财，首先引起地方官员觊觎，而兵丁的勒索讹诈，更无日不至。最后，众口纷纭，人情汹汹，竟无宁日。

苏德知道此事无法再隐瞒，只得亲自进宫禀告：自己“世受国恩，得此异财，未敢丝毫挪动，情愿报效。”并表白外间传说的藏银数目是以讹传讹。要求派人查看，如有以多报少，情愿服罪。

慈禧亲信荣禄奉命赴沙河上地村查点窖银后，向清廷递交窖藏银两清单为：

第一袋碎银，95斤；第二袋小元宝，127斤；第三袋小元宝，147斤；第四袋方锭，89斤；第五袋小圆锭，77斤；第六袋小圆锭，92斤；第七袋小圆锭，75斤；第八袋小圆锭，100斤；第九袋大元宝，74锭，重242斤，有乾隆年号。外有呈祥大元宝一锭，方圆小锭五个，不在前数之内。共1,037斤，计16,592两。

呈报中还专门说明：“仅止一万余两，并无十数万两之多。大元宝七十五个，每个重五十两，并非百两。宝上有乾隆年号，亦无前明成化年号。”至此，哄传一时的藏银案才真相大白。

当时，京城久旱，灾民麕集，顺天府正在五城办理赈务。慈禧为了显示体贴民情之意，下令将此项银两中的一万四千两交顺天府，以为资遣灾民之需，余银二千余两，

赏给苏德，另赐给老太监金花红绸，以资奖励。就在这道上谕下达后的第五天，这一万四千两白银即已“归库存储”，至于其中有多少真正用在灾民身上，就无帐可查了。

乾隆朝左副都御史窦光鼐

唐国耀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乾隆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窦光鼐一生，宦途多事，官运一直不大好。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以“光鼐迂鄙纰缪，下部议，夺职。”后又念其虽“拘钝无能”但“无过”，所以“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

时浙江各州县的仓库多亏损，窦光鼐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揭发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亶望、总督富勒浑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损都超过十万。乾隆帝震怒之余，派窦光鼐会同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巡抚伊龄阿调查这件事。

窦光鼐到了浙江，就向乾隆帝上疏，弹劾永嘉知县席世维、平阳知县黄梅、仙居知县徐延翰及布政使盛住。看到窦光鼐的奏折，乾隆帝即谕令大学士阿桂，到浙江去处理这个案子。谁知阿桂的奏折中却说窦光鼐的疏文是无中

生有、捕风捉影之谈。巡抚伊龄阿也和阿桂沆瀣一气，造谣说窦光鼐在平阳查访时，私设刑具。这样一来，乾隆帝又谕“责光鼐乖张瞀乱，命夺职，逮下刑部。”

虽然圣旨还没有到浙江，但大家都已经知道窦光鼐被褫职了。巡抚怕他逃跑，派人把公馆悄悄监视起来。忽然有归安的王以衔、王以铻递门生帖子求见窦光鼐。叙谈之后，临走时二人把一件棉袄留下来，说是谢老师识拔之恩。他们走后，窦光鼐检索棉袄，发现里面藏有平阳知县黄梅敲诈勒索的田单、印票、收帖二千余张。窦光鼐大喜过望，马上稟奏乾隆皇帝：“士民呈梅派捐单票，田一亩捐大钱五十；又勒捐富户数至千百贯；每岁采买仓谷不予值。梅在县八年，所侵谷值及捐钱不下二十万。母死不发丧，特令演戏。”

乾隆帝认为窦光鼐呈上的票单有据，确凿可信，遂谕旨让已经回京的阿桂，再赴浙江秉公办理此案。阿桂和江苏巡抚闵鹗元回奏乾隆帝，窦光鼐所言，确有其事。结果阿桂、曹文埴、姜晟、伊龄阿皆下部议。窦光鼐则连升三级，署光禄寺卿，又任宗人府府丞、礼部侍郎，恢复督浙江学政，升任左都御史。

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窦光鼐任会考正考官。因为两名副考官资历都比较浅，所以一切都推给窦光鼐去办。放榜之后，归安的王以铻是第一名，当了会元；王以衔中了第二名。兄弟联名高第，众议哗然。

大学士和珅平素就对窦光鼐心怀不满，这次趁机在乾

隆帝面前进谗言，说窦光鼐是几任浙江学政，所以此榜必定有私。乾隆帝又查明王以衔、王以铻的确是同胞兄弟，也就半信半疑，又派大臣去复试。复试结果王以衔列二等第四，王以铻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奏称，王以铻的试卷错字连篇，而且居然写出“一日万几”、“一夜四事”等不通的句子来。于是罚停王以铻殿试资格。乾隆帝申斥窦光鼐年老昏愦，先行开缺，听候部议。两位副考官也交部议处。

这一年的殿试，和珅是首席读卷大臣，亲自把关。阅卷完毕，乾隆帝在养心殿亲览前十本考卷。钦定了名次以后，方拆开弥封，而第一名就是那个王以衔。和珅和其他读卷大臣们面面相觑，尴尬狼狈。和珅只好老着脸启奏：“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毫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事已如此，乾隆帝只得说：“彼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于是唱胪之日，王以衔高中首魁，京师九城轰动。

据《东华续录》载，窦光鼐说印票收帖都是平阳监生缴出的。王氏兄弟赠袄呈票之事，在京城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清人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说：“遍阅诸家纪载，尚无详志此事者，姑录之，以广异闻。确否，则未敢悬揣也。”事情过去之后，乾隆下旨赏窦光鼐四品衔，让他回家养老去了。

大学士瑞麟升官之道

赵蕙蓉

清朝皇帝四季的祭祀活动名目繁多，清廷主管祭祀典礼的专门机构叫“太常寺”。祭祀祝版都是清文，得派满官读祝，一般这个差使是由太常寺的读祝赞礼郎承担。这些人平时不干别的，就是终日朗读祝文，要个个练得“声音宏亮，高下得宜”，才算合格。

然而赞礼郎们尽管平日下了不少功夫，到时还有个“临场发挥”的问题。因为祭祀时，皇帝大都亲临现场，赞礼郎见天颜咫尺，有的就会吓得张口结舌，将平日苦练的嘴皮功夫毁于一旦；有的则知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胜败在此一举，于是沉住气，摒弃一切杂念，用足丹田功夫，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地把祝文一气念完。因此而博得皇帝高兴，一下子升了官的，也不乏其人。

清代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对此曾作过如下记述：“祭祀祝版皆清文，满官读祝，须声音宏亮，高下得宜，

其人临时简派，皆由太常寺赞礼郎出身者，官至一品，不复开列，然一时无其人，虽尚书亦有派读祝者，赞礼亦清语，习其业者，日夜演赞，务极宏远之音，累月经年，乃就娴熟，选充斯职，即获翎顶，既与骏奔之列，襄赞无误，多有晋品秩换花翎者。”

道光朝的赞礼郎瑞麟，就因为有个好嗓子，得到清宣宗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到咸丰朝时，他已是当朝的一品大学士。这固然和他后来托庇于慈禧有关，但最初的发迹，所得力的只是一个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姓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跟慈禧太后是同族。他系笔帖式出身，后任太常寺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恰值由瑞麟读祝。他那天把祝文的满洲话念得琅琅上口，声音宏亮，精神十足，而宣宗皇帝是最注意这些小节的，听了大为高兴，赏了瑞麟五品顶戴和花翎。瑞麟喜出望外，益发尽心尽职，苦练朗读。隔不多久，又升太常寺少卿；翌年春，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瑞麟由小小九品赞礼郎升为二品大员，前后仅一年多功夫。实在是异乎寻常，惹得一些埋头苦读的士子也有点坐不住了。当时京师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谑语：“十年窗下苦，不及一声嗥。”道出了这些寒士们对瑞麟青云直上而妒羡又不平的心情。

文宗即位，瑞麟越发扶摇直上，这和慈禧（时为懿贵妃）的关照分不开。原来，当年慈禧丧父扶柩回京，母女

姐弟，颇受冷遇，生活十分窘困。瑞麟念于同族，时有周济。在慈禧看来，这虽不比吴棠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所以，在她进宫得宠后，对瑞麟不忘提携。以后，瑞麟入军机，置直督，至咸丰九年，已俨然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瑞麟的官越做越大，但这位大学士肚子里的墨水却不多，闹的笑话也越来越多。在瑞麟任两广总督期间，有一次广州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什么原因。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瑞麟听后一怔，因为他"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弄得那位属员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又不敢笑出声，怕瑞麟下不了台。

尽管这位大学士一张口满嘴白字连篇，令人哭笑不得，但瑞麟仍能身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其原故何在呢？一方面和慈禧的眷顾有关，加上瑞麟出手大方，在同僚中人缘极好。另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清廷起用一批汉族大员，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造成汉员势力在朝中越来越大。那时，全国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而十个总督（包括"漕运"、"河道"在内），也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为了平衡满、汉大员的力量，瑞麟是屈指可数的三个满员督抚之一，是清廷用以抵制日益增长的汉官势力的基数。所以，尽管上自慈禧、恭亲王奕䜣，下至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深知瑞麟的底蕴，但为了与汉员

力量抗衡，哪怕瑞麟再无能，他的满员身份定能保其坐高位，享厚禄。

不过，瑞麟还算有自知之明，在他晚年，不时提及当年宣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是啊！总算老天给了他一个好嗓子，更幸得皇帝说了声“中听”。否则，哪里有瑞麟这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呢？

旗人状元崇绮的荣辱兴衰

唐国耀

清朝的科举取士，自顺治三年丙戌至光绪三十年甲辰，凡殿试一百十二科，共录取进士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七人。除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有两个状元以外，清朝的历代皇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凡是旗人，无论满族还是蒙古族，都一概不在问鼎甲之列。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光宗耀祖的头衔，一向为汉人所得。这是顺治皇帝传下来的惯例，各朝皇帝心领神会，满朝文武也心照不宣，因而各科考试，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同治四年的殿试，却出了一桩满朝议论、轰动京师的新闻，这就是旗人崇绮夺了一甲一名的状元。崇绮，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初为工部主事，坐其父出师无功，褫职。”其父赛尚阿，在嘉庆、道光年间，颇受皇帝的赏识，官升得也很快，从笔帖式到军机章京，又升到内阁学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协办大学士，咸

丰元年官拜文华殿大学士。时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位军机大臣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结果军事失利，一败涂地。于是朝廷以“调度无方，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为名，被“褫职逮京治罪”。从此，阿鲁特氏家道中落，崇绮也颇有身居闹市无人问的感慨，只好关门读圣贤书。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在保和殿亲试会试及第的一榜新贡生二百六十五人，崇绮也在其内。这次是由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军机大臣宝鋆主考。殿试考官共有八人。从卯正时分唱名进殿，礼部散发题纸开始，保和殿内鸦雀无声，贡士们各安其位，都在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崇绮则笔走龙蛇地写了一篇，因为明知旗人一甲三名肯定没有希望，心中倒也坦然。

照例是一天殿试，读卷大臣们阅卷两天。因为试卷都是密封的，读卷大臣看到满意的文章，就在上面画一个圈，大家都以为好的卷子就有八个圈。然后以画圈多少为序排名次。

第四天皇帝在养心殿“亲览”。同治皇帝那时才十岁，自然识不得优劣，也拿不了主意，免不了是两宫太后做主，好在每本卷子上都画着圈，点起状元来倒也不难。两宫太后忽然发现，第一本竟是旗人崇绮的，感到事情不好办，于是让以协办大学士瑞常为首的读卷大臣和军机大臣们把卷子拿下去商量。这些人商议的结果是“只论文字，何分旗汉”，由恭亲王和瑞常领衔复奏。两宫太后也

就钤印钦定了。这样崇绮金榜题名，身为魁首，自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清史稿》云："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同治十一年九月，崇绮的女儿又被诏册为皇后，他更是备受殊荣，升隶满洲镶黄旗，官运亨通，赐三等承恩公，后迁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家道又中兴起来。

谁知好景不长，同治十三年皇帝就死了。同治死于天花病，但同治的死和慈禧、嘉顺婆媳之间的不和有很大的关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此也有记述。据说慈禧在养心殿东暖阁外，曾偷听到儿子和媳妇的私房话，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帝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就把责任全推在皇后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职位。

从崇绮家族的荣辱兴衰，反映了当时科举的腐败、宫闱的暗斗以及政局的动荡。这位旗人状元的下场，也是清朝末年日趋衰败没落的缩影。

至于那位年轻的皇后，光绪五年三月葬在清东陵惠陵。她被加谥为孝哲毅皇后，那已经是慈禧死后宣统年间的事了。

王寿彭侥幸中状元

林树惠

清朝沿袭明代制度，以科举取士，每三年各省举行考试，叫做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叫做会试，会试中式后再行殿试，以定甲第。一甲三名，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同进士出身。自顺治三年开科到光绪三十年科举停止，共录取进士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七人。这种科举制度，弊端甚多，埋没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也遗留了许多传闻和笑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离京都，到西安避难。后来由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太后才又回到了北京。“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在这内外交困、惊魂甫定的时刻，她虽然仍踞宝座，但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此时此际，一些文武官员为了讨好这位“老佛爷”，不肯放过任何阿谀奉承的机会，即便违背

制度，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北京举行会试，跟着又举行殿试，癸卯科一甲三名，二甲进士共一百三十八名，三甲进士共一百七十四名。

第一甲三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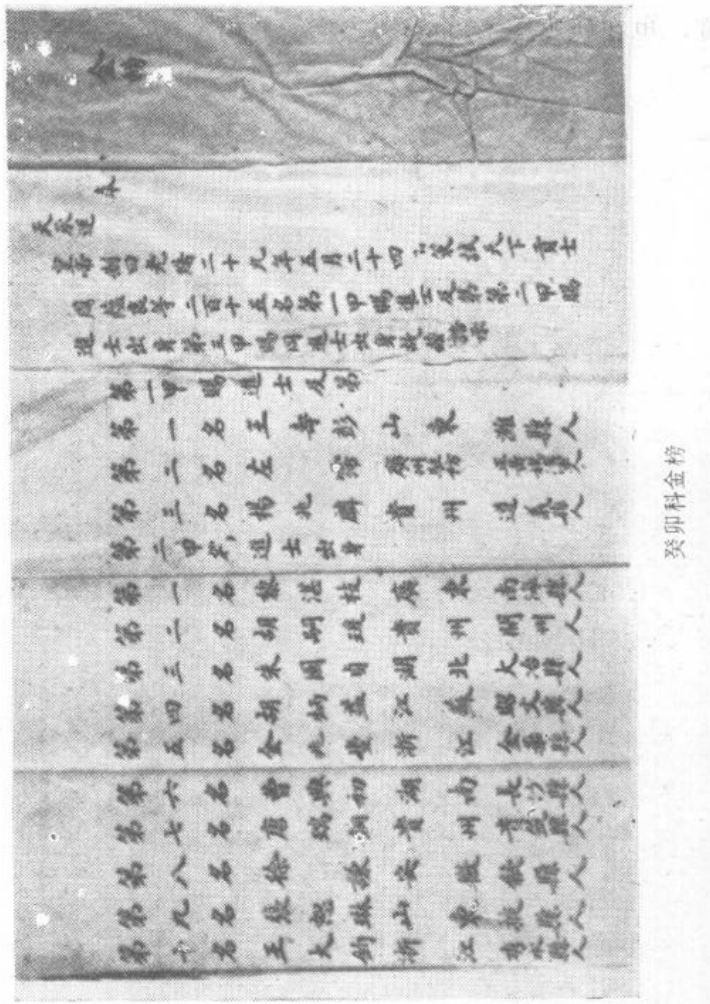
一、王寿彭　山东潍县

二、左　霈　正黄旗汉军

三、杨兆麟　贵州遵义县

状元王寿彭，好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原来西太后的生日，即所谓“万寿节”，是十月初十日，而殿试是在三月，主考官为了博得西太后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拔成第一名，为的是让西太后一见到签拟名次的单子，首先看到“王寿彭”这三个字，使她顿时感到自己的寿命也一定像彭祖那样的高寿。这样一来，对于主考官办事得体，当然是恩赏有加了！

清代殿试最初在太和殿举行，乾隆时改在保和殿举行。据《清史稿·礼志》记载：传胪日……鸿胪寺官引贡士就位，跪听传胪制曰：“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赞“一甲一名某”，令出班前跪。赞二三名亦然。赞“二甲一名某等若干名，三甲某等若干名，不出班，同行三跪九叩礼。……”侥幸得中癸卯科状元的王寿彭，当然是被赞为“令出班前跪”的人。当时王寿彭喜从天降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癸卯科金榜

北洋政府时代，王寿彭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大家都知道他因为名字起得好而走运的历史。有一天他的同僚曾问他当年“出班前跪”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他情不自禁、兴高采烈地说：“又惊又喜！”

大阿哥的下场

周　熙

戊戌政变后，慈禧谋废立之事，碍于中外舆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她的心腹荣禄禀奏说：“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不可不慎。皇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纂大统。”

于是慈禧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于仪銮殿，宣布立她的心腹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光绪亲自赐以皇子常冠“红绒结顶”。

不少读者都知道这件事，但溥儁成为大阿哥之后的情况怎样，结局如何？可能知道的不多。

十五岁的溥儁被宣布为大阿哥后，便住进大内清宫。命崇绮充师傅，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授读。溥儁是个耽于玩乐的纨袴子弟，不爱读书，成天和他带进宫的两条狗玩耍。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溥儒随慈禧逃到西安。这个无聊的大阿哥，成天游乐看戏，时常穿着常服，在酒楼饭肆吆五喝六，打架骂人。他的父亲载漪被革去王爵之后，充军新疆，随后，溥儒也被撤销了大阿哥的称号，改封为承恩公。地位一落千丈，没有继承大统的希望了，更为人所不齿，从此默默无闻。

清朝灭亡之后，更没人理睬他，他也没有什么野心，照旧耽于玩乐，吃吃喝喝。一九一八年前后，他住在什刹海附近蒙王罗王府，仍旧梳着一根大辫子，成天在后门桥一带的茶坊酒肆喝茶饮酒。不久，就悄悄地死了。

满文本《三国演义》的流传

文爱清

我国第一部通俗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184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年）期间，即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此书多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等史书，不尽子虚乌有。它既是一本生动的小说，又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参考书。尤其对于当时战争的描写，颇具特色，令人百读不厌，往往揭示出其政治上、军事上的胜败原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因此，清初数帝也都喜欢读《三国演义》，从中汲取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教益。

清太祖努尔哈赤爱读《三国演义》，是人所共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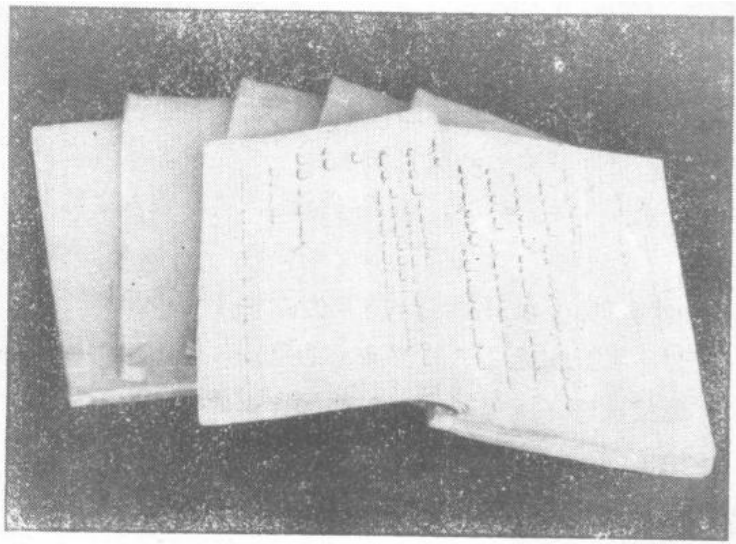
清太宗皇太极也喜欢读《三国演义》，喜欢到连他的臣子沈文奎都担心他会守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但皇太极并没有听从沈学士的这种“规劝”，相反，不仅自己继续读，而且用行政手段让更多的人去阅读。他组织了

一批满文专家将汉文《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并颁赐给那些不识汉字的满族贵胄、臣僚。他自己更几乎时时、事事地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饶有兴味的是，一六三五年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一封信中说："昔黄忠与关公战，马蹶堕地，而关公释之，令乘马再战。盖以乘人之危为不勇也。"随即盛赞关公的"以义为尚，不违诚信"的品德，劝朝鲜国王在对待明、清双方态度上要讲求"信义"。

为了扩大阅读《三国演义》的范围，顺治皇帝即位以后，继续推进了《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一六五〇年正月，满文《三国演义》全部译成，立即颁行于清朝统治的地区。参与翻译工作的满、汉大学士如范文程等，还受到了"鞍马银币"之赏。一六六〇年初，福临更将满文《三国演义》颁赐给诸王以下、甲喇章京（参领）以上等官。

《三国演义》满文本的成书与颁行，确使许多不谙汉文的满族武将多所受益。

乾隆以降，满洲贵族与八旗将帅精通汉文者日益剧多。然而由于清帝的提倡，满文《三国演义》仍十分畅行。乾隆帝称许武功，将帅们自然也把阅读《三国演义》作为习识古代兵法的捷径之一。位卑者往往以学、用此书求通达，位尊者更时时以此书选造良将。乾隆初年曾在齐齐哈尔为朱姓老板长途运货的海兰察，后来以马甲随征准噶尔、讨大小金川，由于他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兵法，并用于战斗，因而屡立战功，被封为"超勇公"，一跃而成为乾嘉时期武臣之冠。最初曾在海兰察帐下以侍卫跟从、



满文《三国演义》

后来竟当了总督的额勒登保，亦从《三国演义》中收益匪浅。不少史书记载：海兰察见额勒登保作战勇敢，即赠他一本满文《三国演义》，且嘱道："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可见直到乾隆时期的武绩中，也还有着《三国演义》的一份功劳哩！

太液池边的小铁路

杨乃济

金灿先生所撰《园中之园——静心斋》一文（刊于《紫禁城》双月刊第六期）中言及："慈禧太后来北海时，常在鉴清斋（按：应为镜清斋）用膳，所以铺设了小火车铁轨，可沿北海西岸直达中海，曾在鉴清斋门前建有黄瓦顶的小型火车站站廊。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海后，把铁轨、车站、小火车全部给捣毁了。"这里所说的"小火车铁轨"，即本文要介绍的太液池边的小铁路，亦即西苑铁路。

西苑铁路建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它晚于同治三年（一说同治四年）英商杜南特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的长仅一华里的宣外铁路；晚于同治五年英商在上海至江湾镇间铺轨、后又延伸至吴淞的淞沪铁路；晚于光绪三年（一说光绪七年）由中国开平煤矿铺设的唐山至胥各庄、后又延伸至天津的津唐铁路，这是中国境内铺设的第四条

铁路。

有关西苑铁路的兴造，不见于官修史籍，清宫档案中的光绪朝《上谕档》、《起居注册》、《内务府奏案》、《营造司呈稿》，亦未见只字。较为可靠的记载，只有当时的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二则：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合肥以六火轮车进呈（五进上，一送邸），今日呈太后御览。今紫光阁铁路已成，未知可试否也？是为权舆，记之。”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观新进之火轮车，约长三、四丈，狭长，对面两列可容二十八人，凡三辆。又观机器车，不过丈余，此天津所进。三辆留西苑，三辆交火器营收，昨日甫到也。”

上述行文中的“合肥”，指李鸿章；“邸”，指醇亲王奕譞；“火轮车”，即火车；“机器车”，即机车。据翁同龢所记，可见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紫光阁铁路已建成，该路即西苑铁路的前身路段。当年十一月初六日，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呈的火轮车已运抵北京，十一月十一日翁同龢已见到了这六节客车和一台机车。按日记中所述“对面两列可容二十八人”，当系车厢两侧各有一排容十四座的座席。这种车厢较现在的标准车厢为窄，属于窄轨火车。

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醇亲王

奕譞等奏折一件，对车辆之种类、进车之来龙去脉有更详细的记述。

盖小火车原系天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潘骏德，向法国新盛公司德威尼订购，计“洋轮坐车六辆、丹特火机车一辆并铁轨七里余”。车辆运抵京师后，经海军衙门验得：“坐车六辆内，上等极好车一辆，上等坐车二辆，陈设华美，制作精工；中等坐车二辆，行李车一辆，亦俱材质光洁；尚有铁路七里有奇。”

折中又称：“其原订价银仅六千两，而自巴黎洋厂加工精制，分起装运来华，实不敷工料运脚之数。询据该国领事林椿声称，前项坐车，虽由德威尼承办，该国银行监督登飞筹贴银款，巴黎总办公司拔郎督催购运，制造厂监工雷声经手趱造，所有造车及运费银两，均系情殷报效，不敢计资论值等情。”

当时由李鸿章进呈之小火车既系法国制作，必属窄轨无疑（因法国当时通行窄轨火车）。而车辆中既有上用之专车，又有通用之头等、二等车厢及行李车，可谓品种齐全。此法商之所以不惜工本“情殷报效”，无非是为了在大清国的皇宫内苑中安设一个大广告，以期在中国最高统治者慈禧面前推销他们的产品。李鸿章等人则以“该公司等以重资配造新车，均能合力经营，竭诚要好，非分别酌加奖赏，不足励其报效之忱”为理由，为这些洋商请赏，提出：“将法国银行监督登飞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总办公司拔郎赏给三等第二宝星，德威尼赏给三等第二宝星，并

加三品顶戴，制造监工雷声赏给三等第三宝星，以酬远人向慕之诚。”

事隔不久，小火车就沿着北海西岸启动运行了，但小火车的工本和运价究竟有多少？洋商们究竟占了多少便宜？就无从知晓了。

最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到《北京中海铺修铁路图样》、《北京北海至中海铺修铁路图样》各一张，皆纸本墨绘的地盘画样（平面图），未注明绘制年月。然对照翁同龢日记，足证此二图当为光绪十四年为铺修西苑铁路时进呈的线路规划工程设计图。

第一张图中，绘有中海北部的紫光阁、时应宫、福华门（中南海北门），及北海的阳泽门（北海西南门）。紫光阁以东，绘有一段南北向的铁路，标注了“现修铁路至此”六字。该路西侧又引出两条岔路，一通时应宫以东的车库，一穿越福华、阳泽二门向北延伸，注有“活铁路”、“活铁路用时现按”字样。由此可知，西苑铁路当系先后两期分段建成，先成紫光阁路段的短线（即翁同龢日记中提到的紫光阁铁路），路成，即将进呈的车辆列此“呈太后御览”。后来为试验车辆能否长途运行，又将已成的紫光阁路段向北伸延，穿福华门，入阳泽门，再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复自龙泽亭以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至终点站镜清斋（后改名静心斋）。这一路段均绘于第二张《北京北海至中海铺修铁路图样》上。尤可贵者，该图粘有二十四处文字较详的贴说，内中记载

了有关的工程说明，十分详尽。首先，它告诉我们，西苑铁路的总长是四百七十二丈，按清营造尺一尺合零点三二米计算，则全长为一千五百一十点四米，约合三华里。内中又有四十九丈二尺系活安铁路（合一百五十七米），分布于三段：一段在福华门内，一段在福华门外至阳泽门前，另一段在阐福寺前的神路上。所谓活安，即用时现安之意，因为三处皆交通要路，如将铁路固定安装，车马通行殊为不便。

此外，贴说中还记有北海西、北岸的一系列路基工程，如帮宽泊岸，开刨土山，挪修甬路，砍伐树木，添修涵洞、石平桥等。这又为今天寻找西苑铁路的遗迹提供了线索。笔者往北海西岸、北岸实地勘察时，即按图索骥发现了三处路基工程的遗迹：一是五龙亭以西、极乐世界以南，尚有一段花岗石砌筑的泊岸及石平桥；一是极乐世界以南，已被刨去大量土方的一段剩余土山；另一处则是镜清斋前的那座码头，由于泊岸已帮宽至码头尽端，因而又向前伸接了一段石砌码头。这三处遗迹，正是当年兴修西苑铁路的历史见证。

西苑铁路虽非京师首建之路，但确系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第一次见到的火车和铁路，它行驶于宫苑禁地，当然与广大人民的商旅交通无关。但出入内廷的王公显贵，以及像翁同龢这样的朝廷近臣，皆藉此大开眼界，得以亲见火车的运行。

当时所以能兴修西苑铁路，绝非偶然事件。光绪朝

《东华录》、《清史稿·交通志》虽无只字提及西苑铁路，但都载有与该路兴修之种种背景。原来，有原淮军主将刘铭传者，以军功晋提督，后休致还里。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关系吃紧，清廷将刘铭传召至京师陈议军事，铭传就整军之策上疏时，首先创议兴造铁路。当时慈禧将刘铭传之上疏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议复。李鸿章肯定了修铁路的种种好处，而刘坤一以铁路防碍民生、厘税，加以反对。继之又有内阁学士张家骧、御史洪良品亦上疏极力反对修路，彼此相持不下。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之战爆发，由于运输不利，几致败局。次年与法议和，清廷又议整顿防务，李鸿章复议招商集股兴造铁路；大学士左宗棠也上疏陈言，认为修铁路“有利无害”。然当时反修路之势尚盛，李、左之议皆无从施行。

到了光绪十三年，一个强有力的大人物：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以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的亲王大臣身份，与兵部侍郎曾纪泽共同上疏，力主修路以富国强兵。当年，原由开平煤矿商办之唐山至胥各庄间的唐胥铁路，已获准经芦台、塘沽延至天津，于光绪十四年建成，是为津唐铁路。这时又有广东商人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间铁路，直督李鸿章以此议上奏朝廷。此议一出，当即有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奎润及其他一些人纷纷上疏阻谏，慈禧对修建津通铁路一事因之犹豫不决，并将翁同龢等人之奏折七件一并发给总理海军衙门会同军

机处议复。李鸿章等看出修路与否的决断权掌握在慈禧手中，而慈禧又从未见过铁路、火车，更没有坐过火车，遂以进呈“火轮车”及兴造西苑铁路试车，来促使慈禧同意修路。西苑铁路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了。

有一种说法，说李鸿章之进献火轮车是为了阿谀谄媚慈禧，而慈禧之接受是由于贪图享乐。从当时种种背景看，这种说法显然不确切，它的修建，与修路之争也是不无关系的。西苑铁路修成后，慈禧亲身领受了火车之便，便从犹豫不决，转为支持修路派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西苑铁路于一八八八年建成，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被八国联军拆毁，但它在中国铁路史上仍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乾隆朝的宫廷西洋乐队

杨乃济

每当你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或竚立于修长的御路、巍峨的丹陛，或漫步于红墙黄瓦的重重殿宇，或休憩于御花园树杪花荫之中，扬声器中播出一曲曲幽雅的古琴乐律，琴声与环境气氛是那样的调和，浑然一体，瞬息间似乎时空又回转到那个古老的世纪。不过设若将这古琴声易为一曲西洋管弦乐，眼前这一切又将如何呢？

殊不知早在三百多年前的康熙朝初年，那许多从五线谱上飞出来的音符，就曾在紫禁城的上空飘扬。当时供奉于内廷的西洋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徐日昇等人，不仅以西洋乐器进献给康熙皇帝，还为之进讲西洋乐理，并教会他以西洋乐器演奏西洋乐曲。法国耶稣会教士白晋曾充当康熙皇帝特使，回国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的奏折（《康熙皇帝传》，1697年巴黎出版）中曾详记此事。他写道：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

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不过康熙皇帝仅止个人演奏，真正建立起一支纯以西洋乐器装备的宫廷管弦乐队，那是后来乾隆皇帝在位时的事了。

虽然乾隆皇帝不象他祖父那样对一切外来的科学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其音乐禀赋也远不如康熙，但他的猎奇心理和好大喜功，却使得一支西洋管弦乐队破天荒地诞生于紫禁城内。

有关这支西洋管弦乐队的记载，既不见于官修史籍，也不见于野史、笔记和外国人的信札与回忆录，只有透过零零星星的档案记载，略得窥见其一二。诸如西洋乐师来华供奉与进献乐器，宫内收贮西洋乐器，乐队的组成、排练和乐队的服装道具等等。这些皆与内务府造办处传办活计有关，因而见记于造办处之《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档案记载：乾隆五年来华、遵旨入内廷供奉的“西洋修士”中的鲁仲贤，即注明其专长是“能知律吕”。乾隆六年又记有“西洋人张纯一·席澄源进西洋风琴一架”，并于该年查得武英殿造办处共收贮风琴十七架。而有关西洋乐队的组成与排练，则见于上述档案中的如下几条：

“于本年七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西洋人鲁仲贤认看得大拉琴一件、长拉琴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

奉旨：西洋人会弹即令伊等交（教）内庭小太监学习，如乐器上缺少之物，将名色开来，里边查给。钦此。”

（乾隆七年）

乾隆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等交琵琶一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长拉琴一件、西洋箫大小八件、斑竹板三块、笙一件。传旨：着交西洋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钦此。”

“于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象牙笛四件、铁丝琴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西洋乐人十四名着做衣裳十四份，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于十二月初八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西洋乐人的靴子八双着武备院成做，其扎巾八个交盔头作成做。钦此。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将盔头作做得扎巾八顶，随髯八口持进，交太监呈进讫。”

“于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将武备院做得青倭缎靴八双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栢唐阿福明来说，八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俟出外以后，着传会琴的西洋人打出琴谱，交与弦锁（索）上人学。钦此。

于本日，员外郎白世秀为西洋人魏继晋、鲁仲贤、那永福[1]三人在瀛台教琴谱，请欲行给饭食，回明怡亲王、内务府大臣德（保），准行。遵此。”

据以上档案所示，乾隆七年曾遵旨将宫中旧存之西洋乐器交西洋人认看并收拾，又添造了象牙笛、铁丝琴②，并将这一批乐器交由西洋人向小太监传习。这些宫中收贮的西洋乐器，有的当为历年来华之西洋人所进献，有些还可能是康熙朝遗存之旧物，因当年徐日昇向康熙皇帝进讲西洋音乐时，曾指导工匠制成一批西洋乐器③，至此又经存贮了六、七十年，也极需重新收拾了。

从档案中记载的乐器来看，凡“交西洋人认看”的，大都非中华所固有者，从而难辨名色。所谓“琵琶”，当属吉它、曼陀林一类，“长拉琴”、“小拉琴”大约就是大提琴、小提琴，而“西洋箫”则不外单簧管、双簧管之属，铁丝琴大约就是竖琴了。纵观上列品色，可以判断这一支宫廷西洋乐队，当属一支以演奏室内乐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而所谓之“西洋乐人十四名”，可能由内廷供奉的西洋人所组成，也可能是西洋人教习过的那一批小太监。若从为这支乐队制作的服装道具来看，有成套的靴子、盔头、扎巾又随带髯口，大约是将这些“西洋乐人”都打扮成不中不西的怪模样，可以想见这一支乐队的滑稽面貌了。

乾隆皇帝之音乐禀赋远逊于乃祖康熙，西洋乐曲他未必能听得懂，搞起这样一支乐队无非是拿它当个杂耍凑凑热闹罢了。

① 档案记鲁仲贤于乾隆五年来华供奉。那永福于乾隆九年与苻文仁、艾启蒙等同船来华，二人之专长皆“能知律吕”。魏继晋则不详。

② 铁丝琴也可能是钢琴。据谈迁《北游录·纪邮上》记载，他在顺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到宣武门内天主堂拜访汤若望时，曾见“琴以铁丝”。从书中的文字内容来看，它实际上是一架钢琴。

③ 白晋撰《康熙皇帝传》一书中言称：“徐日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做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

官至二品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刘　潞

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墓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睡了近三百年了。

一六五七年，南怀仁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一六八八年死于北京。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和碑文，赐他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中国朝廷的高官显贵的？这要从康熙初年紫禁城中发生的一场官司说起。

南怀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脱（Ferdinandus Verbiest）。因为他精通天文地理，所以到中国传教后的第二年，就被推荐到宫中，协助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工作。他们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勘测天文，计算

准确，说服力强，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但是，科学和迷信、先进和落后毕竟是不能相容的。西方传教士在勘测天文时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一六六四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和南怀仁，说他们“历法荒谬”、“邪说惑众”、“僭谋造反”。当时正值顺治、康熙两朝交替之际，执政的是鳌拜一伙野蛮、愚昧的议政王。他们对天文、算学一窍不通，无从判断科学上的是与非，但他们抓住所谓“惑众”、“造反”等字句，汤若望、南怀仁就不能不交上厄运了：结果前者被判处死刑，后者被驱逐出宫，钦天监的大权落到了杨光先和他的支持者吴明烜手里。

南怀仁等被判刑后，北京忽然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愚蠢的鳌拜以为这是由于他惩处了汤若望、南怀仁而触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将他们赦免。汤若望获释不久就与世长辞，南怀仁尽管重获自由，但却不能重返钦天监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传教。这段公案似乎也就这样了结了。

四年以后腊月里的一天，平时很冷清的午门广场忽然热闹起来，以大学士图海为首的二十几名大臣，率领随员，携带仪器，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午门前观测日影；接着又驾车直奔观象台去作进一步的观察。图海这些人是奉康熙皇帝之命，去了解南怀仁与杨光先对天文的勘测孰是孰非的。南怀仁虽然几年前被逐出宫，但并没有放弃自己

的观点，他坚信自己按所谓“西洋新法”测定的天文是准确的，因此在他得知康熙帝已经亲政，而杨光先预测的康熙八年将出现两个春分和两个秋分的明显错误时，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辩。这一年康熙十六岁，亲政已两年，但实权仍被鳌拜掌握，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亲自处理四年前的汤若望、南怀仁案件，便是康熙向鳌拜夺回权力的开始。在康熙的命令下，大学士图海等人进行了上述的检验。结果，无论是午门前的日影观测还是观象台的仪器测定，都证明南怀仁计算的准确。一时群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徒有虚名的杨光先。康熙帝当机立断，撤去杨光先、吴明烜的职务，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当时南怀仁以自己是“远西鄙儒，不妻不宦”为借口，辞官不受。后来康熙屡次下达上谕，一定要给南怀仁晋封。南怀仁推辞不过，接受了监副的任命。为了表示对康熙皇帝为他昭雪的感激之情，在回到钦天监的当年，就献上了一个小巧精致的浑天仪。这场在紫禁城内发生的历时多年的官司，到此才算最后了结。

南怀仁在欧洲受过系统的当代科学的教育，他不仅熟知天文地理，还长于算学、机械。康熙本是个勤敏好学的皇帝，南怀仁掌握的几何代数、天文地理知识，很快就得到康熙的赏识，成为康熙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启蒙老师。南怀仁从此平步青云：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后不到一年，因为制出六整套天文仪器又被提升为监正。几年以

后，三藩作乱，清王朝处于危难之中，南怀仁又向康熙献出绝技，设计制作了一种新型火炮，帮助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清军，成为清王朝的功臣。他后来被晋为工部右侍郎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

南怀仁在中国传教、任职期间，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对外来事物一向持慎重态度。康熙朝曾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只有奉公守法、尊重中国习俗才可在中国传教，否则就要被逐出境。南怀仁能成为清政府的一名二品大员，在传教的同时，又能致力于传播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中比文化交流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供职清廷的外国画家

聂崇正

一、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清朝宫廷内设有一个类似画院的机构——如意馆。馆内集中了许多画家、雕工、画样设计和画珐琅等艺匠，其中还有若干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大都来自欧洲各国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其中有的人还终老异乡，埋葬在中国。他们把欧洲的绘画艺术介绍到东方，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郎世宁就是其中的一个。

郎世宁，意大利人，原名Giuseppe Castiglione。公元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来到中国后，取汉名为郎世宁。

郎世宁在欧洲时就加入了耶稣会，并学习过绘画。到中国之前，曾为欧洲一些教堂画过基督像、圣母像等宗教

画。公元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八月，郎世宁二十七岁时，由欧洲耶稣会的葡萄牙传道部派来中国，十一月抵达北京，住在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天主教东堂。

郎世宁到达北京后，因为他擅长绘画，遂成为宫廷画家，约在康熙末年入宫廷。目前看到他署有“臣”字落款的作品，最早是雍正元年（1723年）所画。从此郎世宁在宫中创作了许多以当时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历史画以及人物、肖像、花卉、鸟兽画，深得皇帝的喜爱和赏识。

乾隆十二年（1747年）前后，郎世宁和另外一些外国传教士还奉皇帝之命参加了圆明园部分建筑的设计工作，园内有几处欧洲风格的建筑物和喷水装置（清代称为水法），就是郎世宁参与设计的建筑物。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郎世宁六十九岁，按照中国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正好是七十大寿，乾隆皇帝特地为郎世宁举行了祝寿活动，赏赐的物品很丰厚。

郎世宁除了在皇宫里作画外，和一些亲王贵族、文武大臣也多有交往。他曾为果亲王允礼画像，为慎郡王允禧作画，他还和曾任工部右侍郎的年希尧（年遐龄之子、年羹尧之兄）一起探讨过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并由年希尧撰写成《视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的著作。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乾隆皇帝特赐予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为他料理丧事，遗体葬在北京阜城门外外国传

教士墓地内。

郎世宁作画的题材范围很广泛，人物故事、肖像、动物、花草、山水等均有所涉及，尤其是以他为主所作的巨幅历史画，场面宏阔、人物众多，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场面。

《嵩献英芝图》是郎世宁早期的作品，作于雍正元年（1723年），画中落款署有“臣”字，说明他此时已经进入宫廷任职。画面中的鹰、松树和灵芝等，都刻划得非常精细逼真，富有立体感，从画的题目的内容看，大概是为恭贺雍正皇帝即位而作的。

在郎世宁的历史画作品中，有许多以额鲁特蒙古族杜尔伯特部归附和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为题材的，如《马术图》、《万树园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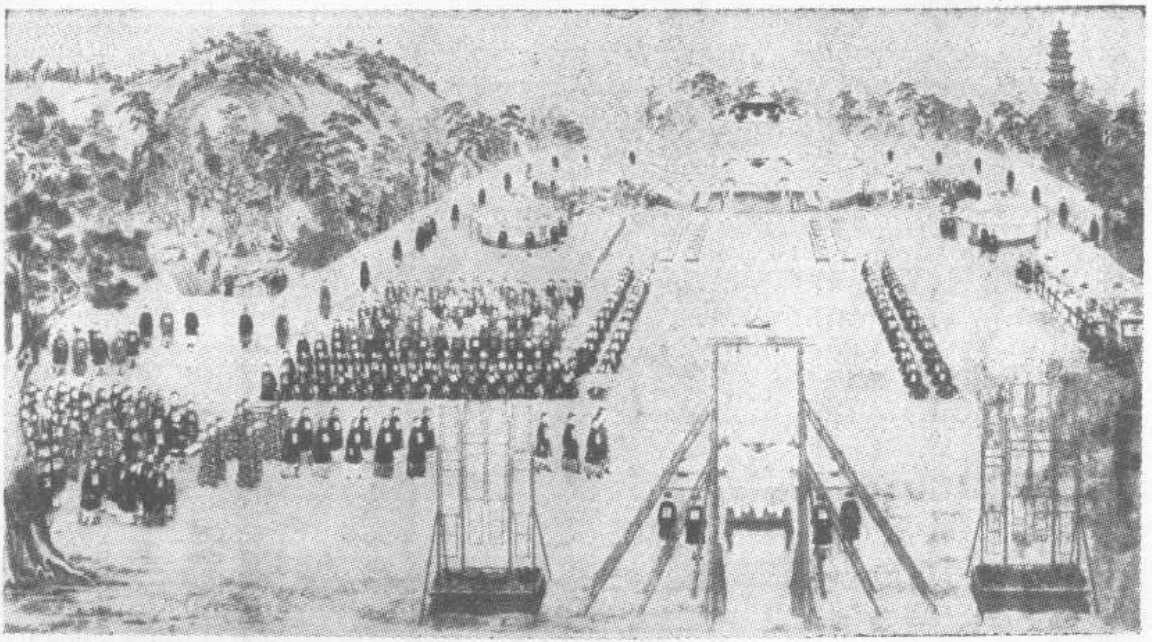
《马术图》，绢本，设色画，纵225厘米、横425.5厘米，有“乾隆二十年七月臣郎世宁奉勅恭绘”十五字款，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归附的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乾隆皇帝和杜尔伯特的上层人物及文武官员正在观看马术表演，刚健、勇武的骑士策马飞奔，在坐骑上做出各种难度很大的惊险动作，气氛活跃，运动感很强。画面场景很大，但经过画家的精心安排，大而不乱。色彩既华丽鲜艳，而又统一和谐。图中弘历和一些主要官员的头像，造型准确，刻划精细，堪称肖像画的佳作。画上只署郎世宁一人的名款，但从画面看，只有主要人物及其坐骑是出自郎氏手笔，其余部分是由中国画家补绘，中西画风

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万树园赐宴图》，绢本，设色画，纵221.5厘米、横419厘米，款为："乾隆二十年……勅恭绘"（中间有若干字剥落），表现的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场面。乾隆帝坐在肩舆上，文武官员前呼后拥进入宴会场，被接见的人跪着迎接。画的中后部是帐篷，帐篷前是筵席，周围陈设赠送给杜尔伯特首领的各种器物和绢帛，两旁分列乐队和喇嘛，远处有武装侍卫站立。与《马术图》相比，此画气氛肃穆、隆重。因款中有数字脱落，作者无法确认，但从人物肖像的画法来看，和《马术图》一画同出一人之手，故可确定为郎世宁所画。

郎世宁还和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外国画家一起，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共十六幅）铜版画的底稿。这套组画描绘了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的战争，是在法国刻制成铜版的，具有浓厚的西洋画风格。

郎世宁还以擅长画马而闻名于清朝画坛。郎氏作品中的马匹，完全采用西洋画的技法，用明暗来表现骏马的体积感和皮毛的质感。画于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是郎世宁画马的巨作，画中的马匹姿态各异，生动异常。《郊原牧马图》卷也是郎氏画马的精心之作，绢本，设色，纵51.2厘米、横166厘米，画一个牧者与八匹肥瘦不均的马匹。作品用色厚重，人物和马匹结构严谨，背景中的树木坡石也出于一人之手，从风格面貌看，是属于郎世宁较为早期的作品（约在雍正时）。



《万树园赐宴图》　清·郎世宁等绘

郎世宁还曾为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画过不少肖像画，但因限于规定，这些画上都不署作者姓名，故无法确指哪件为郎氏所作。

果亲王画像　　清·郎世宁绘

另外，郎世宁在花鸟画和山水画上也作过许多尝试，留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郎世宁在宫内还画过油画，并将这一欧洲的画种传授给中国画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太师少师图》，即是郎世宁流传下来的油画真迹，极为珍贵。

郎世宁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他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画家中的佼佼者，对我国的传

统绘画也有不小的影响，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

二、法国画家王致诚

供奉清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属于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法国画家王致诚则是欧洲耶稣会法国传道部的传教士。他们虽然都是欧洲耶稣会的成员，却各有门户，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和利害冲突。据说法国耶稣会见郎世宁在中国得以接近皇帝，大受宠渥，恐其独得在华利益，便也从自己属下选派了一名擅长绘画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与郎世宁分庭抗礼，这个人便是王致诚。

王致诚原名J·Denis Attiret，王致诚是他到中国后取的汉文姓名。一七〇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王致诚生于法国的多纳。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画家。乾隆三年（1738年），三十六岁的王致诚来到北京，以他画的《三王来朝耶稣图》送呈乾隆皇帝弘历御览。弘历看后颇加赞赏，王致诚由此成了宫廷画家。

王致诚在欧洲时学的是油画技法，擅长画人物肖像和历史画，他的作品非常强调明暗和光影的效果。但对于看惯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乾隆帝来说，欣赏油画是不太习惯的。所以弘历下谕说："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王致诚虽工油画，惜水彩未惬朕意，苟习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愿即学之。至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迫于皇帝的旨意，王致诚只得改用中国的绘画材料和工具

作画，画了一些山水和鸟兽。但在画人物肖像时，弘历仍然允许王致诚用油色作画。

乾隆十九年（1754年），蒙古族厄鲁特部的部分首领率部内徙，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宴请他们，并一同观看了焰火和马术表演。根据皇帝的命令，专门派了供奉宫廷的外国画家到承德，为厄鲁特部的首领绘制油画肖像，这些画家当中就有王致诚。但他的这些油画作品至今没有发现。王致诚还和郎世宁等人一起绘制了《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铜版画的底稿。

王致诚的绘画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石渠宝笈》只著录了《十骏马图》册一件，是我们了解王致诚绘画面貌和艺术成就的唯一实物，现藏故宫博物院。

《十骏马图》册共十开，纸本设色画，每开纵24.2厘米、横29.1厘米，最末一开左下角有款："臣王致诚恭绘"一行，款下有"恭"、"画"印两方。另有对题十开，分别有乾隆朝大臣张照、梁诗正撰的题赞，由嵇璜书写。十匹骏马是乾隆帝弘历的坐骑，系蒙古族喀尔喀、科尔沁、和硕辉特、翁牛特等部的亲王、郡王、贝勒进献的，马匹都起有专名，它们是：万吉骝、阚虎騧、狮子玉、霹雳骧、雪点鹏、自在驎、奔霄骢、赤花鹰、英骥子和翥云骏。画面上有满文书写的马名。画幅与题赞之间钤有"太上皇帝之宝"。

马匹形象基本上是用西洋绘画技法塑造的，十分注重解剖结构，造型很准确。在描绘上，王致诚用精细短小的

线条来表现马的形状、立体感和皮毛的质感，而不用连绵细长的轮廓线。由于他观察细致、描绘精巧，马匹皮下凸起的血管和一些转折部分皮毛的皱纹，都表现得十分逼真。每匹马的毛色和体形的特点，也都有微妙的区别。这说明王致诚具有相当扎实的西洋画素描基础，并善于使用中国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加以巧妙地运用了西洋绘画技法，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从画面上看，有些地方并非出自王致诚一人之手，马匹和背景中的坡石树丛在画风上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背景的画法用干湿笔皴染，纯属中国传统的方式，画上虽然只署王致诚一人名款，但看来他仅画马，而背景则由供奉宫廷的中国画家补绘，这种现象在乾隆时的宫廷绘画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王致诚所画的十匹马，郎世宁在《八骏马图》和《十骏马图》中也都画过。郎氏所画的为大幅，马匹几乎与真马大小相似，但仔细对比二人的作品后发现，所画同一匹马的姿势动态完全一致。从当时二人在宫内的地位和资格来看，应当是王致诚照郎世宁的作品缩小摹绘的。郎世宁的作品画于乾隆八年（1743年），故王致诚的画或即作于此年或稍晚。从王致诚的《十骏马图》册看，他的艺术水平确实不逊于郎世宁。

王致诚对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建筑，极为钦佩。他在一封写往欧洲的信里评论圆明园："此地各物，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浑伟和真正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

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的东西，因而也就使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物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惟有佩服他们的天才弘富”、“只有用眼睛看，才能领略它的真实内容。”

王致诚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三、波希米亚画家艾启蒙

艾启蒙的名字曾见于嘉庆年间成书、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录》及民国初年成书的《清史稿》等书，但都只说他是“海西人”或“西洋人”，并未注明国别。艾启蒙原名Ignatius Sickeltart，公元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生于波希米亚（今属捷克斯洛伐克），年轻时加入欧洲天主教的耶稣会，乾隆十年（1745年）来到中国，取汉名艾启蒙，字醒菴，同年进入清宫廷供职。艾启蒙较郎世宁、王致诚年幼，入宫后还曾向郎世宁请教过画艺。

乾隆三十年（1765年），艾启蒙和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等外国画家奉皇帝弘历之命，共同完成了一套描写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等少数贵族叛乱的组画，艾启蒙画了其中《平定伊犁受降》一图的草稿。这组共十六幅名为《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的稿本被送往法国，由法兰西皇家艺术院组织雕版名手刻制成铜版画，印了二百套。这是二百多年前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弘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八十大寿，乾隆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和宴会，并命画家艾启蒙用画笔将这一热闹的场面记录下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艾启蒙六十九周岁，但按照中国计算年龄的习惯，则已是虚龄七十大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乾隆皇帝特地赐宴为艾启蒙祝寿，赏给丰厚的物品，还赐御题“海国耆龄”匾额一块。宴会后，艾启蒙乘坐八抬肩舆，由官员、乐队前呼后拥随行，在京城内巡游。这一天艾启蒙大出风头，荣耀至极，一时传为美谈。三年后艾启蒙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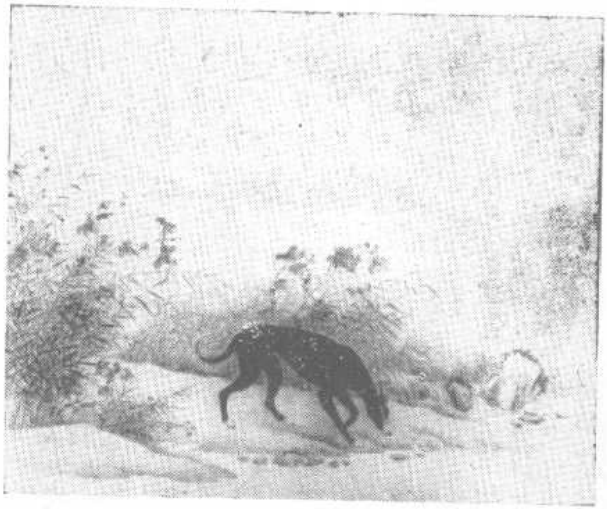
收录记载清宫收藏法书、名画的《石渠宝笈》，列有艾启蒙的作品计九件，题材多为走兽翎毛。他曾画有《八骏图》八幅，均巨幅大作。所画为乾隆皇帝乘坐的骏马，是由蒙古族等部落进贡的。画中的马与真马大小几乎相等，用笔极细腻，连皮毛也一丝不苟画出，每匹马还注明名称、尺寸、由何人进献等。如名“宝吉骝”的马，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郡王策伯克多尔济回归祖国后献给弘历的。原来，该部落在我国西北边境地区游牧，明末由于部落之间的纷争，而远徙至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备受欺凌和和压迫。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跋涉万余里，回归祖国。画家艾启蒙曾两次奉命画“宝吉骝”，可见弘历对于土尔扈特部回归的重视。艾启蒙的这部分作品，以图画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已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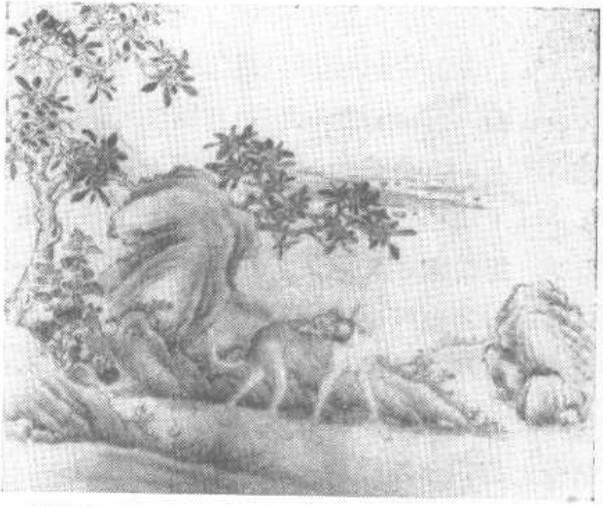
简单地看作是装饰宫廷的花鸟走兽画，尤为珍贵。

艾启蒙所画的《十骏犬图》册，共十开。图中所画的狗，都是相当名贵的西洋纯种猎犬，身材瘦劲，小腹细腰长腿，擅于奔跑，矫健、灵活，速度及耐力均属上乘。它们是乾隆皇帝去南苑或围场狩猎时的好帮手，分别取名“雪爪卢”、“漆点猴”、“蔦空鹊”、“茹黄豹”、“苍水虬”、“金翅猃”、“睒星狼”、“斑锦彪”、“霜花鹞”及“墨玉螭”。这些猎犬在宫廷中的出现，当然和当时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分不开的。

艾启蒙绘画上的特点，与郎世宁、王致诚相同，都是以西洋绘画技法为主，比较注重画面的立体感。但从他遗留下来的作品看，笔墨工细有余，而形象生动不足，马匹和狗的动态比较呆板，显然其技艺逊于郎世宁和王致诚。如果说前两位西洋画家是对着动物园里活的动物写生作画，那么艾启蒙就是对着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摹绘，他们的作品高下区别较显明。

艾启蒙的绘画水平虽然不属第一流，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仍然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艾启蒙从三十七岁离开故国，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最后终老异乡。艾启蒙的绘画作品，大概连他的故国都未必能寻觅到，所以就更值得我们珍视了。





《十骏犬图》册之一部分　　清·艾启蒙绘　陈志安摄

清廷西洋画师的膳食

杨乃济

自清康熙朝后期开始，有一批西洋传教士中的画师应召至京师，长期供奉于内廷。

当时专司宫廷绘事的机构称如意馆，隶属内务府造办处。在如意馆当差的中国画师照例编入内务府三旗，于所属旗下支领钱粮。西洋画师也在如意馆当差，但他们的身份待遇却有所不同，著名的画师多蒙赏予职衔、顶戴，如乾隆十九年《上谕档》中即记有西洋画师王致诚赏予内务府郎中职衔。郎世宁、艾启蒙等亦莫不如是，而一般不甚知名的画师，待遇也较中国画师优渥，一应饮食起居，皆予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原有的生活习俗。

在一件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的内务府档案中，记有当时在如意馆行走的四个西洋画师的膳食供应份例：

“德天赐每日份例盘肉三斤，每月菜鸡七只半。

巴茂正每日份例盘肉三斤，每月菜鸡七只半。

潘廷章、贺清泰二人，每日份例肉三斤，菜肉三斤。”

又每人每日份例：“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水稻米七合五勺，随时鲜菜三斤。”

每人每日果房份例：“红枣、桃仁、圆眼（桂圆）、荔枝、西葡萄各二两，随时鲜果八个。”

从以上供应份例可以看出，为照顾西洋画师的饮食习惯，在他们的食谱中肉类与干鲜果品较为丰富，至于他们吃的是西餐还是中餐，那就不得而知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清宫轶事
作者=郑逸梅等著
页数=259
SS号=10297035
出版日期=